

甲午战争中的方伯谦问题



海军史研究丛书 第一辑

中国海军史研究会 <http://www.cnhi.org> 编纂

2008.9 山东威海

目 录

综 述

[方伯谦翻案活动概貌.....陈 悦](#)

研 讨

[方伯谦修筑威远炮台考略.....吉 辰](#)

[甲午丰岛海战战事考.....陈 悦](#)

[丰岛海战“济远”舰尾炮退敌说辨伪.....陈 悦](#)

[北洋海军航海日志考.....王记华](#)

[谁说方伯谦“甚谙海战”了?.....孙建军](#)

[中日大东沟海战“济远”舰战斗过程综述.....张黎源](#)

[追查方伯谦的血衣.....孙建军](#)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读后.....陈 悦](#)

史 料

[益堂年谱.....方伯谦](#)

[“广乙”兵轮战事.....《中倭战守始末记》](#)

[冤海述闻（附海战阵型图）.....佚名](#)

综 述

方伯谦翻案活动概貌

陈悦

方伯谦，字益堂，1854年1月14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于福建闽县太平街，1867年入福建船政后学堂，成为第一届学生。此后历经风涛，逐渐迁升至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济远”舰管带。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方伯谦先是管带“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有升白旗、日本海军旗，且战后捏造战报之事，继而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迁延不前，临阵脱逃，经清廷谕令正法。

依据现方伯谦后世家藏的《冤海述闻》稿本看，此书称成文于1895年，作者无名，文中多替方伯谦鸣冤之语，但就史事描述多错漏不经。是为方伯谦翻案活动之始。

1919年，池仲佑编纂《海军大事记》，内称方伯谦冤。

1935年，张荫麟在《清华学报》发表《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首开史学研究者翻案先河。

1953年，河北师范大学赵捷民在《新史学通讯》发表《济远舰先逃与方伯谦问题》。

1980年，季平子在《历史研究》发表《丰岛海战》。

1986年，赵捷民发表《再论方伯谦冤案问题》。

1988年，方俚祥在《日本研究》发表《为我伯公方伯谦鸣冤》，作为事主旁系后裔参与到翻案活动中。同年，福建学者陈贞寿、黄国盛、谢必震发表《方伯谦案新探》。

198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王琰发表“大东沟海战与方伯谦冤案”，提出西战场说。

同年，刘志坚发表“清季一大冤案——方伯谦被杀真相”。

1990年6月16日，南京日报副刊《周末》登载程澄作：“济远管带方伯谦是民族败类吗”。

1991年，林濂藩发表“论方伯谦被杀冤案问题”。

同年9月14日，中日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在福州举行，与会者主要为方伯谦翻案论者，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研究界除苏小东与会表达异议观点

外，其余均未参加该次会议。对于会议邀请，未与会的翻案者孙克复回复“荷蒙邀请，不胜荣幸，本应赴会学习，以广见闻，因经费困难，不克成行。”

同年同日，翻案者发布新闻“甲午战将方伯谦获平反”。



同月，翻案者在报刊发表“对历史负责——史学界重评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问题纪实”，称综观方伯谦在丰岛、大东沟两次海战的表现，应该认为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海军中的爱国将领。

同年10月19日，南京日报副刊《周末》报登载程伟国作“方伯谦是甲午海战失败的替罪羊”一文。

1993年，季平子在《福建论坛》发表《关于方伯谦的三项罪名纯属捏造》。同刊另有9篇翻案文章。

同年7月，翻案者王琰责任编辑的《中日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集》出版，集合了30余篇翻案文章。

同年9月，方俪祥由堂弟方镛陪同到刘公岛祭奠，“方女士在威海市遇到陈贞寿教授等，遂同行，这时她才知道还得坐渡船过海呢！”¹看到陈列的“济远”舰遗物，方俪祥充满感慨，“参观完毕，默祷伯公方伯谦：你一片忠心为国，却被诬害，人头落地，血溅旅顺黄金山。你的冤魂日日夜夜飘忽在黄渤海上，无处归依，上天见怜，使‘济远’舰炮械、锚、桅又回归祖国，战舰残躯仍旧沉睡在旅顺口水下，你才有所归宿。如今出水许多文物，这是留在人间的证物。40年来，你受到国人的唾骂。但是，国内的历史学家、学者，经过不断的探讨，绝大

¹ 王彦：《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多数认为清政府给你的三大罪名都是‘莫须有’的。”¹

1994年4月26日,《中国海洋报》登载刘义杰作“方伯谦是民族罪人吗”。

1994年8月,北京举办纪念甲午海战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翻案者孙克复、方俪祥等在会上发言。

1994年9月,威海召开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翻案者方俪祥、孙克复、林伟功、林濂藩与会提交了论文。大会将涉及方伯谦问题的讨论分在第七分会场,该会场的讨论者先后讨论认为“济远”舰因为重伤才回到旅顺、不是先逃、存在西战场等5个问题,“第七分会场热烈讨论了五个问题后,坐在林濂藩将军身旁的辽宁省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克复问林将军伊东说‘牙山之役,方伯谦甚谙海战,何故杀之?’方伯谦真的谙海战吗?林濂藩将军站起来,环视全场后举手说:方伯谦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批赴欧,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海军将领之一,他曾学习海军战术,在海战时(他用手势帮助表示)军舰可以作蛇形运动(~~~~),及不规则的变速运动(—•—•—),使敌人的炮无法瞄准,就打不到‘济远’的要害。这就是伊东说的‘方伯谦甚谙海战’。这一番用手势帮助表达的‘济远’作蛇形及变速机动航行的说明,语惊四座,全场发出‘哦!哦!哦!’的声音,大家都明白了。有人发言说,戚其章先生著《北洋舰队》内有‘来远’水手陈学海说‘方伯谦光想躲避炮弹,黄鼠狼满海乱窜’,依据林将军说的海军战术,那就说明方伯谦根本没有逃走还在战场上,而且用海军最高超的战术和日本先锋队周旋呢!林将军点点头说是,这时方俪祥女士也悟过来了,轮到她发言,她说:我听到林将军一席话,明白了海军的战术,方伯谦在第一游击队四舰围攻追迫下正是倚靠高明的战术动作拖住了敌人,分散了联合舰队的兵力,使日本联合舰队不能实现歼灭北洋舰队于海上的计划,这不是方伯谦的大功一件吗?”“当天晚餐时,方女士对林将军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林将军轻轻地说:‘不懂海军,无知呀!老是方伯谦临阵脱逃、逃跑,日本人在窃笑,我不得不加以说明呀!’”²

威海会议期间,威海市组织与会者参观市容,在环翠楼广场看到邓世昌铜像旁的太阳犬塑像,林濂藩向有关部门提意见“世界各国海军都不准在舰上养狗,唯独当年的俄国远东舰队养有‘军犬’,由于白令海峡雾特别浓,当时没有雷达,

¹王彦:《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页。

²王彦:《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312页。

因为狗灵敏，遇到礁石或船舶它先吠。但中国海军从来不准在舰上养狗，现今的中国海军同样不准在舰上养狗，何况剧情中邓世昌养的是宠物狗，不要让世界友人嘲中国军舰炮筒晒裤一样讽刺中国军舰养狗。¹

同年9月，由林濂藩子林超出资，北京三家村文化公司运作，林濂藩《中日甲午海战百年祭》一书出版。

同年10月6日，《人民日报》登载文章“方伯谦死因有新说”。

同年，郑守正在《史学月刊》发表“方伯谦与丰岛海战”。

同年，原海军第六舰队军务参谋王彦编写《啊！第六舰队》时，为寻找方莹的简历，前往福州查找方莹的家属、后代，意外听到了方伯谦的故事，并获得了方莹的女儿方俪祥的通讯地址。“林伟功同志赠送一本《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连夜阅读，彻夜未眠，为之感慨！至凌晨拟定了一个《甲午海将方伯谦》的目录，经过反复修改打印，返沪后寄给了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方俪祥女士。²

1995年5月，方俪祥在《历史档案》发表“李鸿章扣押效卯急电与方伯谦冤案”。

1996年10月5日，福州鼓楼区政府将方伯谦旧居定名为“方伯谦故居”，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王彦拜访在上海工人疗养院治疗休养的方俪祥，“忽有王彦先生（又名王宜林）来访，他说当年他和许多同志从陆军调海军，受到方莹副司令员的训练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海军干部……又说我军在江苏省泰州市白马庙建人民海军纪念馆，独缺方莹副司令员的资料，命我到福州市找，我找到福州市地方志编辑林伟功，才知道你的地址，林伟功给我许多方伯谦问题的资料，我知道方伯谦是方莹的大伯父，我要写一本《甲午海将方伯谦》，以方莹副司令员教导的海军特有的战术，说明甲午海战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是英勇善战，是尽职的，没有逃跑，是冤杀的。还要请张爱萍老将军题字，以告慰方莹副司令员在天之灵。”³

¹ 王彦：《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² 王彦：《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

³ 方俪祥：“缅怀张爱萍上将”，收录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页。



方俪祥（中）与张爱萍合影

1997年4月22日，张爱萍分别题写“方伯谦故居”、“海军世家”条幅。

同年5月，王彦电话在美国的方俪祥，告知张爱萍题字已得。

同年5月20日，张爱萍接见方俪祥、王彦等，表达对方莹的深切缅怀。经过叙话，发现张爱萍夫人与方俪祥为校友。

同年，由方俪祥出资，王彦作《甲午海将方伯谦》出版。

同年9月25日，“方伯谦故居”、“海军世家”挂匾，《甲午海将方伯谦》首发。

同年12月5日，《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王彦（王宜林），“向他征询《甲午海将方伯谦》是历史传记还是虚构性质的报告文学？王说：‘绝没有一丝一毫虚构，完全是历史，都有史料为证’。当问他‘西战场’说的依据时，王答‘所有史料都是这么说的，主要是根据日本的海战图。’于是他们一起查找海战图，但却找不到任何依据。王宜林又说：‘是地图印错了，印刷错误，工厂的人向我解释过了。’”

1998年初，王彦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文汇报》，认为姜鸣、刘申宁针对《甲午海将方伯谦》在《文汇读书周报》所作的书评造成该书滞销、退货，要求赔礼道歉，赔偿其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庭审中王彦出示方俪祥为该书出资的证据，在得悉《甲午海将方伯谦》属于非法出版物，自己的诉求不但得不到法律支持，还会受到法律追究后，王彦撤诉。

2002年10月3日，方俪祥与王彦相约寻踪原民国海军上海联欢社，由一名女护工推着轮椅来到重庆南路182号门前，方俪祥指着铁门说“这就是原上海海军联欢社旧址”，“有伯公方伯谦的血衣”。新地追述：……她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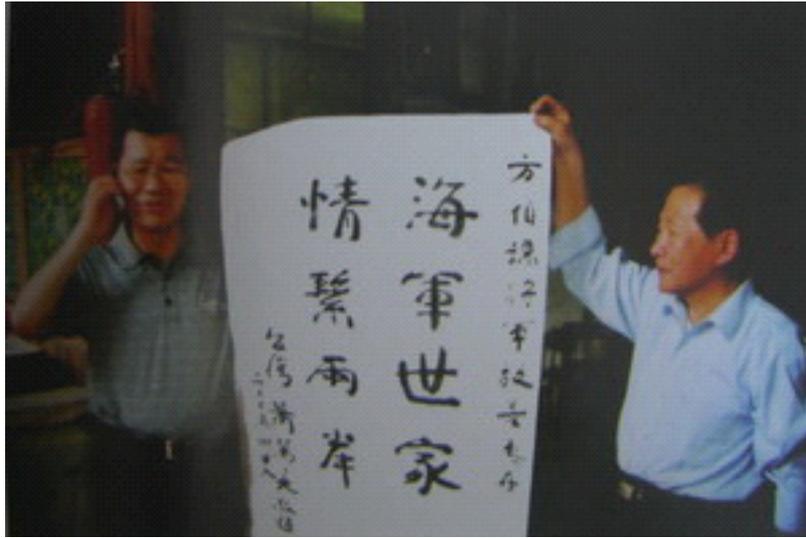
一个房间曾挂过她“方俪祥女士记忆忧到许多海军官兵坐天、喝茶、吃点心，俪祥和姐姐是双胞胎官兵们先问那个是故意地把两姐妹掉又有人将暗号拿掉，谁是妹妹，谁猜错个故事给大家官猜错了，主动表演

‘方管带打日本兵’，他显示打炮，打呀、打呀，日本军舰逼近了，炮弹打光了，他问我们姐妹，没有炮弹怎么办？姐妹俩急了说不出什么办法，他启示地说：不要紧，你伯公管带忽然想起弹药舱内还有德国造船厂试炮剩下的四颗炮弹。就叫水手下舱去搬炮弹。接着两名水手站起来说：我们去搬炮弹。他们表演得很逼真，朝前奏，走几步，又退，退几步，忽又东倒西歪以显示海上风浪很大。有个水手要拉方俪祥，她吓得向后躲藏，有人拦着她说：好了，小妹妹，炮弹搬上后甲板了，迅速交给了后主炮炮手。他们接着表演将炮弹推进炮膛，炮手在瞄准敌舰，有人喊着方管带命令开炮，轰、轰、轰，三发炮弹在敌舰上爆炸了，将日本军舰大炮了。大家拍手叫好，十分高兴地喊道：‘打胜仗了！’”¹

2004年9月，威海召开甲午海战一百一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翻案者林伟功提交“新发现的中日甲午战争史料及思考”。

同年10月，迟浩田题写“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条幅。

¹ 王彦：《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301页。



2005年，方俪祥的亲家肖万长参观方伯谦故居，题写“海军世家，情系两岸”。

2007年4月，王琰策划、责编，王彦编纂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一书出版。

同年，该书披露方俪祥女士听说的一则故事，方俪祥称“我是方伯谦后裔不便说，当年的讲解员，迄今若还健在也要超越百岁了，我说出来史家认为是孤证，也不会相信的。”王彦认为“就权当是个故事吧，信不信自由论断”。故事内容为“方女士回忆青年时期随父亲去瞻仰上海海军联欢社内大伯公的血衣时，当年的讲解员曾演示给她看，丰岛海战中，济远炮弹即将告罄，方伯谦急中生智，突然记起在舱底尚有当年随舰从德国运回的四颗炮弹，就教水手去搬，这名水手应该就是王国成，他又召来一名水手，应该即使李仕茂。当时济远正高速航行规避敌舰炮火，舰体颠簸，炮弹从舱底搬上舱面，再运到炮位，来来往往，王国成又力素弱，既要考虑速度，又要顾及防爆和安全，可想见艰难与勇敢，但他终于及时供给了后主炮弹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¹

（作者：海军史研究会会员，“北洋水师”网站站长）

¹ 王彦：《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研 讨

方伯谦修筑威远炮台考略

吉 辰

引 言

1884年，时任北洋海军“威远”舰管带的方伯谦奉命在旅顺口修筑了威远炮台，这是一段无可争议的史实。但是，在近年来为方伯谦翻案的热潮下，筑台一事被某些人士大加渲染和利用，作为标榜方氏才干的一大论据。笔者认为，方氏此举并无特殊意义，不能作为其才能突出的证据，是以撰写本文，以期廓清人为制造的迷雾，真实地体现这一史实，以便对方伯谦进行正确的评价。

一、方伯谦筑台之简要经过

1883年12月，为彻底控制越南，法军进攻驻越南山西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双方虽于次年5月开始谈判，并签订了《中法简明条款》，但6月发生的观音桥冲突又使局势恶化。此后，法国驻远东的舰队（包括“东京”和“中国”分舰队，8月合并为远东舰队）开始向中国东南沿海四处渗透，其中重点是基隆和闽江。8月5日，法舰炮轰基隆炮台，并派遣陆战队登陆，但于次日被击退。23日，法舰又在闽江马尾歼灭了福州船政局所属的大部舰船。10月1日，法舰再攻基隆，虽然由于清军的主动撤退而将其占领，但对淡水的进犯则被挫败。

在东南狼烟四起的同时，亦有谣言称法舰即将北上。联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直逼京畿的惨痛往事，北方防务确实不容忽视。作为正在建设的海防重镇，施工中的北洋海军旅顺基地开始赶筑炮台，准备应对法舰可能的来袭。截至1885年，除了1883年已经竣工的黄金山炮台（此后亦有后期工程）外，旅顺另筑成大小海防炮台9座¹。

其中，位于旅顺口西岸，老虎尾西南小山上的一座炮台，为北洋海军“威远”练习舰管带方伯谦所修筑。该炮台修筑于1884年，建成之后“即暂用该船之炮及炮手弁目，由方都司督守”²。炮台原本无名，仅被称为“土炮台”，后以方氏

¹ 王家俭：《旅顺港建港始末》，《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117页。

² 《修筑土炮台工程完竣禀》（光绪十年八月十二日），丁振铎编：《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集》，引自张本义、吴青云主编：《甲午旅大文献》，大连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所带军舰之名命名为威远炮台，其所耗经费为 3425 余两¹。

二、部分论者对筑台的评价

最早着重论述修筑威远炮台一事，并以此作为正面评价方伯谦之论据的，当属刊行于 1895 年的《冤海述闻》一书（据戚其章先生考证，该书作者“冤海述闻客”应为北洋海军“济远”舰帮带大副何广成²）。书中言道：“洋员德人汉纳根以旅顺筑炮台事与方管带素有嫌隙（甲申，法人肇衅，方时带威远练船在旅顺防守，请于险要处建造炮台，既成，名曰威远炮台，为费仅数千两。先是，旅顺炮台多汉纳根所造，每台开费数万两。至是相形见绌，衔之。后此汉纳根复筑炮台，开费亦降）。”³

这一记载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据此对方伯谦进行评价。譬如，姜鸣先生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写道：“中法战争时，他（方伯谦）奉命带舰戍守旅顺，亲自督修了威远烟台，因用费低廉而颇得好评。”⁴这段论述，显然源自《冤海述闻》。或者是因为考虑到了《冤海述闻》的史料价值，姜先生对此采取了相当审慎的态度，基本上只是照录记载，没有加以发挥。而对于汉纳根因筑台与方伯谦结怨的说法，姜先生也没有采信。

然而，另外一些论者则没有这样稳重。台湾海军退休中将林濂藩在《论方伯谦被杀冤案问题——甲午海战系列之一》一文中称：“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时年 33 岁（按，林文误，应为 32 岁），因发生中法甲申战争，方伯谦奉命，在旅顺构筑威远炮台，筑台完成并兼职防守。前此我国沿海炮台之构筑，均系借重外国人代为设计督造，而我国国人不与焉。例如：威海与旅顺两港沿岸炮台不下数十座，除威远炮台外，均系委请德人汉纳根（即黄海海战时舰队副提督）所代建，但构建费用远为昂贵（请参看附表旅顺炮台工程费用一览表）。据云方伯谦督造威远炮台完成后，汉纳根建造费用即为之滑落，此或是汉纳根与方伯谦不睦原因之所在。”⁵林文不仅完全照搬了《冤海述闻》的记载，而且还给方伯谦戴上

¹ 《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4 册，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08 页。

² 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83—187 页。

³ 《冤海述闻》，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 6 册，第 86 页。

⁴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351 页。

⁵ 林濂藩：《论方伯谦被杀冤案问题——甲午海战系列之一》，林伟功，黄国盛主编：《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6 页。

了一项“首创自主”的桂冠，将筑台一事列为方氏“可行以传世”的五事之一。

其他论者也有相似的观点，如戴学稷先生认为，“威远炮台的建成，开创了中国人主持修建近代化炮台的先例，张扬了中华民族的志气”。¹

而2003年《福州晚报》刊载的《破解方伯谦冤死之谜》一文，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拔高，声称“方伯谦是近代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海军将领之一，曾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修筑的海防炮台“威远炮台”。²

最近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一书中，在“方伯谦简介”部分，也出现了一段与以上引文雷同的评论³。

综上所述，有不少论者援引筑台一事作为正面评价方伯谦的论据。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最早论述筑台的“冤海述闻客”起，几乎所有持此论者都具有强烈的为方翻案的倾向。

三、威远炮台的费用问题

以上论者以筑台一事褒扬方伯谦的主要理由，是耗资较少，较汉纳根所造炮台成本低廉。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如上文所述，林濂藩先生在《论方伯谦被杀冤案问题——甲午海战系列之一》一文中论述了筑台问题，并以附表证明汉纳根所造炮台的费用比威远炮台昂贵得多。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林文所附表格，其实源自近代海军史专家王家俭先生《旅顺港建港始末》一文的附表（王文附表比林文附表少“开建日期”、“用款”两项，但其内容散见文中），而刻意增加了“建造人”一项，以突出方伯谦的作用。⁴对此，林文中丝毫未有“引用王文”的说明，俨然据他人成果为己有。为了表明对原创者的尊重，本文一概引用王文资料（王文的统计也有一定问题，详见后文）。

王文的统计表明，旅顺口的10座海防炮台中，除了团山和田家屯两处炮台造价未知外，威远炮台的耗资仅超过用费1750余两的田鸡炮台。而从附表上看，威远炮台装备2门150mm重炮，火力颇不弱，不免会让人产生“物美价廉”之感。戴学稷先生因而评论道：“在此之前，我国沿海炮台的建筑，均系依靠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代为设计与督造，其建筑费用都较昂贵。例如旅顺沿岸由德人汉纳

¹ 戴学稷：《方伯谦及其海军生涯》，《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50页。

² 刘琳：《破解方伯谦冤死之谜》，2003年3月16日《福州晚报》。

³ 王宜林编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⁴ 林文是为1991年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而写作的，而王文为作者所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中之一篇，孰先孰后一目了然。

根所建的老虎尾炮台化了五千三百多两。而由方伯谦主持修建的这座炮台，规模与老虎尾炮台相当，同设有长炮两架，炮筒口径还较它大3厘米，却只用了三千四百余两，费用节省了三分之一以上。”¹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罢了。3425余两的费用，乃是炮台于1884年竣工之后的报账。当时的威远炮台，不过是一座十分简陋的“小土炮台”而已。鉴于该炮台的防护薄弱（并无其他一些炮台所具有的土石围墙²）、火力不强（其最初的武备，是从“威远”舰上拆卸下来的3门小炮，之后又换成“操江”舰上的旧炮³），1887年又对它进行了一次改建，包括“添筑石墙并添建子药零件库，改筑炮盘，添改兵房”，耗资3108两，几乎相当于又修建了一座同等规模的炮台。⁴其中，“改筑炮盘”一项，显然是为换装150mm炮做准备的。这次改建，与方伯谦毫无瓜葛。自此之后，威远炮台才成为一座有相当价值的炮台。可见，戴文那样的评价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王文对炮台费用的统计未曾包括1887年改建的耗资（除了威远炮台外，馒头山、老虎尾、蛮子营等炮台同期也进行了改建），可谓缺憾之处。不过文中称威远炮台“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开工，至八月初八日全台告竣，计用款三千四百余两”，虽然不全面，但这样说是不错的。而林文修改了王文的附表，使3400余两的用款与2门150mm炮的武备直接挂钩，这就错得离谱了。

海军老兵王宜林先生自称曾赴旅顺实地调查，声言威远炮台“迄今仍坚固完好”，并拍摄照片为证⁵，以褒扬方伯谦修筑有方。且不论王先生所见的是否真为这座炮台（王称该炮台有5个炮位，而威远炮台最终只设置了2个炮位），即使威远炮台现在的确坚固，这份功劳也不能算在方氏头上。如上所述，炮台的改建与方氏无干。而且，俄国强租旅大之后，对旅顺海岸炮台在原基础上进行了整修。在这重重加工之下，人们已经根本无法见到方氏筑台时的那座“小土炮台”的原貌。

总之，要说方伯谦修筑的威远炮台（即改建之前的炮台）物美价廉，实在是

¹ 戴学稷：《方伯谦及其海军生涯》，《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50页。

² 可将威远炮台与黄金山炮台、馒头山炮台的经费报销内容作一比较，见《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8—2309页。

³ 王家俭：《旅顺港建港始末》，《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⁴ 《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5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5页。

⁵ 王宜林编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18页。

不合事实的。¹顺便一提，如果非要在建筑经费上比赛省钱的话，当时天津武备学堂修筑的一座炮台足以将威远炮台结结实实地比下去——这座炮台仅仅耗资 129 余两。²

附旅顺口炮台表（引自王家俭《旅顺港建港始末》）

名称	位置	炮数		完工年月
黄金山炮台	东岸	16	24 生的巨炮 3 12 生的炮 5 12 磅护墙炮 8	光绪十年(1884)五月。(十一年补修)
唠口律嘴炮台	东岸	13	24 生的 35 口径长炮 3 12 生的 25 口径长炮 6 8 生的小炮 4	光绪十一年(1885)
老虎尾炮台	西岸	2	12 生的 35 口径长炮 2	光绪十年(1884)五月
威远炮台	西岸	2	15 生的 35 口径长炮 2	光绪十年(1884)八月
蛮子营炮台	西岸	8	19 生的 35 口径长炮 4 12 生的墙炮 4	光绪十至十一年(1884-1885)
母猪礁炮台	东岸	8	24 生的大炮 2 15 生的 35 口径长炮 2 8 生的边炮 4	光绪十一年(1885)
馒头山炮台	西岸	7	24 生的 25 口径长炮 3 12 生的 25 口径长炮 4	光绪十年七月兴工，完成时间，不详。
田鸡土炮台	东岸	6	15 生的后膛田鸡炮 6	光绪十一年一月由汉纳根监修
团山土炮台	西岸		不详	光绪十年五月由汉纳根监修
田家屯土炮台	西岸		不详	光绪十年五月由汉纳根监修

四、威远炮台的意义问题

在探讨了费用问题之后，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威远炮台是否具有首创性的意义。

首先可以肯定，“中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修筑的海防炮台”这种提法绝对是错误的，不值一驳。中国自主设计修筑海防炮台的历史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威远炮台无论如何也排不到第一。

那么，加上一个定语，威远炮台是否可以称为“中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

¹ 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有所论述，见陈悦：《扭曲的利刃——“济远”级穹甲巡洋舰》，《北洋海军舰船志》，《现代舰船》杂志社 2006 年版，第 38 页。

² 《海防用款立案折》（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5 册，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04 页。

计、修筑的近代化海防炮台”（如戴学稷先生的提法）呢？笔者认为，这是同样讲不通的。

早在威远炮台修筑的数十年前，西方的近代化炮台技术已经传入中国。魏源所编著的《海国图志》一书中，即收有闽人丁拱辰撰写的《西洋低后曲折炮台图说》、《西洋圆形炮台图说》两篇介绍西方炮台技术的文章。而德国军官希理哈所著《防海新论》在中国的翻译和刊行（中译本印行于19世纪70年代初），更对当时的炮台建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¹此外，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1877—1878年任职期间，也引进了一些西方炮台技术，并成功促进了国内炮台技术的改良。²

在这些技术的指导下，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陆续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炮台，较早的如淮军将领吴宏洛于1874—1877年在吴淞南石塘等地修筑的炮台群。³修筑于1884年的威远炮台，岂能称得上“第一”？

另外，威远炮台为方伯谦自己所设计的说法，也是无法成立的。首先，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实这一论点。李鸿章的相关奏折是这样陈述的：“威远练船管带官建筑旅顺口西岸小土炮台”⁴，并未提及“自行设计”。而在方伯谦自撰的《益堂年谱》中，也只是简单地记载“（光绪十年）六月，船在旅顺，建威远炮台而守之”而已。⁵可以想见，如果炮台真是出自方氏自己的手笔，对于这件值得炫耀的功劳，他必定会在年谱中大书特书一番。其次，方伯谦是作为海军指挥人员被培养出来的，并未接受过军事工程方面的教育，很难想象，他能够无师自通地设计一座近代炮台。

而当时负责统筹旅顺工程全局的袁保龄在禀文中对此是这样陈述的：“丁镇饬威远练船方都司伯谦承修小土炮台一座”。⁶很明显，方伯谦在筑台中发挥的作用只是“承修”而已，即作为一位“施工队长”督率工人进行施工。从这段记载中也可看出，修筑威远炮台是丁汝昌所指示的，而非《冤海述闻》所言，为方氏主动请缨。

¹ 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00—402页。

² 张宇权：《论晚清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德国的活动与思想》，《德国研究》2004年第4期，第33页。

³ 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29页。

⁴ 《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8页。

⁵ 《益堂年谱》，林伟功，黄国盛主编：《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附录一，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页。

⁶ 《修筑土炮台工程完竣禀》（光绪十年八月十二日），丁振铎编：《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集》，引自张本义、吴青云主编：《甲午旅大文献》，大连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承修”一语，又见《黄金台培土并拟筑馒头山炮台禀》（光绪十年七月十二日），第6页。

可见，威远炮台在晚清的海防炮台中，是十分平常的一员，没有任何特殊意义可言。

五、方氏是否因筑台与汉纳根结怨

至于《冤海述闻》所云方伯谦因筑台与汉纳根结怨一事，笔者认为也是不足采信的。如前所述，方伯谦所建的威远炮台虽然耗资不多，但仅仅是一座“小土炮台”，根本无法与汉纳根亲自规划的黄金山、蛮子营、馒头山诸炮台相提并论。作为修筑炮台的行家，德国工兵上尉汉纳根绝不至于因为此事与方伯谦有所龃龉。

而且，事实也绝非《冤海述闻》所记载的“后此汉纳根复筑炮台，开费亦降”。譬如，牧猪礁（一作母猪礁）炮台建于1885年，是在方伯谦修建威远炮台之后。而该炮台耗资19039余两，大大超出威远炮台的用款。¹可见，汉纳根根本没有因为感到“相形见绌”而在炮台建设费用上刻意削减。

再联系《冤海述闻》一书的写作目的与可信程度，²只能认为，方氏因筑台与汉纳根结怨的说法，完全为作者所杜撰，其目的是证明汉纳根有挟私报复方伯谦的动机，以佐证方伯谦“蒙冤”的观点。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方伯谦所修筑的威远炮台称不上“物美价廉”；第二，威远炮台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海防炮台，没有任何“首创”的意义；第三，汉纳根没有因为威远炮台耗资较少而与方伯谦结怨。总之，筑台一事不能算作什么丰功伟绩，也没有给方氏带来什么后患。当然，无论如何，方伯谦在旅顺口加紧建设防务之时是出了力的，这一点应当肯定。但是，评价人物必须实事求是，如“开创了中国人主持修建近代化炮台的先例，张扬了中华民族的志气”这样的美誉，距离事实未免太远了。笔者衷心希望，在方伯谦问题的研究中，论者们都能够摒弃个人倾向的影响，还原一个真实的方伯谦。

（作者：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员）

¹ 《海防用款立案折》（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7页。

² 参见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187页。

甲午丰岛海战战事考

陈悦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军舰在朝鲜南阳湾外的丰岛附近海面向在此经过的中国舰船发起突然袭击，挑起了丰岛海战。此战是甲午战争中海上战场的先声，历来不乏对其关注者，由于海战中中方参战军舰之一是方伯谦管带的“济远”舰，现代的方伯谦翻案论者对方伯谦、“济远”舰在此战中的表现作出了特别关注，如季平子、林濂藩等皆有关于丰岛海战的专门论述，然其文虽然名为丰岛海战，但对海战进程实际并无详细考订。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中外史料，对丰岛海战的战事情况本身加以分析，借以理清战事进程，了解“济远”等中国军舰在此战中的真实表现。

中国运兵牙山行动情况

1894年春夏之交，朝鲜半岛发生了规模浩大的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应对无措，遂延请宗主国中国直接出兵代为戡乱，对朝鲜觊觎已久的日本认为有机可乘，利用《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约文的漏洞，也向朝鲜派出大批军队，并占据了汉城等要地。

面对剑拔弩张的情势，中国清政府在战和方策上徘徊不定，直到外交斡旋努力彻底失败后，才决定由北洋大臣李鸿章着手应急增加在朝军队兵力。根据李鸿章的布署，增兵主要分为两个方向，首先是北路，鉴于日本控制了朝鲜首都汉城这一事实，决定进占大同江畔的朝鲜第二大城平壤，依托大同江天险，阻止日军北上，进而以此为后方挥师南进驱逐日军。7月21日派遣原驻扎天津小站的总兵卫汝贵部淮系盛军步骑13营计6000人，以及驻扎旅顺口的骁将提督马玉昆部毅军6营2000人，先由大沽海运至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然后从陆路经朝鲜边境重镇义州开赴平壤（原计划直接海运经大同江登陆平壤，但是因为日本海军在韩国沿海活动频繁，而且大同江口被布设了大量水雷而作罢）。此外，经过电商盛京将军，派遣提督左宝贵部关外淮系奉军3500人由东北陆路进入朝鲜，抢占平壤地利，总计北路兵力11500人。

南路方面，李鸿章原计划将深陷日军势力后方的牙山驻军海运北上，从大东

沟登陆后会同北路各军一起进驻平壤，但是统帅叶志超担心当时日本海军已经麇集仁川一带，海运风险过大，建议仍然坚持驻扎在日军后方，一旦战争爆发可以“梗日兵南路”。李鸿章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为加强牙山守军实力，增调了淮系吴育仁部仁字营以及天津练军 2500 人，由记名总兵江自康率领，冒险直接海运登陆牙山增援。为增加安全性，李鸿章没有选择使用招商局的商船运输，而是通过津海关道、总理后路转运事宜盛宣怀，重金租赁了 3 艘英国印度支那汽船公司的商船“高升”、“爱仁”、“飞鲸”，期望高悬的米字旗，能让日本军队有所顾忌。¹

1894 年 7 月 19 日，李鸿章电告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通报了租用 3 艘英国商船，及调派招商局“镇东”商船，于当月 21、22、23、24 每日开航一艘运兵牙山的计划，要求海军“酌派兵船数只，届期往牙山海口外游巡”，特别强调“须俟四船人马下清后，再巡洋而归”。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还注明“无需兵船护行”，由于战事尚未实际爆发，李鸿章的命令只是要求北洋海军军舰在牙山湾外守护，因而军舰担负的是登陆场警戒任务，而非运兵船航行中的护航。²

7 月 20 日，主持船只调派具体事务的盛宣怀致电丁汝昌，修正了运兵方案。因为运兵船水深，不可能直接靠岸，只能停泊在深水锚地再将人员物资转运到小驳船内，驶入浅水驳运上岸。由于牙山湾内驳船数量只有 30 艘，担心一天时间无法卸清一艘运兵船，于是运兵船出动的日期更改为 21 日开“爱仁”，23 日开“高升”；25 日开“飞鲸”，每艘间隔一天，以便驳运。通报最后，盛宣怀再次强调，“贵部驻牙，须俟各船卸完，方能放心”，即北洋海军派往牙山巡防的军舰，必须守护 3 批运兵船都卸载完毕。³

7 月 21 日下午 6 时，运载增援牙山军的第一艘运兵船“爱仁”从大沽口出发，揭开增兵牙山的序幕，7 月 22 日上午 9 时，北洋海军派赴牙山海口守护登陆场的“济远”、“广乙”、“威远”3 舰从威海起锚出发⁴。考虑到朝鲜严峻的中日抗衡局势，临行前，“广乙”管带林国祥请示提督丁汝昌危机处理办法，“林君即请示于丁军门，若遇倭船首先开炮，我等当如何应敌？军门曰两国既未言明开战，

¹ 关于增兵方案，见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李鸿章“寄译署”。六月十五日“寄朝鲜成欢交叶提督”。《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779—780 页；785 页。

² 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七日，李鸿章“寄丁军门”，《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790 页。

³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0 页，（60）。

⁴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4 页，（85）。

岂有冒昧从事之理，若果倭船首先开炮，尔等亦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¹仅从次序看，虽然“爱仁”出发时间早于“济远”等舰，但是“济远”编队航速较高，且从威海开赴牙山的直线距离比从天津出发短，实际到达牙山时间早于“爱仁”，也就是登陆场会先置于北洋军舰的警戒、保护之下。

7月23日，“济远”、“广乙”、“威远”首先到达朝鲜南阳湾内的牙山湾锚地警戒（牙山附近的海湾靠近牙山的部分称为牙山湾，再远接近海口的部分成为南阳湾，实际是一个相连的大海湾），24日早晨4时，“爱仁”抵达牙山湾²，早晨6时牙山湾内的驳船到达锚地，于上午7时将兵员全部下载到驳船³，由于从牙山湾锚地到登陆点白石浦里距离60里之遥，驳船都是无机械动力的木船，“广乙”等舰遂将舰上的火轮船板吊放到海中，帮助拖带驳船行动，加快转运速度⁴。经过整备，上午8时“爱仁”号即返航。当天下午2时，第二艘出发的运兵船“飞鲸”号也抵达牙山湾开始卸载。⁵

根据最初拟定的运输计划，第二艘出发的运兵船原本应该是“高升”号，但是在大连装运过程中发生混乱，原本应该由“高升”搭载的义胜营两哨、芦防马队以及大批火炮、马匹误装上了“飞鲸”，遂将错就错，不按最初制定的运兵时间表，于7月22日下午5时30分由“飞鲸”作为第二艘运兵船先开航牙山。⁶“高升”则改作第三艘出发，出发时间提前到7月23日。⁷

中日军舰丰岛相遇

中方的运兵登陆行动于7月24日全面在牙山湾内开始，而就在这一天凌晨“爱仁”轮抵达南阳湾口时，船员发现了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当未进口时，遥见隐隐有倭兵船一艘停泊。俟出口时，该倭船即未见。”⁸

同样的情况也为“广乙”舰所注意，“六月二十二日，忽见一倭铁甲船在白

¹ “广乙兵轮战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倭战守始末记》，（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34页。

² “爱仁”抵达牙山的时间见“满德上李鸿章禀”，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³ “满德上李鸿章禀”，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页。

⁴ “广乙兵轮战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倭战守始末记》，（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34页。

⁵ “瓦连航海日记摘抄”，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⁶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8页，（104）、（105）、（106）。“飞鲸”从大连出发时间见：“瓦连航海日记摘抄”，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⁷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125）、（126）。

⁸ “满德上李鸿章禀”，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页。

石浦口外游弋。”¹

经过对比史料，牙山湾外日本军舰的身份和任务很快明了，即日本派在仁川一带执行侦察、通报任务的“八重山”等军舰。

蛮横地拒绝了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后，日本明治政府即开始准备挑起战争。1894年7月19日，日本海军主力被统编为战时体制——联合舰队，集结于佐世保，20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主力开赴朝鲜忠清道西海岸的命令，同日下午5时，新任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也来到佐世保作出训示。23日上午11时开始，日本联合舰队主力离开佐世保出航，由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率领的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浪速”3艘军舰提前于整个舰队，充当前哨警戒，²并担负有一个重要使命，“且赋与内命，谓牙山湾附近如有优势的清国军舰驻泊，可由我方进而攻击”⁴。关于日本方面为何作出这样的时间表，目前尚无直接的史料可作解释，但是结合这段时间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整体布署，即可以窥见端倪，1894年7月20日，即得到情报，命令联合舰队前往朝鲜海岸南阳湾一带攻击的当天，日本政府向朝鲜递交最后通牒，命令其于22日前下旨驱逐在朝的中国军队，而22日即中国第一艘运兵船“爱仁”即将抵达牙山湾的日子。22日期满后朝鲜政府未答应日方要求，在朝日军遂于23日凌晨攻占朝鲜王宫，扶植傀儡政权，操纵朝鲜傀儡政府下令驱逐中国军队，还是在23日这天，日本联合舰队便大队出航，因为从此时起挑起战争，日本已经有了国际法上的藉口，即应朝鲜政府请求帮助驱逐在朝中国军队。

7月24日上午目送走第一艘运兵船“爱仁”后，守护牙山湾锚地的中国军舰编队里的“威远”舰被派往仁川探信，了解局势，于7月24日傍晚5时30分回到牙山湾锚地⁵，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韩王已被倭奴所虏”⁶牙山湾锚地警备小队队长方伯谦感到局势恶化，即下令加快驳运，命令不堪战事的“威远”

¹ “广乙兵轮战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倭战守始末记》，（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34页。

² 据戚其章《甲午战争史》所述，20日日军已经明确要前往朝鲜海岸攻击中国舰船。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7页。

³ 日本联合舰队的编成，出港航行顺序，参见[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69—85页。另见：“伊东海军中将关于黄海海战的演说”，收录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7），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26—227页。

⁴ [日]田保桥浩著，王仲廉译：《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南京书店1932年版，第186—187页。

⁵ “瓦连航海日记摘抄”，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⁶ “瓦连航海日记摘抄”，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舰当天晚上 9 时 15 分即返航威海¹，同时命令“广乙”准备启航，预备在回航途中遇到第三艘运兵船“高升”时即命令其立刻折返大沽或威海。²由于第二艘运兵船“飞鲸”装载的多是火炮、军马，转运到驳船中非常费事，³直到 25 日凌晨 1 时才卸载了一半，但是方伯谦认为不能再拖延，催促返航，又因为“广乙”的舰载蒸汽舢板帮助拖带驳船航向牙山湾内的白石浦登岸未回，等到清晨 4 时才得以返航，“四点钟，天微明时，方得起碇与‘济远’同时出口西回”⁴。“济远”编队的离去使得牙山湾失去警戒防护，而“飞鲸”轮的卸载活动就在这种环境下至当天上午 9 时 15 分才结束。⁵

几乎在同一时间，7 月 25 日的清晨 4 时 30 分，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在朝鲜安眠岛附近发现在朝鲜沿海实行侦察等任务的“八重山”、“武藏”等军舰⁶，第一游击队遂提高编队航速至 12 节，以单纵队队形向南阳湾口的丰岛海域搜索前进。⁷

7 月 25 日清晨 5 时 30 分，中国军舰发现南阳湾外有煤烟。⁸

7 月 25 日清晨 6 时 30 分，日本军舰在即将到达丰岛海面时，遥遥望见丰岛海域有 2 缕煤烟向南靠近，判断有军舰前来，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下令舰队戒备，编队航速提高至 15 节。⁹

中日海军至此相遇。

丰岛战事经过

1894 年 7 月 25 日上午 7 时，“济远”、“广乙”2 舰一前一后成纵队队形到达丰岛附近，即将驶出南阳湾。丰岛是密布南洋湾外的众多小岛中的一个，北阔南狭，全岛最宽处 1388 米，最高处海拔 174 米，由于刚好处在南洋湾入口的中心

¹ “瓦连航海日记摘抄”，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82 页。“威远”返航的时间还有 7 月 23 日晚 11 时（《冤海述闻》）、7 月 24 日凌晨 2 时（“广乙兵轮战事”）等记载。

² “广乙兵轮战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倭战守始末记》，（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年版，第 34 页。

³ 据《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5 页（89）、17 页（104），“飞鲸”所载为 100 匹军马。但据“瓦连航海日记摘抄”，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82 页所载，军马的实际装运数量为 47 匹。

⁴ “广乙兵轮战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倭战守始末记》，（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年版，第 34 页。

⁵ “瓦连航海日记摘抄”，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82 页。

⁶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 84 页。

⁷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 84—85 页。

⁸ “济远航海日志”，转见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 81 页。

⁹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 85 页。

位置，异常险要，丰岛东南岛礁密布，大船无法航行，只有西北与公景岛之间的航道水深较深，是进入南阳湾上溯牙山湾白石浦里的必经之路。中国军舰编队通过丰岛、公景岛之间的狭窄航道，西南方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确认了前方煤烟下的目标是3艘日本军舰。¹

7时15分，中国军舰水兵就炮位，准备御敌。²

7时20分，双方距离缩短至5000米时，日本第一游击队判明正从南阳湾外驶的中国军舰是“济远”和“广乙”，“即时下战斗命令”。³号手吹响“战斗”号，各炮位做好战斗准备。⁴

1894年7月25日上午7时以后，中日舰队在韩国丰岛附近海面互相发现时，日本第一游击队以纵队队形航行，和同样成纵队而来的中国护航军舰编队大致是呈迎头并进的姿态，如果按此照直继续航行下去，并不利于发扬日本军舰舷侧火力凶猛的优势。因为当时日本一游编队处在丰岛外侧的开阔海域，而中国军舰正在丰岛与公景岛之间的狭窄航道上，由于日舰编队航速高，如果逼近攻击，狭窄的航道不利于舰队机动。经过反复考虑，日军定出一个策略，决定趁当时和中国军舰距离尚远，先主动向右后方外侧机动，拉开双方距离，等待中国军舰自己驶出狭窄航道，进入开阔海域后，再转向返回，利用航速高的特点，快速占领中国军舰侧面的有利攻击阵位后下手，以充分发扬舷侧火力的威势。

第一游击队的领队旗舰“吉野”首先向右侧后方进行16点（180度）大转向，⁵划出一个“n”形轨迹，调转航向背离中国舰队而去。根据日本海军战前的指令，考虑到在硝烟弥漫、弹片四溅的战场上，旗语指挥系统的可靠不高，为保证舰队在战时不至于失去统一指挥，编队军舰都必须紧随前一艘军舰的动作运动，但是这次调转航向的机动来得过于突然，命令下达后，尾随“吉野”之后的“秋津洲”舰并没有立即执行转向动作，第一游击队的编队内引发了混乱。

跟随在“吉野”之后的日舰“秋津洲”无法理解“吉野”掉头背离中国舰队

¹ “济远航海日志”，转见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另据《冤海述闻》载，7月25日上午7时30分观测到日舰3艘，“一吉野，一浪速，一不知名”。

² 此条出自“济远航海日志”，转见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但是据当时在“济远”舰的管轮洋员哈富门后来追忆，当时“不虞其有战事，一切均未预备”，是在日军开火之后才仓促布置炮位。见“纪济远兵船两次开仗情形”，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倭战守始末记》，（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44页。

³ “东乡平八郎击沉高升号日记”，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页。

⁴ [日]黛治夫：《海军炮战史谈》，原书房，昭和四十七年版，第80—81页。

⁵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88页。

而去的用意，舰长上村彦之丞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下令悬挂信号旗质问舰队司令为什么不战而掉头返回，“吉野”上随后挂起“目前舰队所处位置不利于军舰机动作战！”，继而挂起“跟随旗舰航行！”，弹压了这次混乱。¹

看到日本舰队掉转航向，中方一度以为“其不欲战”²，但是很快，当中国军舰驶出狭窄航道的同时，日本第一游击队又向左旋转 180 度，重新迎向中国舰队³，“旋转取势而来”⁴。

7 时 43 分半⁵，双方军舰接近至 3000 米，进入日本联合舰队炮术规定的有效射击范围，“吉野”舰上下下达了“战斗开始”号令，负责指挥舰首 150 毫米口径主炮炮位的炮台长吉松茂太郎海军大尉竟一片茫然，似乎还不相信战争真的将就此爆发，命令身旁的炮台副岛内恒太海军少尉候补生：“到司令塔询问一下是真的要开炮吗？”，岛内候补生不敢怠慢，飞速跑到司令塔附近请示，正站在飞桥上的测距仪旁督战，准备观察修正弹着点的“吉野”舰炮术长加藤友三郎海军大尉，对此急得破口大骂，“混蛋！回去告诉他赶紧开火！”⁶

根据中方目击，“吉野”舰当时射出的第一发是空炮。⁷

几分钟过后，7 时 45 分，“吉野”用左舷火炮射击。⁸由于这一阶段“济远”已从狭窄航道驶出，最先接近日军，因而日军的炮火最初主要集中向“济远”。⁹此时中日双方军舰编队呈两条对向前进的平行线形式。

7 时 52 分，“济远”开始向日舰还击。¹⁰

7 时 55 分、56 分，跟随在“吉野”之后的“秋津洲”、“浪速”先后到达合适阵位，即中国军舰进入其舷侧火炮的射界，向“济远”射击。¹¹

这一时段，“济远”舰遭到了极为猛烈的炮击。当日参战的日本军舰中，“吉野”是 1893 年刚刚成军的崭新穹甲巡洋舰，排水量 4216 吨，航速 23 节，主要

¹ [日]黛治夫：《海军炮战史谈》，原书房，昭和四十七年版，第 82 页。

² “广乙兵轮战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倭战守始末记》，（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年版，第 34 页。

³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 88 页。

⁴ 《冤海述闻》，方伯谦故居藏本。

⁵ “济远航海日志”，转见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 81 页。

⁶ [日]黛治夫：《海军炮战史谈》，原书房，昭和四十七年版，第 83 页。

⁷ 《冤海述闻》，方伯谦故居藏本。

⁸ “济远航海日志”，转见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 81 页。

⁹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 88 页。

¹⁰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 88 页。部分日方史料称丰岛海战的起因是中国军舰首先开火，对此，戚其章先生有过专门辩述，见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 73—78 页。

¹¹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 88 页。

武器有 150 毫米口径速射炮 4 门，120 毫米口径速射炮 8 门；“秋津洲”是 1894 年当年才完工的穹甲巡洋舰，排水量 3150 吨，航速 19 节，主要武器和“吉野”相仿，150 毫米口径速射炮 4 门，120 毫米口径速射炮 6 门；“浪速”舰排水量 3709 吨，航速 18 节，主要武器 260 毫米口径克虏伯架退炮 2 门，150 毫米口径克虏伯架退炮 6 门¹。据日本海军战后的统计数字显示，由于当天丰岛附近海况较好，舰体摇摆程度不大，火炮瞄准容易，因而日本军舰上火炮装填、发射速度都极快。150 毫米速射炮的射速达到了每分钟 4 发、120 毫米速射炮的射速更是达到惊人的每分钟 7 发，综合一游 3 舰，一侧作战时可以获得 5 门 6 寸炮（“吉野”3 门、“秋津洲”2 门）、7 门 4.7 寸炮（“吉野”3 门、“秋津洲”4 门），以及 2 门 260 毫米口径克虏伯和 3 门 150 毫米口径克虏伯火炮的火力，约计每分钟 17 门大口径火炮共可以投射 80 余发 100mm 以上口径炮弹，如果再计算入大量的机关炮火力，则火力更为可怖。²

相比之下，中国的 2 艘军舰就弱小很多。领队的穹甲巡洋舰“济远”排水量 2300 吨，新造时航速 16.5 节，这艘军舰于 1883 年下水，已逾 20 年舰龄，航速显然已经无法达到新造时的速度。此外，“济远”舰设计时正处舰首对敌战术盛行时代，因而军舰没有考虑安装 100mm 口径以上的舷侧炮，主要武器只有舰首炮台内安装的 2 门 210 毫米口径克虏伯架退炮，以及舰尾的 1 门 150 毫米口径克虏伯架退炮。跟随在“济远”之后的“广乙”更为弱小，排水量只有 1000 吨，航速新造时 16.5 节，主要武器为 3 门 120 毫米口径江南机器局造速射炮，总计舷侧对敌作战时 2 艘军舰仅能获得 2 门 210、1 门 150、2 门 120 口，计 5 门中大口径火炮的火力。³与日本第一游击队的 3 舰相比，差距可谓悬殊。

就在这轮交火中，“济远”先后出现了前主炮台炮罩、司令塔、露天备用舵轮等处先后被击中等情况。

W·Laird—Clowes 综合当时各种档案信息，于 1895 年在《海军年鉴》发表的文章详细描述了“济远”的几次中弹情况。

最先中弹的是“济远”舰的司令塔。司令塔是蒸汽时代以来军舰上的重要战时指挥场所，因为外壁有装甲防护，安全性较高。这种建筑通常位于飞桥甲板之

¹ 《世界的舰船》增刊“日本军舰史”，平成 7 年版。

² [日]黛治夫：《海军炮战史谈》，原书房，昭和四十七年版，第 83—84 页。

³ 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现代舰船杂志社，2006 年版。

下，以求其位置隐蔽，不易被击中，如“定远”、“致远”等但是“济远”的舰首有高大的主炮台遮挡，为了避开主炮台，司令塔便安装到了飞桥之上¹。翻案者林濂藩对此曾想当然地称“济远”舰的司令塔位于露天甲板之下，以此为方伯谦海战中躲入舱内装甲最厚处作解释，“另于主甲板下，在甲板与水线护甲之下，设置另一有严密防护之指挥中心，称为指挥台”，“文人、学者亲率落笔，指非匿为匿，不知伤了多少爱国军人的心！”²“济远”舰高处是在飞桥之上的装甲司令塔只要一看其照片便知，林濂藩等翻案者在对“济远”舰的技术构造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竟然就能作出如此肯定的“技术判断”，实在匪夷所思。需知道，即使把“济远”的司令塔拆装到主甲板下，也算不上是舱内装甲最厚处，“济远”的司令塔装甲厚度仅有 1.5 英寸，而其穹甲甲板厚度则是 4 英寸，那才是舱内装甲最厚处。

蒸汽时代的军舰上，平时指挥人员大都选择在露天的飞桥甲板上进行指挥，取其视界良好，而战时则一般进入装甲保护的司令塔内，取其安全。“济远”舰的司令塔位于飞桥之上，周围几乎没有遮蔽，目标十分明显，开战后很快便被击中，司令塔内的大副沈寿昌头部中弹，壮烈牺牲，脑血则溅洒在身旁的管带方伯谦身上³。现代一些为方伯谦翻案者，反复以民国海军曾陈列丰岛海战中方伯谦血衣的故事来证明其英勇，殊不知血衣上溅洒的是大副的鲜血，即使证明也只能是说明大副沈寿昌的阵亡异常惨烈而已。

司令塔中弹后，“At the moment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ight the captain, the first lieutenant, and a sub-lieutenant of the Tsi Yuen, were in the forward conning tower. The enemy's first broadside struck this, destroyed both engine-room telegraphs, the steam steering-wheel, and the voice tubes leading below, and killed the first lieutenant and the sublieutenant, leaving the head of the former hanging on the end of one of the voice-pipes. Not until this had happened did the captain, leaving the conning tower, order the ship to be cleared. He went to the hand-steering wheel. A second broadside struck the ship on the port beam, smashing the steam pipe of the steering engine, so that the vessel became for a time unmanageable. The captain

¹ 详见：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现代舰船杂志社，2006年版，第35页。

² 林濂藩：“论方伯谦在牙山海战中之地位与作为”，载于《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474页。

³ 池仲佑“甲申、甲午海战海军阵亡死难群公事略”，载于《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66页。

endeavoured to make temporary provision, but the necessary tackles were among the boatswain's stores,"¹ (粗译为: 战斗开始时, 舰长、大副、二副都在司令塔内, 敌方首轮舷侧炮击就击中这里, 车钟、蒸汽舵轮、传话筒都被打坏, 大副、二副阵亡, 其中一个人的头耷拉在传话筒上。舰长离开司令塔, 转往舵机舱, 此时又一颗炮弹击中左舷, 舵机的蒸汽管路被打坏, 军舰变得难以操纵, 舰长急忙组织用复滑车来代替操作舵机, 但是滑车索在水手长的仓库里。)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这则记载, 在司令塔中弹后, 方伯谦前往的地方是舰上的舵机舱, 而“济远”舵机舱的位置在舰底, 处于穹甲甲板的防护之下, 即全舰装甲最厚处。

紧接着, “济远”的炮台也被击中。一颗炮弹击中了一门 210mm 口径主炮的弹药扬升机, 另外一颗击破炮罩, 弹片在炮罩内四处反弹, 形成二次杀伤, 导致炮台人员大量伤亡, 枪炮大副柯建章、见习军官黄承勋即在此次受击中阵亡²。北洋海军露炮台上的炮罩厚度较薄, 主要用于防御敌方桅杆上机关炮的狙击, 无法抵御中大口径炮弹, 但是中大口径炮弹射入炮罩内爆炸形成碎片后, 炮罩却能挡住这些破片, 导致破片在炮罩内无法飞出, 而四处反弹, 大量二次杀伤人员。丰岛战后, 汲取了这一血的教训, “定远”等采用露炮台的军舰都纷纷将炮罩拆除。³

在此过程中, “济远”舰也在竭力向日舰还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19 世纪中后期的舰船和现代意义的军舰有一个重要区别, 即因为技术原始, 舰长并无法直接指挥全舰所有部位, 各炮位实际都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通常在战前会将一些高级军官, 如枪炮大副等派往具体的炮位, 直接现场指挥。鉴于方伯谦先是在司令塔内监督航行, 此后又转往舵机舱, 因而舰上的炮位指挥则与其没有多少关系。

根据日方记载, “济远”射出的炮弹主要朝向“吉野”, 大都落在“吉野”舰左右的水中, 其中 1 颗炮弹在距离“浪速”舰舰首 20 米的地方坠向海面, 爆炸

¹ W·Laird—Clowes: THE NAVAL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载于 THOMAS ALLNUTT BRASSEY: THE NAVAL ANNUAL 1895, P97。“济远”的舵机舱恰好即位于穹甲甲板下部, 即舰内装甲最厚处。

² 柯建章、黄承勋阵亡情形, 见池仲佑“甲申、甲午海战海军阵亡死难群公事略”, 载于《清末海军史料》, 海洋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366 页。炮台中弹情况见 W·Laird—Clowes: THE NAVAL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载于 THOMAS ALLNUTT BRASSEY: THE NAVAL ANNUAL 1895

³ [美]马吉芬著, 张黎源译: 鸭绿江外的海战, <http://www.beiyang.org/wenku/mjf.htm>, 2007。

后产生的破片将“浪速”的一些信号绳索打断。¹

“济远”舰和日军的炮战持续了短短几分钟，海战场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与“济远”舰始终沿着既定航线边走边还击不同，跟随在“济远”之后，已驶出狭窄航道的“广乙”舰变换航向，大胆地朝向日本军舰冲击，发起主动进攻²。

跟随在“济远”之后的“广乙”舰向左转向，冲向日舰队，担心“广乙”要冲角攻击或发射鱼雷，日军领队舰“吉野”的火力遂从“济远”转移到“广乙”，而且航向也发生变化，为躲避“广乙”可能将要发起的鱼雷攻击，“吉野”向左侧转舵，在海面画出一个大圈，恰好变成了和正在往威海方向航行的“济远”舰同向的形势。³

“吉野”避开后，上午7时58分，“广乙”舰逼近距日本军舰“秋津洲”舰尾600米处，“秋津洲”随即发炮攻击，“广乙”桅上的狙击手被击坠。由于海面上炮烟弥漫，“秋津洲”为了召唤后续的“浪速”舰合力作战，不得已拉响汽笛，以让己方军舰明了自己所在位置，“浪速”遂命汽笛相应。烟雾迷离间，“浪速”舰突然发现“广乙”运动到了距其左舷舰尾仅3、400米处，急忙用舰首炮相抵，同时左转将左舷炮火对向“广乙”射击，之后又急忙向右转舵，以防“广乙”向其发动撞角攻击。⁴

向“秋津洲”冲击，准备发起鱼雷攻击的过程中，“适有敌炮击毁水雷炮洞，水雷卒未触炸”⁵水雷炮洞即鱼雷发射管，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后，“既而有一大开花弹炸于广乙舱面，以致死伤二十人”⁶

“浪速”加入战斗后，在日方攻势下，“广乙”舰的司令塔很快被击中，站在管带林国祥身旁的舵手阵亡⁷。重伤的“广乙”无法抵御如此猛烈的炮火，遂向右舷转向，向朝鲜海岸方向退离，“浪速”、“秋津洲”紧随其后追击，“广乙”

¹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88页。

²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89页。

³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89页。

⁴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89—90页。

⁵ “广乙兵轮战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倭战守始末记》，（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34页。

⁶ “广乙兵轮战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倭战守始末记》，（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34页。

⁷ “广乙兵轮战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倭战守始末记》，（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34页。对应的史料见[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105—106页。

在退离途中依旧顽强反击，1颗炮弹击穿“浪速”左舷，从舰内穿出后，打坏了“浪速”尾部锚床上的副锚。¹

“广乙”冲乱日本第一游击队队形时，旗舰“吉野”绕过“广乙”，准备攻击“济远”，但是战场上硝烟弥漫，咫尺莫辨，寻找不到“济远”的踪影，等硝烟散去后，才发现“济远”在自己的左舷前方，朝着威海方向高速航行。²对此，后来“广乙”舰官兵曾愤慨地回忆“广乙行至日船对面，该船骤开一炮以击广乙，济远钢皮轮在前见之，并不回轮助战，即加煤烧足汽炉逃遁回华”³

8时10分之前，丰岛海战场上出现了“吉野”追击“济远”，“浪速”追击“广乙”的形势，“秋津洲”初与“浪速”合击“广乙”，“广乙”重创后则被命跟随“吉野”追赶“济远”。

8时10分、20分这段时间，“济远”舰一边往威海方向急驶，一面用尾炮向在后尾追的“吉野”射击抵御，其中3次跳弹击中了“吉野”的信号绳、望远镜匣以及落入“吉野”舰内，后来被谣传变形为尾炮退敌事件。⁴

8时30分⁵，“吉野”、“秋津洲”正在追击“济远”，“浪速”于此时从烟雾中出现，也到了追击“济远”的队列。恰在此时，西方突然出现两柱煤烟，日军无法辨明煤烟由哪国军舰发出，但是感觉必有特殊，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下达了各舰自由运动命令。“秋津洲”立刻掉转航向，仍然去追击“广乙”，“吉野”因为考虑前方煤烟目标不明，降低了航速，“浪速”则越过“吉野”追击“济远”，日本第一游击队三舰由此形成分散局面。⁶

在“浪速”的追击下，8时53分，“济远”舰挂出白旗，但仍旧高速逃离，“浪速”舰遂继续痛击，“济远”又在白旗上挂出一面日本海军旗。“浪速”认为“济远”舰已经投降，发出“立即停轮，否则我们继续炮击”信号，“济远”舰航速渐降，当时“浪速”、“济远”距离为2700—2800米左右，“浪速”立刻向旗舰“吉野”报告“济远”降伏⁷

就在此时，前方煤烟下的军舰驶近。

¹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90、104页。

²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90页。

³ “广乙兵轮战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倭战守始末记》，（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34页。

⁴ 陈悦：“丰岛海战济远舰尾炮退敌说辨伪”，载于《大连近代史研究》第四卷。

⁵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⁶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91—92页。

⁷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91—92页。

战事结局

在丰岛外海突然出现的2艘船只，其中1艘是7月23日从大沽出发的第三次运兵船“高升”，另外一艘则是北洋海军的运送、通报舰“操江”，于7月24日下午2时从威海出发，也是前往牙山，运送军饷信函。¹2船分由大沽、威海出发，使命也不相同，而且到达丰岛海面的时间也不同，“高升”略早于“操江”。

25日上午9时，“高升”驶近丰岛，船长、乘客等都目击到有1艘悬挂着日本海军旗和白旗的军舰从自己身旁掠过，即正在被“浪速”追击的“济远”。见到运兵船“高升”，“济远”只是降了一下旗帜，并没有作任何警示，而擦肩而过。反而使得“高升”轮误以为这是艘向自己行海上礼节的日本船，“现在看见这只日本船驶过我们的船时，以旗来向我们行敬礼，我们对于他们和平的意旨感到安慰”。²

“济远”从“高升”轮旁驶过后，“高升”继续向牙山湾内行驶，很快与追击在“济远”之后的日本军舰“浪速”相遇，发现“高升”上装有中国军队，7月25日上午9时15分“浪速”顾不得“济远”，而掉转航向驶近“高升”，发出停轮旗号，并两次鸣空炮警告，既而命令“高升”下锚。利用“浪速”无暇顾及的机会，“济远”舰便加速逃离战场。³

看到海面上的突发现象，9时30分，日本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用远距离信号召回正在追击“广乙”的“秋津洲”一起与“浪速”会齐，重新布置任务。⁴以“浪速”带“高升”返回本队，“吉野”、“秋津洲”追击“济远”和“操江”，9时50分，追击开始，时“济远”竟然已经逃离到距“吉野”7海里（12964米）处，远离了丰岛海域。

“操江”舰原本位于“高升”之后3英里外，上午9时看到“高升”被日本军舰拦截，见势不妙即转向航行。航行中目击了“济远”逃跑以及此后“吉野”追击“济远”的情况。“见‘济远’兵船突由一岛之后傍岸驶出向北而行，与一日本兵船开炮互击”。⁵

¹ “弥伦斯致博来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² “汉纳根大尉关于高升商轮被日军舰击沉之证言”，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20页。

³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93页。

⁴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93—94页。

⁵ “弥伦斯致博来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由于“济远”与“操江”大致方向都是往西方驶逃，因而“吉野”追击“济远”的过程，实际也对“操江”充满威胁。“上午十一点三十分，该船（‘济远’）驶近‘操江’，突改向西偏北二度由‘操江’船头驶过，相离约半英里。‘济远’选白旗，白旗之下悬日本兵船旗，舱面水手奔走张皇”。¹此时“济远”改道向西北，而“操江”的航向是西南，“吉野”遂不顾“操江”继续追击“济远”，跟随在“吉野”之后的“秋津洲”于11时37分向西南追击“操江”。²

此后的丰岛海战场，大致分成了三个局部。

一、“秋津洲”追击“操江”，于11时40分发出停航信号，并放空炮警告，逼近4000米时用120mm口径炮试射一发实弹，“操江”停航，挂出白旗和日本国旗，“秋津洲”即派出舰员登上“操江”加以控制。³

二、“吉野”追击“济远”，于12时38分追至距离“济远”2800米处，用右舷火炮向“济远”接连射出6颗炮弹，“济远”还击了2、3发，航向继续右转向浅水区。12时43分，“吉野”舰停止追击，转向往“秋津洲”方向会合。⁴

三、“浪速”俘虏“高升”，“浪速”与“高升”基本处于丰岛海战最初的战场附近，“浪速”舰下令“高升”投降随其航行，“高升”上的中国陆军官兵表示抗议。“浪速”遂发射鱼雷准备击沉“高升”，鱼雷未中，又用右舷火炮射击，“高升”于下午1时15分开始下沉，1时46分完全沉没。⁵

“吉野”、“秋津洲”此后与被俘的“操江”航向群山浦锚地寻找联合舰队本队会合，途中与“浪速”相遇，即命令其一并回航锚地。至此，丰岛海战结束。

重伤退往朝鲜海岸的中国军舰“广乙”最后搁浅自毁，幸存的舰员辗转回国⁶。在牙山湾卸载至上午9时15分才完成的运兵船“飞鲸”则万幸避开了战斗，该船卸空后于当天上午10点驶出牙山湾，目睹了“高升”被浪速击沉的过程，途中还见到了被俘的“操江”舰。⁷

甲午丰岛海战就此结束，战后第二天方伯谦即汇报战况，捏造了尾炮退敌的

¹ “弥伦斯致博来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²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95页。

³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95页。

⁴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95—96页。

⁵ [日]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水交社藏版，第97—98页。

⁶ “广乙”舰员辗转回国的情况见：孙建军：“摘掉林国祥‘丧舰降敌’的帽子”，载于《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7年第3期，第33—37页。

⁷ “瓦连航海日记摘抄”，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83页。

故事，并贬称“但见‘广乙’交战中敌两炮船已歪侧”¹。通过上述战事细考即能发现，“济远”舰真正与日舰抗衡作战的时间仅为7月25日的上午7时52分之后的短短几分钟而已，至7时58分“广乙”冲乱日舰队形时，“济远”毫不考虑回援作战，而是径直避逃。相反，无论火力、防护力都较“济远”为弱的“广乙”却主动出击，从上午7时52分之前冲击“吉野”开始，至8时10分前，一直处于激战中。此段时间内日本军舰被“广乙”吸引，恰好被“济远”当作逃跑的良机。

之后日舰开始追击“济远”，“济远”用尾炮抵御，上午8时10分后发生的3次尾炮跳弹命中“吉野”一事，则在战后被编造为“尾炮退敌”壮举。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中，“济远”挂出白旗、日本海军旗，继而露出航速减慢，行将停轮投降的迹象。恰在当时，运兵船“高升”经过，又为“济远”提供了逃跑的良机，乘日舰“浪速”拦截“高升”无暇他顾的机会，“济远”在半小时左右时间内竟然跑出了7海里的高速，令人咋舌。就在逃跑途中，“济远”路遇也在逃离的运输舰“操江”，但却没有发挥其作为一艘巡洋舰的价值，而是加速离“操江”而去。此战中方共有4艘舰船参与或被卷入，“广乙”、“高升”、“操江”3艘舰船先后全被“济远”抛弃、利用，当作逃跑的凭借，最终4艘舰船中实力最强的“济远”舰安全逃离，并凭着报告捏造了勇击日舰的功绩，而“广乙”、“高升”、“操江”或沉或夺，损失殆尽。其教训惨痛至极，然而百年后一些抱定方伯谦“冤屈”的方伯谦案翻案者，却为了证明方伯谦“冤”，而对一切不利于方的史实加以否认，千方百计否认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的负面表现，其行为已经远离了学术研究的宗旨。

（作者：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员、“北洋水师”网站站长）

¹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4页。

甲午丰岛海战“济远”舰尾炮退敌说辨伪

陈悦

尾炮退敌说的由来及其影响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军舰在朝鲜南阳湾外的丰岛附近海域不宣而战，对从该处经过的中国舰船发动突然袭击，揭开了甲午战争海上战场的序幕，史称丰岛海战。这次海战，中国方面的“广乙”号鱼雷巡洋舰遭受重创后自毁，“操江”号运输舰被俘，租用于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击沉，只留下“济远”号穹甲巡洋舰只身而返，可谓损失惨重。但是战后中方的公文中，对于海战失利的详细情形，以及海战中“济远”舰挂白旗、日本海军旗而遁等负面消息却大都作了回避和低调处理¹，反而突出提起了一件多少具有些传奇色彩的事情，即“济远”舰在退离战场途中曾用尾炮重创、击退日本军舰的事迹。

舰船上最直接的记事档案是航海日志，有关“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的作战情况如何，最原始的史料也就首推该舰的航海日志。令人诧异的是，甲午一役后北洋海军各舰的航海日志类档案大都无从查找，唯独“济远”舰的航海日志却部分保存了下来，更为特殊的是，北洋海军舰船的航海日志都是按月制作成簿册以供记载²，而流传的“济远”舰航海日志仅仅只有几页，又偏偏刚好是1894年7月25日、26日丰岛海战事发两天的日志，可谓是巧之又巧。在7月25日海战当天日志的记事部分里，使用很大篇幅提及了海战中的一个战斗片断：“十一点，见倭船又来追赶。十二点，赶到，在我船之左。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我船舵楼已坏，故亦不追赶，定向回威”。³从这段内容便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1894年7月25日的上午11时日本军舰追击“济远”，12时迫近“济远”，“济远”舰尾炮连续4次击中日本军舰的要害，并击毙了舰上的提督军官等数十人，致使受伤后的日本军舰挂中国龙旗而逃。由于己舰的操舵装置发生故障，“济远”舰没

¹ “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悬挂白旗与日本海军旗一事，“高升”轮上的乘客多有目击，见“日舰击沉高升实况文件三种”，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19-29页。

² 千曲次郎，“李鸿章的海军检阅日记及军舰定远的航海日志”，《满蒙》，1937年10月刊，第108-115页。

³ “济远舰航海日志”见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王仲荦主编：《历史论丛》第五辑，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46页。

有进行追赶，而是乘势回航威海。有关“济远”舰用尾炮击退追敌的事迹即由此轮廓初具。

丰岛海战之后，“济远”舰于7月26日清晨回到威海，由于当天下午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队主力外出巡弋，来不及就丰岛海战情形进行调查汇报，于是“济远”舰管带方伯谦遂直接向北洋大臣李鸿章作出了报告。除简要叙述海战的经过情形外，更着重提起了尾炮退敌一事，称“……午时我船整理炮台损处，倭船紧追，我连开后炮，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彼即转舵逃去。”¹内容与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所载大同小异。

时隔4天之后，7月30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正式具文，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丰岛海战情况。在这份据称是经过查询“济远”舰管带、员弁、水手后作出的官方报告中，同样也突出提及尾炮退敌一事，但较之方伯谦报告和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更显详细：“……‘济’停炮诈敌，彼欲驶近拟擒我船，‘济’即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四弹炮力已不及矣，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²不仅明确了被击退的日本军舰是日本第一游击队的旗舰“吉野”，以及几次命中“吉野”所造成的破坏效果情况，而且丁汝昌还特别提出了两名水兵的名字，认为他们是这次攻击行动的功魁，其他帮助运送弹药、操作火炮的水兵也被丁汝昌称为奋勇，认为有功。不过丁在报告中却绝口没有提到“济远”舰的管带方伯谦，推功时，竟然略去了海战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员，于情理都有不合，丁汝昌似乎是暗示方伯谦与尾炮退敌行动没有直接关系。

对于一场损失惨重的海战而言，具有传奇色彩的尾炮退敌事件无异于是黑暗中的闪光点，给海战画上了圆满的收笔，甚至可以称为是转败为胜，因而尾炮退敌一事便成了丰岛海战中北洋海军的典型英雄事迹。上述三则有关“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作战情况的官方文件可以认为是用以确立尾炮退敌说的原始史料，除此以外，在当时及此后的一些相关的史料、撰述中也屡有提及尾炮退敌的，基本的情况描述大致相同，但对于事件的细节阐述以及评价却存在着部分明显的差

¹ “北洋大臣来电四”，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2页。

² “丁提督来电”，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67页。

异，基本可以将其分之为两类。

其中以时人姚锡光撰写的《东方兵事纪略》为代表的一类，将尾炮退敌诠释为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胆小怯懦，底层水兵奋起自发抗敌，保全了军舰。“……管带方伯谦树白旗，继又树日本旗；倭追如故。时有水手王姓者甚怒，而力素弱，问‘何人助我运子！’又有一水手挺身愿助，乃将十五生特尾炮连发四出，第一出中倭船舵楼，第二炮亦中，第三炮走线，第四炮中其要害，船头立时低俯”。¹整体来看显然很大程度受到了丁汝昌海战报告的影响，4次命中“吉野”的情况与丁汝昌报告略同，水兵王国成、李仕茂自发抗敌的事迹也同，只是增加了有关水兵王国成“力素弱”，“问‘何人助我运子！’”等细节，虽别显出一番生动，但是没有实际出处依据，似不足为信史。被丁汝昌在海战报告中排除在尾炮退敌事件之外的方伯谦，姚文将其在海战中树白旗、日本海军旗而遁的事例予以公开，认为是管带方伯谦畏葸败逃，基层水兵挺身而出尾炮退敌。

由于“济远”舰悬挂白旗、日本海军旗而遁等事被多方史料证明为事实，水兵自发抗敌又符合人们对于英雄人物的期待，因而这一类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和接受，影响至为深远，直到现代大多数中国的研究论著中还都依旧在使用着并非原始史料的姚锡光观点。诸如孙克复、关捷编著《甲午中日海战史》称“爱国士兵王国成激于民族义愤，奋起自卫反击。他问大家：谁能帮我运炮弹？水手李仕茂挺身愿助。二人协力发尾炮攻击敌舰。连发四炮，命中三炮。第一炮击中‘吉野’桅楼，第二炮也命中。第三炮走线未中。第四炮命中‘吉野’要害，船头立时低俯。‘吉野’受创，不敢继续追击，于12时43分，转轮退走。”²几乎就是姚文的翻版。与之类似的还有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称“……在此紧要关头，水手王国成挺身而出，反击敌寇……另一水手李仕茂从旁协助，用15公分口径尾炮对准‘吉野’连发4炮：第一炮中其舵楼；第二炮中其船头；第三炮走线；第四炮中其船身要害处。12点43分，‘吉野’受伤，舰头立时低俯，不敢停留，转头向来路驶逃。”³此外，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写的《近代中国海军》同样深受姚文影响，称“‘济远’水手王国成和李仕茂用150毫米尾炮

¹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海军篇》，见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65页。

² 孙克复、关捷编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92页。

³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54-55页。类似记载还见于戚著《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83页。

瞄准‘吉野’，连发4炮：第一炮击中‘吉野’桅楼；第二炮击中其舰首；第三炮未中；第四炮击中要害。‘吉野’舰首立即低俯，不敢再追。”¹苏小东著《甲午中日海战》在提及此事时，则更是直接引用了姚文原文。²

关于尾炮退敌的另外一类观点，主要以《冤海述闻》等为代表。《冤海述闻》的作者在上世纪80年代被戚其章先生推定为是丰岛海战中任“济远”舰驾驶二副的何广成³，其著对于尾炮退敌事件的经过叙述大致与上一类相同，但认为击退敌舰的功劳不能由水兵独享，而是管带方伯谦的谋略指挥所致，由此推论“济远”在海战中挂白旗与日本海军旗而遁是为了实施这种谋略而作的准备，水兵击退日舰也是在管带指挥下的职务行为，方伯谦才是尾炮退敌事件的功勋。“方管带发令将船前转看杪准，猝发后炮，一发中其望台下。该船火药炮子震裂，翻去望台，歼其提督员弁二十七人，并水勇无算；再发中其船头，火起水进；又发中其船身，船便倾侧，升白旗龙旗而遁”⁴。值得特别予以注意的是，《冤海述闻》有关尾炮退敌部分的描述在内容与笔法上都与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存在相似，因而戚其章先生在“《冤海述闻》研究”一文中推测《冤海述闻》的作者何广成即是“济远”舰航海日志1894年7月25日部分的记录者。以《冤海述闻》为代表的这类材料，由于在史料叙述以及人物品评上多有明显的偏颇错误之处，因而并不被学界广泛引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所谓为方伯谦翻案活动开始后，一些翻案文章屡屡采择，引之为方伯谦悬挂白旗的正当理由，虽然一时声势颇大，但终究理曲牵强，难以服人。

综上所述，从丰岛海战至今，“济远”舰尾炮退敌事件在某些认识上还存在有差异和不同意见，但是关于尾炮退敌事件的真实性，则各方都深信不疑，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尾炮退敌事件的发起者等问题上。国内关于甲午战争的著作论述中大都予以收录采用，几乎到了凡提及丰岛海战，必说“济远”舰尾炮退敌的境地，然而围绕着尾炮退敌而从生的一连串疑问，却始终未被注意。以十九世纪后期的海军技术条件来看，1艘2000余吨的穹甲巡洋舰使用口径为150毫米的

¹ 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著：《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464页。

² 苏小东：《勿忘甲午丛书——甲午中日海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

³ 有关《冤海述闻》作者的考证详见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相关内容载于：王仲荦主编：《历史论丛》第五辑，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62-366页。

⁴ “冤海述闻”，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85页。与《冤海述闻》观点相近的还有卢毓英著《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相关内容见林伟功、黄国盛编《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第546页，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

旧式架退后膛炮，是否真的能在短时间内重创、击退或是击沉敌舰？当时采用黑火药作为弹头装药的炮弹是否足以在短短几次命中后就能制敌于死地？被中国方面称为重创乃至击沉了的日舰“吉野”为何在丰岛海战后不久仍活跃于海上？……如果这些疑问无法得到确实可信的答复，那么尾炮退敌这种记载终究无法令人彻底信服。

对于此，早在丰岛海战结束后不久，北洋大臣李鸿章就首先提出过怀疑，认为“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¹可谓一语中的，直指出尾炮退敌问题上的一处关键要害，但是李鸿章并未就此继续深究，事后就不了了之，使得尾炮退敌说的真假更显得模棱两可。近代海军史研究者姜鸣先生在2002年增订版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姜文直接认为方伯谦和丁汝昌关于丰岛海战的报告“均存在很大的漏洞和虚假消息”，“不提曾升白旗和日本海军旗，反而谎称‘济远’以一门尾炮击退两艘日舰，还称日提督阵亡、‘吉野’沉没”²，已经觉察到尾炮退敌说存在漏洞和虚假，可惜书中并未就此问题再展开进行专门论述。

尾炮退敌说辨伪

在拥有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丁方二人的海战报告等3份中方原始史料的基础上，要证明“济远”舰尾炮退敌事件的真实性，最直接也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无外乎是能够在丰岛海战参战另一方的档案史料中找到对应的记载。

甲午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对舰队的作战行动、弹药消耗、军舰损害、作战海图等都有详尽的文书档案记录，战后曾会纂成名为《联合舰队出征报告》的合集，这部档案是了解日本联合舰队战时情况的重要原始史料。其中关于联合舰队7月25日在丰岛附近海域攻击中国舰船的记录里，与“济远”舰尾炮退敌事件关联最大的无疑就是“吉野”舰的受伤情况报告。根据中方史料指证，“济远”舰尾炮重创、击退的是日本军舰“吉野”，如果真的曾经遭受过这么大的损失，在“吉野”舰的受伤情况报告中必定会有所体现。这份由“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海军大佐署名提交的名为“交戦中敵弾ノ為メ被害報告”（粗译为“交战中敌

¹ “复丁提督”，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68页。

²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第359页。

弹造成的损害报告”）的文件，确实记录到了“吉野”舰在丰岛海战中受到几次攻击，均由“济远”舰造成，分别为：

第一次、一颗炮弹在“吉野”舰舰首右侧数十米处的海面上爆炸，飞溅弹起的弹片将“吉野”桅杆上的斜桁和一些信号绳索打断。

第二次、一颗 150 毫米口径的炮弹打在海面上后跳起，从“吉野”舰右舷穿入，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但是并未爆炸。

第三次、一颗炮弹落在“吉野”舰后部飞桥附近的海面，弹起的弹片击碎了飞桥上用来存放望远镜的箱子。

另据该报告记录，在这三次中弹之外，还有几发炮弹落在舰首、舰尾附近的海中，未造成损害。¹

与《联合舰队出征报告》重要性相似的日方史料还有日本海军军令部在战后修纂的《廿七八年海战史》，该书是日本官修的甲午海战史，具有权威性，有关丰岛海战中“吉野”受创的情况有如下记载：“八时十分的时候，‘济远’舰发射了一颗炮弹，打在‘吉野’舰首附近海面上，跳起后击坏了‘吉野’舰前桅的斜桁和一些索具。八时二十分时，‘济远’舰发射的 150 毫米口径熟铁榴弹打在‘吉野’右舷附近的海面上，跳起后落在甲板上，击坏了一些舳板，而后贯穿甲板掉入舰内，打坏了一部发电机，最后落在轮机室顶部的防御甲板上，幸而没有发生爆炸。”²与《联合舰队出征报告》中的记述基本一致。

另外，日本“八重山”号通报舰舰长向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报告海战情况的电报里，也透露出了“吉野”受创的大概情况。³

从日方的这两份重要史料能够清楚了解到，日本的“吉野”舰的确曾在丰岛海战中被中国军舰“济远”击中，击中的次数以及部位也与方伯谦、丁汝昌战后提交的报告大致相符，即中弹 3 次，分别在舰首附近（船头）、军舰右舷（船腰）、飞桥（望台），而且从中弹情况看，都是由“吉野”舰舰首之前方射来的炮弹所造成，据此可以判断“济远”舰尾炮击中“吉野”的事情确实存在。然而这还并不足以证明尾炮退敌事件的真实性，因为中日双方的记载在攻击效果以及攻击

¹ “交战中敌弹造成的损害报告”，《联合舰队出征报告》秘本，第九回，影印件。

² 日本海军军令部编：《廿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上卷第 91 页。同书第 103 页还刊有“吉野”舰在丰岛海战中的损害情况，与注 15《联合舰队出征报告》的记载完全一致。

³ “八重山号指挥官致西乡从道电”，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96 年 9 月版，第 255 页。

发生时间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存在有很大差异。

攻击效果

作为中方最原始的海战记录材料，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里称射出的炮弹“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¹与日方记录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从日方史料中看，“济远”射出的3颗炮弹都谈不上直接命中敌舰，均属于不可预测的跳弹或弹片间接命中，而且除了击中右舷掉入机舱的那颗没有爆炸的炮弹勉强能够算作击中要害外，其余的2次损害对于“吉野”而言都可谓是无足轻重，丝毫没有触及重要部位，这一点可以从丰岛海战之后“吉野”舰仍然活跃于海上得到旁证²。而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的记载，如果考虑到远距离且烟雾弥漫的战场实际情况，那么无异于是一种主观的想像，况且当日的“倭提督”日本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并没有被“击死”，之后还参加了9月17日的黄海大东沟海战，直到1898年才病死，可见此处报告是完全错误的。至于“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一节更是彻底的谎言，众所周知，丰岛海战中只有一艘军舰出现过挂对方旗帜奔逃的情况，恰好就是“济远”舰，而在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上却将这个事迹转嫁给了日本军舰。作为本应十分严肃的舰上文书档案，这份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的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内竟然充斥着如此之多的错误乃至荒谬之词，使人不得不对其实真实性产生怀疑。不特如此，对照日本上世纪30年代公布的北洋海军航海日志规范和实例³，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也存在着诸多不合规范之处，以及缺失漏记。倘若不是记录人为了掩盖某些事实且故意不按照规范记载，那可能这份航海日志本身就是一件不值一名的臆造品，除此似乎很难再得出其他合理的解释。在尾炮退敌问题上，与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内容惊人一致的《冤海述闻》的价值也就由此可见了。

¹ “济远舰航海日志”见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王仲萃主编：《历史论丛》第五辑，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46页。

² 丰岛海战后“吉野”与第一游击队各舰即回到朝鲜群山浦锚地驻泊，更与1894年8月7日被派往朝鲜大同江口、大东河口执行侦察任务，之后还参加了炮击威海湾、护送日本运兵船、侦察成山头一带等行动，丝毫看不出曾受到重创的迹象。相关内容参见《廿七八年海战史》第五章。

³ 千曲次郎，“李鸿章的海军检阅日记及军舰定远的航海日志”，《满蒙》，1937年10月刊，第108-115页。该文中根据保存在日本的“定远”舰航海日志簿册，介绍了北洋海军航海日志的规范。与之相比，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缺少了大量的技术性记载，诸如航速、航向、航行工作事记等，而是特别突出了尾炮退敌一事，显得别有寓意。

方伯谦与丁汝昌的海战报告，是中方用以证明尾炮退敌事件的剩余两份关键史料，在有关炮击效果的方面，同样也充满了错误，无论是方伯谦所称的“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还是丁汝昌报告所说的“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对比日方的实际情况，都是子虚乌有的事。

由此可见，在尾炮退敌的攻击效果方面，中方3份原始史料的记载都与日方军舰实际遭受的损失相去甚远，完全是一种夸大的描写。按照3份史料的先后次序看，如果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并非伪造，那么首先就是“济远”舰的航海日志进行的夸张性描述，继而“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也进行了夸张性描述。而据称是询问“济远”舰人员后做出的丁汝昌报告，显然也受到了这些夸张性描述的影响。

攻击发生时间

相比炮击效果，炮击发生的时间似乎对于认定尾炮退敌事件的真实性关系不大，实际炮击发生的时间恰好是用以辨明尾炮退敌事件真伪的关键问题。尾炮退敌事件如果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几个因素，即“济远”舰命中了“吉野”；命中导致了“吉野”放弃追击“济远”，由此命中事件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事件发生的时间必须就在“吉野”放弃追击“济远”时。

中方的三则原始材料，分别将尾炮退敌的时间锁定在7月25日的中午12时左右，恰好就是“吉野”舰停止追击返航之际。但从日方史料中，我们却并得不到这样的印象，《廿七八年海战史》记载的“吉野”遭受“济远”炮击的时间是上午的8时10分，距离12时43分“吉野”舰放弃追击“济远”还有漫长的4个多小时。继在攻击效果上存在出入后，中日双方的史料在攻击的发生时间问题上又有严重分歧。

为了便于说明时间问题，下面先主要根据日方史料将丰岛海战的时序经过进行扼要列举：

1894年7月25日上午7时43分半，日本军舰“吉野”首先开火，挑起了丰岛海战。¹

7时52分，“济远”舰还击。

¹ 丰岛海战的时序主要参考自《廿七八年海战史》。

7 时 55 分，“秋津洲”向中国军舰开火。

7 时 56 分，“浪速”向中国军舰开火。

7 时 58 分，“广乙”舰逼近攻击日本军舰。

同时，“济远”舰开始离开战场，“吉野”舰尾追。

8 时 10 分，“济远”尾炮射出的炮弹在“吉野”舰舰首右侧数十米处的海面上爆炸，飞溅弹起的弹片将“吉野”桅杆上的斜桁和一些信号绳索打断。

8 时 20 分，“济远”尾炮再射出一颗 150 毫米炮弹，打在海面上后跳起，从“吉野”舰右舷穿入，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但是并未爆炸。此后不久，又一颗 150 毫米炮弹射向“吉野”，在飞桥附近发生爆炸，所产生的破坏后果是，击碎了飞桥上用来存放望远镜的箱子。

三次攻击以后，“高升”、“操江”从海战场远处出现。“吉野”舰停止追击，“浪速”舰超越“吉野”，继续追击“济远”。

8 时 53 分，在“浪速”的接连炮击下，“济远”舰悬挂白旗与日本海军旗。

9 时 15 分，“高升”进入战场，“浪速”放弃追击“济远”，改为捕捉“高升”。其他日本军舰此后也相继聚拢。

9 时 47 分，日本舰队重新分工，“吉野”追击“济远”，“浪速”捕捉“高升”，“秋津洲”捕捉“操江”。

12 时 38 分，“吉野”追至距“济远”2500 米时，用右舷炮射击。

12 时 43 分，“吉野”舰担心追出过远，停止追击返航。

13 时，“浪速”攻击“高升”。

从这里可以看到，日方提到的尾炮攻击事件发生在 7 月 25 日上午的 8 时 10 分以后，“吉野”舰虽然于“济远”的炮击后一度停止了追击，但 9 时 47 分开始又重新追击“济远”，直到 12 时 43 分因为考虑追出过远，为了保证当天能返回联合舰队锚地报告战况而放弃追击。按此，则发生在 8 时 10 分以后的“济远”炮击实际并没有造成退敌的效果。

鉴于日方史料中与中方记录的“济远”舰尾炮退敌事件较为对应的记载仅有 8 时 10 分以后的这一次，如果否认中方史料中的尾炮退敌事件与日方记载的 8 时 10 分以后的攻击有关，那么在日方资料中再无有关尾炮退敌的类似对应记载，发生于午时的尾炮退敌事件就仅有中方单方证据。如果承认日方 8 时 10 分以后

的那段记载就是对应的“济远”尾炮退敌事件，即意味必须在中方史料中找到与日方记载类似的证据进行佐证，否则也就失于片面，同样不具说服力。

曾在“济远”舰上服务，并参加过丰岛海战的英籍洋员哈富门（Hoffmann），在甲午黄海海战之后即将离华前，有过一段关于丰岛海战的回忆¹。作为丰岛海战的亲身经历者，对于尾炮退敌这种大事不可能没有觉察，然而哈富门提到的尾炮退敌情况却与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以及丁、方的报告截然不同，哈富门称“‘吉野’受我炮弹小有损伤，展轮迳去，待修理后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²按照哈富门的回忆，当时“吉野”不是被重创，而仅仅是“小有损伤”，不是被击退，而是“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这段去而又回的记录，与日方史料中8时10分以后的炮击记述完全对应。身为雇佣兵性质的洋员，中日两国海战的情形胜败与否，对其个人的切身利益并无太大影响，身处的超然地位使得回忆别有一种客观的色彩。

洋员哈富门的回忆和日方史料相互佐证出了一个事实：丰岛海战中“济远”舰发尾炮击伤“吉野”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在当日上午的8时10分以后，而且攻击行动并未造成“吉野”舰重伤的效果，9时47分“吉野”又再度追击“济远”，直到12时43分才主动放弃。由此可以判断，中方包括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在内的3件原始史料，关于炮击时间的记载都做了篡改，且所谓的击退日本军舰一事也根本不存在。

关于时间问题另值得一志的是，由于中日双方对尾炮事件记载的时间存在相差4个多小时的情况，对于中方史料中记载发生于午时的“济远”舰尾炮退敌，以及日方史料中记载的8时10分“吉野”舰遭炮击事件，很多研究者并没有辨明其为同一件事，而是一并采纳，将两则原本是意指同一事件的史料简单累计相加，既收录日方史料中8时10分“吉野”的受创，又加上中国史料里12时43分“济远”舰击退日舰的事迹，结果出现了“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曾两度使“吉野”受创的错误记述。³

¹ 有关“济远”舰洋员哈富门的更多情况，参见，孙建军著《丁汝昌研究探微》，华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96—109页。

² “纪济远兵船两次开仗情形”，《中倭战守始末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5页。

³ 关于这种将中日两国史料中对同一事件的记载，理解为是不相干的两件事而重复计算的做法，影响相当广泛。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姜鸣著《龙旗飘

结 论

“济远”舰尾炮退敌说诞生于甲午丰岛海战之后，在我国的相关史著中被一再采用，长久以来对其真实度深信不疑。本文通过分析认为，所谓的尾炮退敌事件并不存在，而是中国某些原始史料对于战场事实篡改所造成的假相，纯属是伪说。实际的情况应该是：1894年7月25日上午8时10分以后，“济远”舰舰尾的150毫米口径火炮3次间接命中了追击的日本军舰“吉野”，给“吉野”造成了轻微的损伤而已。

中方三件原始文件中夸大炮击的效果、将炮击发生的时间修改为午时的原因，无疑是想将发生于8时10分左右的尾炮中敌事件与12时43分的“吉野”停止追击建立因果关系，再加入一些对攻击效果夸张的描述，就成了所谓的尾炮退敌事件。海战爆发后仅仅战斗了10分钟左右就开始逃跑的“济远”舰，藉此摇身一变而为始终与日本军舰斗智斗勇的楷模，悬挂白旗、日本军旗等事都借以遮掩在尾炮退敌事件的光芒之后。创立尾炮退敌说，其最大的受益者顺理成章应该就是“济远”舰的管带方伯谦，方伯谦丰岛海战报告以及来历不明的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对创造此说不遗余力，以至出现击死倭提督，倭舰挂龙旗而奔等生动故事的动机也就不难理解。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报告中只将水兵王国成等列作功勋¹，避而不论方伯谦，其原因在《中倭战守始末记》的另一则记载中可以窥见端倪“……海军提督丁禹廷军门调询济远管旗兵目，始悉溃逃各节，犹以寡众不敌怨之”。²关于丁汝昌报告中提及的炮击效果和退敌情况，究竟

扬的舰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海军司令部编《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8月版），苏小东著《勿忘甲午丛书——甲午中日海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都存在这一情况。具有普遍性的做法是，在记述了8时10分以后“济远”的炮击情况后，又套用《廿七八年海战史》有关12时38分“吉野”向“济远”射击，“济远”也回击了2、3炮的记述（《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卷，第95页），将尾炮退敌的发起时间也附会设定在12时38分。然而12时38分距离“吉野”舰停止追击的12时43分仅仅相隔5分钟，短短5分钟时间内要发射4枚炮弹，不用说“济远”舰装备的150毫米口径旧式架退炮根本不可能达到这种射速，即使是当时最新式的100毫米口径以上的新式速射炮，要达到这一射速也是非常艰难的。

¹ 尾炮退敌伪说的确立，事实上最后的直接受益者却是“济远”舰的普通水兵王国成、李仕茂。目前尚无法了解丁汝昌推王国成为功魁的直接证据，也无从确定王国成是否实际是8时10分以后3次间接击中“吉野”的功魁。相对于这名水兵百年来逐渐被塑造而成的高大英雄形象，1979年，王国成之孙王守谊接受采访时的口述，可能更接近真实：“……（王国成）少年游荡，游手好闲。幼年务农，家境不济。成年在‘济远’当兵，后回家取（娶）妻姓姚。甲午战争时，他在‘济远’当炮手，丰岛海战中，一炮击毁敌舰舵楼。与李仕茂共得赏银1000两。1895年回文登营，老婆25岁，已死，无子。又取（娶）张氏，花300两银子买了40亩地。1898年他不愿务农，跑到旅顺，想找熟人。1900年有人捎信回家，他死于旅顺。大哥国庆、二哥国兴。国成吃喝嫖赌死后，国兴去旅顺找尸，未找到……”（威海莹：《勿忘甲午丛书——甲午战争在威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16页）

² 《中倭战守始末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是受蒙蔽而为，还是为了保住这一难得的海战“闪光点”而知错就错的故意举动，尚待进一步探讨。

另外，以往建立在对尾炮退敌事件深信不疑的基础上，一些论者以“济远”舰曾发尾炮重创日本军舰“吉野”作为“济远”舰悬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的托辞，认为在兵不厌诈的战场上，“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下令挂白旗是一种诈降术。这种观点的代表见于张荫麟著“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其文称“‘济远’逃时，曾树白旗，‘高升’乘客目击者多人，其报告不谋而合，决不能诬。今待问者，方氏之出此，果真欲降耶？抑如其后来所云，以‘诈敌’耶？于此吾人似不防放胆一信方氏之言。彼诚立意投降，则毋庸逃遁；及敌舰迫近，更不容发炮击之。”¹张荫麟的观点在上世纪90年代所谓为方伯谦“翻案”的活动中又一再被引申夸张，然而当辨清尾炮退敌事件的真相：“济远”舰尾炮命中“吉野”在先，挂白旗在后，而且尾炮攻击并未导致“吉野”重创放弃追击，那么挂白旗是为了“诈敌”一说也就无从成立了。

（作者：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员、北洋水师网站站长）

第 47 页。

¹ “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清华学报》，1935 年，第十卷第一期，第 69 页。

北洋海军航海日志考

王记华

记录航海日志乃海军平时、战时相当重要的一项业务。日志中实时记录舰船航行、停泊、训练、作战等全部活动，乃至舰船状态、气象状况等第一手数据，是搜集海洋航海资料、积累官兵航海经验、提升官兵战训素养、以及考核官兵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因而西方海军国家无不高度重视航海日志的记录与整理。中国近代北洋海军几乎完全脱胎于西方海军（于 1888 年代正式宣告成军，此前称“北洋水师”），其规制操章、日常定例，多借鉴遵循西方海军成例，航海日志无疑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规制。

然而，北洋海军的航海日志究竟是何样式？包含什么项目？记录哪些内容？如何规定管理？这些问题，以前因史料记载之缺乏，以及实物例证之缺失，均难作翔实描述。近来随着一些相关史料的陆续发现，尤其是《“定远”航海日志》资料的面世，使我们得以略窥其基本面目，并可藉此廓清对某些问题的模糊认识。

一、北洋水师时期的航海日志

1888 年 10 月正式颁行全军的《北洋海军章程》，是北洋海军所遵循的最主要军规条例。其中第十二款《简阅》载明：

“海军各船大副、二副等，应逐日轮派一人，将天气、风色、水势及行泊时刻、操演次数，凡有关操防巨细事务，概行登记日册；管轮官将机舱内轮机迟速，日用煤、油各料若干，并有无事故，亦概行登记日册；由管带官随时稽察。”¹

由此看来，日册分别为驾驶日册、轮机日册两种，航海日志应该是指前者。那么，北洋海军成军之前（即“北洋水师”时期）有无航海日志呢？

依据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88 年 5 月 31 日）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致天津北洋支应局总办朱伯华的信函，可知《北洋海军章程》颁行之前，北洋水师已经实行航海日志这一各国海军普遍通行的规范了。信函全文如下：

“昨奉相札，部议补发定、镇、济所垫公费并须补送日记一案，尊处当已奉

¹ 《北洋海军章程》之第十二款《简阅》，影印本。

到行知。惟查补发三舰亏垫公费一节，经罗稷臣会商，以核对款目，当将三舰由十一年十月起至十二年四月止未加公费以前日记、及所用公费各项开摺，统送贵局核办在案。嗣三舰所呈海军衙门日记，系由十二年秋季起方按季造送，惟记中只载行船等事，未曾叙及公费用项一层。此次部查日记，若照海军之式一例造送，用费无以核起，再更新式，又与海军日记两歧，转为不妥。兹令敝军林营务处及济远方官带来津，商请钧裁。[能]稟请咨复，总以不必造送为妥。若必须遵照部议，应如何办理方臻妥贴之处，当望详细示知，以便遵办。”¹

该函澄清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三舰是有航海日记的。第二，定、镇、济三舰航海日记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秋季开始，按季度造送海军衙门。此前，其他军舰似乎尚未将航海日志按季报送海军衙门。第三，北洋水师航海日记是“海军之式”，“记中只载行船等事”，并无海军衙门所要求的“叙及公费用项一层”。第四，丁汝昌面临“若照海军之式一例造送，用费无以核起，再更新式，又与海军日记两歧”的两难选择。盖因当时海军衙门甫设，北洋海军尚未正式成军，各项规制尚不健全，包括航海日志呈报、经费核销办法等，还未形成规范。

一个月之后的五月二十一日（6月30日），丁汝昌再次致函朱伯华：

“兹送呈管轮、驾驶日记各两本，系敝军每月造呈海军衙门、中堂处两种底式。其呈中堂者，内开官弁人等花名，均据当时现有人数开列，与饷册一样，非照额设数目，敢祈详察。”²

函称管轮日记、驾驶日记各两本，可知两种日志格式内容之不同，亦与此后不久颁行的《章程》规定相符。航海日记系“每月造呈海军衙门”，与前函“按季造送”相违，似系丁汝昌疏忽笔误。再者，报送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报送海军衙门者，两者内容有别，“呈中堂者，内开官弁人等花名”。为何作此差别，用意不得而知。

二、北洋海军《航海日志》的样式与格式

北洋海军航海日志，至今我们还无缘得见形象直观的面貌。倘如丁汝昌信函

¹ 《丁汝昌集》之163《致朱伯华》，第93页；戚俊杰、王记华编校，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² 《丁汝昌集》之171《致朱伯华》，第98页；戚俊杰、王记华编校，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所示，那么在海军衙门和北洋大臣衙门档案中应有存件；遗憾的是，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目录中，没有查到这些航海日志的踪迹。是尚未整理公开，还是已经散失无存，有待今后更为深入细致的工作。

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最近在《满蒙杂志》¹上发现一篇《李鸿章检阅海军日记与“定远”军舰航海日志》的文章，文中对“定远”航海日志有较为详细的描述，藉此可基本再现北洋海军航海日志的原貌。

这册“定远”航海日志的收藏者，是一位姓“早崎”的日本人，作者千曲次郎与其是挚友。至于该《“定远”航海日志》因何流落日本，原作者文中没有交代，不过原因不难猜测。1894年5月，北洋海军举行第二次大阅；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2月，“定远”舰自爆而沉，北洋海军基地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该日志底稿为日军所获，流落东瀛。日志的收藏者“早崎”，或许就是当年参加甲午战争威海卫战役日军之一员，亦未可知。

此日志记录的是光绪二十年四月（1894年5月）三十天内关于“定远”舰的活动情况，主要内容是李鸿章第二次校阅北洋海军，“定远舰作为北洋舰队旗舰，由丁提督乘坐，率领南北洋舰队从威海卫出发抵达大沽，迎接检阅使李鸿章，护卫其座船巡航旅顺、大连、威海卫，同时作为舰队接受检阅的活动情况。”²

《“定远”航海日志》系按月装订成册。规格长一尺二寸五分（约合41.66厘米），幅宽八寸五分（约合28.33厘米），大致与现今的A3纸等大，用宣纸装裱而成。封面使用稍厚些的宣纸装裱，采用中国传统的右侧竖装格式，封面“靠左侧贴着细长的红纸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题签纸，上面用黑色印刷“北洋海军 管驾日记”字样，“北洋海军”与下面的“管驾日记”之间留有空白处，用毛笔填入“定远”字样。向右打开封面，里面是扉页，质地与封面相同，上方是横排的“北洋海军兵船”，其下是竖排的大大的“管驾日记”，均用木版印刷，红色字³。封面与扉页文字大小、字体均不详。日志是横长式还是竖长式，文中并未载明，不过，根据毛笔竖式书写的习惯，以及日志繁多的项目排列，以横长式可能性为大。按北洋海军官制，“管带”或“管驾官”即舰长，“管驾日记”按

¹ 《满蒙杂志》（日文），《李鸿章检阅海军日记与“定远”军舰航海日志》，作者千曲次郎，第108—115页，1937年10月刊，国家图书馆藏书。

² 《满蒙杂志》（日文），1937年10月刊，第109页，《李鸿章检阅海军日记与“定远”军舰航海日志》。

³ 《满蒙杂志》（日文），1937年10月刊，第109页，《李鸿章检阅海军日记与“定远”军舰航海日志》。

字面意思理解是“舰长日记”，而内容其实就是航海日志。

日志的内页，即记载日志的部分，是用比封面稍薄些的宣纸。以右、左相对的两个页面，作为一天日志的单元空间。所有栏目内的文字均竖排、用红色木版印刷。

右页纸的上部，并列如下等项目：**值更官员姓名**。**船程**（速力）。**船向**（航向）。**罗经铁差**（磁针自差）。**风向**。**风力**。**下风差**（风压差）。**寒暑计**（气温）。**风雨表**（气压）¹。各项均纵向布局，各项下面的空白记录栏内，除值更官员姓名栏之外，其余都用横线划分成格，可分别按每小时记入。右侧栏外单独设有一栏，记入月日以及军舰的位置。

左页纸占上面三分之一页面的栏内，纵列十个项目：**经度**。**纬度**。**直路方向**。**直路程**（实测航行距离）。**潮流方向**。**潮流程**（潮流速力）。**共行程**（航行距离累计）。**罗经气差**（磁偏差）。**直方向**。**直距离**（直线距离）²。下面的三分之二页面，则为**记事栏**。

“因为该日志在尚未记录使用之前曾经落入水中，所以用红色木版印刷的各页几乎全部被红墨水洇红了，文字、格线也大部分变得模糊不清。日志就在这样模糊的纸上，用毛笔写着一流的、笔画端正的秀美汉字。”³

该日志表明：其一，采用木版印刷，是因规格样式划一，使用数量多，批量制作。其二，封面题签“北洋海军 管驾日记”字样是印刷而成，而“海军”与“管驾”中间留出空白，以填写舰船名（如“定远”即为后来用毛笔填入），可知舰队各舰船均统一使用此种航海日志。其三，北洋海军航海日志仍以毛笔为书写工具，舰船航行于大海波涛之间，毛笔比之自来水笔，书写记录确有不便；如遇恶劣海况恐不能即时记录，而须事后补记。

三、《“定远”航海日志》选录

“定远”铁甲舰因其作为北洋海军旗舰，其航海日志最具代表性；而甲午战争爆发两个月前、以李鸿章第二次校阅北洋海军为主要内容的“定远”航海日志，

¹ 《满蒙杂志》（日文），1937年10月刊，第109页，《李鸿章检阅海军日记与“定远”军舰航海日志》。

² 《满蒙杂志》（日文），1937年10月刊，第109页，《李鸿章检阅海军日记与“定远”军舰航海日志》。

³ 《满蒙杂志》（日文），1937年10月刊，第109页，《李鸿章检阅海军日记与“定远”军舰航海日志》。

其史料价值也就不仅仅局限于航海日志样式的范畴之内了。

“定远”舰光绪二十年四月份（1894年5月）的行动，从四月四日（5月7日）至四月十四日期间，参加李鸿章校阅海军的活动；从四月十五日至月底，则一直碇泊威海卫。所以千曲次郎的文章只重点介绍了十天校阅期间的“定远”航海日志。在此，笔者从中选录三天，俾使研究者有所明了。

1、光绪二十年四月六日（1894年5月9日）

从大沽向旅顺进发

值更官员姓名 朱声岗、沈寿埜、高承锡、蒋拯、林高升。

船程 每时七浬乃至八浬。

船向 从午后二时到五时东二十二度南。

从午后五时东八度西。

罗经铁差

风向 东北（每有变化都有记录，摘录概略，以下同）。[笔者注：日志中括号内说明系原文作者所注，以下均同]

风力 一乃至三（每小时都有记录，摘录概略，以下同）。

天色

下风差

寒暑计 一六乃至一九度（同上，以下同）。

风雨表 七六〇乃至七六三（同上，以下同）。

记事 午前四时五十分，检阅使乘坐的“海晏”轮抵达，各舰升军舰旗，鸣放礼炮。

四时五十五分，“海晏”轮下锚。

九时教练。

午后一时八分开始起锚。

一时二十五分起航，航向东二十二度南。

投入航测仪。

四时航测十九浬。

四时五十分，航向变为东八度南。

八时航测五十二浬。

十二时航测八十五浬。¹

值更官员身份考证罗列如下：朱声岗，驾驶大副，光绪十七年以千总升补守备。沈寿堃，枪炮大副，光绪十九年花翎补用守备。高承锡，炮务二副，光绪十九年以千总船械三副升补守备。蒋拯，船械三副，光绪十九年以守备五品军功尽先拔补千总拔补千总。林高升，官职、衔级不详。据此可以验证，驾驶日志值更军官包括驾驶、枪炮、船械方面，职级从大副到三副，衔级因舰船大小而有差别。相应的，管轮日志则由轮机方面军官值更。

该日的航海日志，完整记录了 1894 年 5 月 9 日“定远”舰全天的所有活动，主要侧重于本舰航海等专业数据的采集记录，计量精确、记录准确。而右页的“罗经铁差”和“下风差”、左页的上栏各项目（**经度；纬度；直路方向；直路程；潮流方向；潮流程；共行程；罗经气差；直方向；直距离**），包括本日在内的一个月之内，均空项不填。究竟是何原因？是仅仅该月如此，还是月月如此？是仅仅“定远”舰如此，还是各舰都如此？是这些项目无足轻重，根本就没有测算，还是测算了而没有记录？这些问题或许只有那些值更军官们才能回答了。此外，前面介绍的日志右页上，未列“天色”（注：即天气）一项，当天日志右页中也无该项，但其后的日志中却均有该项，另参考“济远”航海日志格式，确实存在该项，因此日志中补齐“天色”一项。

2、光绪二十年四月七日（1894 年 5 月 10 日）

碇泊旅顺

值更官员姓名（几乎是同一些人，以下省略）

船 程 每时七浬乃至八浬五。

船 向 午前零时东八度南。

七时北八十度东。

八时北七十度东。

北四十六度东。

北十一度东。

罗经铁差

风 向 东南。

¹ 《满蒙杂志》（日文），1937 年 10 月刊，第 111 页，《李鸿章检阅海军日记与“定远”军舰航海日志》。

风 力	一乃至二。
天 色	晴、阴、雨。
下 差	
寒 暑	一一度乃至一五度。
风 雨	七五九乃至七六二。
记 事	上午四时航测百二十浬。 七时三十五分变为北八十度东。 八时航测百五十五浬。 八时十三分变为北四十六度东。 八时二十三分变为北十一度东。 八时三十三分航测百六十浬，半数航测器取上来。 九时到达旅顺下锚。 “海晏”轮进港，各军舰升旗、鸣放礼炮。 午后二时南北洋舰队五舰巡航大连湾。 二时四十五分开始起锚。 四时在港内白玉山下碇泊。 ¹

该日志“值更官员姓名”项下原来均有值更的官员姓名，但在资料来源文章中，被原作者千曲次郎省略，括号内说明系原作者所注，因此在下面的日志中，此项只能缺如，使我们难以弄清值更班次安排、轮换周期，殊为遗憾。

3、光绪二十年四月十日（1894年5月13日）

旅顺碇泊	
值更官员
船 程	
船 向	
罗经铁差	
风 向	午前中，西南；午后西；夜中，西南。
风 力	一乃至二，午后八时到十一时无风。

¹ 《满蒙杂志》（日文），1937年10月刊，第112页，《李鸿章检阅海军日记与“定远”军舰航海日志》。

天 气	午前中，微雨，很快转晴。
下 风 差	
寒 暑 计	一六度乃至二四度。
风 雨 表	七五六乃至七五九。
记 事	午前定例作业。 全舰升挂满旗。 九时演习鱼雷炮。 午后一时四十五分英舰一艘进港，检阅使在本舰会见英国海军司令官，鸣放礼炮。 五时起锚，到港外下锚。日本军舰一艘进港。 ¹

该日因为军舰停泊旅顺港，并无海上航行事项，所以“船程”、“船向”两项栏目空白。军舰碇泊时，上午均有定例作业，即舰上常规作业，譬如擦洗甲板、维护大炮、整理帆缆、保养轮机、油漆舰身等等。

四、兼考“济远”航海日志

《“定远”航海日志》，是北洋海军航海日志的一个典型标本，其发现不仅可填补北洋海军航海日志之空白，而且有助于廓清某些模糊认识。

此前，据称曾经发现北洋海军“济远”舰的部分航海日志，时间是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1894年7月25日、26日）两天，恰恰是甲午丰岛海战发生的日子。研究者以此航海日志为信史，当作第一手资料多有引用，甚而以此为据，证明方伯谦丰岛海战如何机智勇敢善战²。那么，这份“济远”航海日志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究竟如何？不妨将其与“定远”航海日志作一番比较，便会得出不同以往的结论。

如前所述，北洋海军航海日志是按统一格式印刷并装订成册，每月一册，而并非单张使用、事后再装订，《“济远”航海日志》自然也不应例外。此点很重要。然而发现的《“济远”航海日志》，却只有六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天，那么，整个六月份的整册日志，其他二十八天的日志哪里去了？因为是装订成册使用，

¹ 《满蒙杂志》（日文），1937年10月刊，第113页，《李鸿章检阅海军日记与“定远”军舰航海日志》。

² 《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之方俪祥《从作战时间看方伯谦问题》，第445页；林伟功、黄国盛主编，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散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再者，航海日志由海军稽核部门统一保管存档，即使因战争流落外间，也必然整册保存，单单把丰岛海战这两天从整册日志中裁割下来的可能性极小。因此，该《“济远”航海日志》的来历大有可疑。

再来比较一下两份航海日志样式、项目以及记录内容等方面的差异。航海日志须全程即时记录本舰全天的活动，军舰航行时，须记录船程、船向，记事栏内还有测速等等，这些都可由《“定远”航海日志》得到明证。而六月二十三日的《“济远”航海日志》中根本没有“船程”、“船向”两项，虽然有“风力”、“寒暑计”、“风雨表”等项，栏内也是完全空缺，没有记录¹。“定远”日志中每日必填的最常规项目，“济远”日志却不填写，与常理不合。而“记事”一栏，只记到丰岛海战结束；记录战况，不记己方舰船损毁、人员伤亡情况，反记敌方损伤情况²。试问：敌舰并未被我俘获，敌方损伤之详情，“济远”何由知之甚确？于事于情于理均相悖。

戚其章先生在专著《走近甲午》中，对照分析了《“济远”航海日志》与《冤海述闻》，得出两者均出自“济远”帮带大副何广成之手的结论³，殊是。然《“济远”航海日志》其真实性如何，戚先生似乎并未论及。笔者认为，其真实性大有问题，该日志并非原始的“济远”航海日志，而是何广成为了溢美方伯谦而于后来煞费苦心炮制出来的（譬如，日志把“济远”挂白旗的事实，捏造成敌舰“挂我国龙旗而奔”）。是故海战当天的日志记事较详细，但诸如“船程”、“船向”、“风力”、“寒暑计”、“风雨表”等多项常规数据，因时日既久，无法如实填写，只得或缺项或空项；而海战次日的日志，则因对方伯谦的评价关系不大，故仅有的左页记事简而又简⁴，右页的内容则干脆全部省略。这些破绽，既是炮制者事后杜撰难以避免的，也恰恰是炮制者功利心态不经意的流露。虽然日志所记内容没有多少真实性可采，但因炮制者是当年的北洋海军军官，对日志的格式还是有所依凭的，从这个层面而言，对于复原北洋海军航海日志，倒不失为有一定价值的参考资料。

（作者，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副馆长 海军史研究会会员）

¹ 《走近甲午》第四章《黄海海战》，第 259 页；戚其章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 月出版。

² 《走近甲午》第四章《黄海海战》，第 260 页；戚其章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 月出版。

³ 《走近甲午》第四章《黄海海战》，第 275 页；戚其章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 月出版。

⁴ 《走近甲午》第四章《黄海海战》，第 260 页；戚其章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 月出版。

谁说方伯谦“甚谙海战”了？

孙建军

1896年即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三年，由林乐知、蔡尔康翻译辑录的甲午战争期间报章报道的《中东战纪本末》面世。该书收录了当时报章的文章很多，其《朝警记十》之《威海卫海军之覆》篇中，收有一封“西简”，记录北洋舰队最后投降的过程，并对负责递送降书的“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对话记述甚详。如下：

“西简云：（丁汝昌）再召中西各员会议，佥称实已束手无策，不如设法降日以救生灵。乃于十八日遣广丙管驾程璧光乘坐镇北小舰，高揭白徽，直造日提督伊东祐亨座船，投递降书。伊东急会诸将商议，并派四舰扼守西口，以防华舰乘机逸出；旋请程君入客舱，程君身穿行装，口操英语，叙坐既定，伊东略与寒暄，因问：‘丁提督安否？’曰：‘病。’问：‘刘总兵安否？’曰：‘安。’问：‘食足乎？’曰：‘米与萝卜胶菜俱有。’问：‘牙山之役，方（伯谦）甚谙海战，何故杀之？’曰：‘上命也，丁公殊不愿。’问：‘威海何易失也？’曰：‘陆军与水师不相顾也，又无战律，诸事皆然，此总署之咎也。再战，徒伤生命，恐无济于事矣。’问：‘刘公岛近况如何？’……（按问答语甚长择其要者录之）伊东旋界以覆书，及馈丁帅香槟酒等物。程（璧光）许以明晨再送书来，遂别。十九日，镇北又入日营，而下半旗，众咸不解，及接见程差弁，面深墨，容甚戚，日人无不惨然，急叩其故，则曰：昨带贵提督公牒及私函呈丁公，观其容色，似甚感动，即入座作函毕，起而言曰：‘我事毕矣！’遂入卧室，服生鸦片一大剂。刘总兵、张总兵各如法服之。今提督及左右二总兵皆已殉节，我辈无所措手，惟有照昨日所议勉强办理而已”。东将或问程君曰：‘岛中今尚存若干人？’曰：‘水路兵士约共六千。水兵多闽广人，愿返烟台；陆兵多山东人，愿从威海登岸。惟医院中尚存受伤者七十人，不能行动耳。’日营遂定议，凡受伤者舁入医船，送至日本疗治，而派第三四队水师守岛，派日舰守华舰，又命捞除水雷，并请华军中牛道台（昶昞）主持降约。伊东因问程弁曰：‘贵军在威海时，闻我在荣成湾运兵登岸，曷不阻之？’曰：‘吁难言之矣，各舰虽奉军令而尽不肯行，曰：必欲去则

如以卵投石耳。’既而降约已定。廿二日华军全队出降于日营……”¹

这封“西筒”，也被王炳耀收录在其所辑的《甲午中日战辑》里，内容大体一样。²

叙事如此详细，如此生动，其真实性应当是无可置疑的了。特别是程璧光、伊东祐亨对话中关于方伯谦“甚谙海战”的那段问答，被人广为传述。

张陰麟先生对此即确信不疑，并在其《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里照单全收，并说明程璧光、伊东祐亨的对话是：“以英语相问答，其问答之辞曾摘译发表于当时报纸”。³

同样，罗林森(John L. Rowlinson)对此也是深信不疑，并特别提示说：“方(伯谦)的坚决支持者们还可以引用日本人的证词。”⁴

当代的一些治史者，特别是方伯谦的同情者们，更是引以为方伯谦张目的依据和翻案的利器。⁵

有些学者虽然对这封“西筒”的部分内容提出质疑⁶，但对这封“西筒”的真伪，仍未作出判断。

这封“西筒”作为史料，反复地被人们使用，显得如此重要，我们就有必要审慎地对待。研究历史，“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总为不错。我们不妨试问这样几个问题：一，这封“西筒”究竟从那里来？二，程璧光第一次送降书是否和伊东祐亨见过面？如果未见过面，那么上述的对话就根本不会存在；三，程璧光第二次递送降书时，是否见到了伊东祐亨？是否就此议定了降约？

¹ 林乐知译、蔡尔康辑：《中东战纪本末》，丛刊《中日战争》(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91~192页。

² 王炳耀辑：《甲午中日战辑》，见《近代外祸史》(中)，潮锋出版社，1950年11月版，第116~118页。

³ 张陰麟：《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见《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14页。

⁴ John L. Rowlinson 著，苏小东、于世敬译：《中国发展海军的奋斗(1839—1895)》，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93年1月版，第198~199页。

⁵ 详见《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7、8、121、150、172、200、247、273、284、293、314、332、345、378、293、412、457、515页。

⁶ 甲午战争期间的“主战派”健将文廷式认为：“至中东之役，有作战记者，则英人李提摩太者嘱其所役蔡姓为之。蔡于京朝事懵无所知，行妄而性鄙，素受合肥豢养，至是改易原电，颠倒是非，无所不至。纪事而诬，深可痛恨。”文廷式：《闻尘偶记》，见丛刊《中日战争》(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99页；

戚其章：“后来，伊东祐亨有‘牙山之役，方伯谦甚谙海战，何故杀之’之问，本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蓄意嘲弄，不足为证。”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0页；

戚其章：“所谓‘西筒’，当是某洋员致上海报馆的书信。这位洋员究为何人，暂时难以推定。即使他确实是北洋海军中的洋员，也不能证明这条史料有多么高的史料价值。相反，在这短短的数百字中，编造的痕迹处处可见。……这条材料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见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26页；

拙文《证据法视角下的丁汝昌自杀案》，也对这则史料指出了数处疑点，但对此一事实的真伪仍未作出判断。见孙建军：《丁汝昌研究探微》，华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210~211页。

我们看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想到的参加威海卫之战清军中的洋员们。戚其章先生认为，“所谓‘西筒’，当是某洋员致上海报馆的书信。这位洋员究为何人，暂时难以推定。”¹这里的“洋员”，当包括清军中的西方雇佣兵，和一些非战斗人员如威海卫海军医院的克尔克（Kirk）医生²。这些洋员能够出现在程璧光、伊东祐亨会谈的现场或者接近现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牛昶昞第一次登上松岛舰对伊东祐亨说：“丁提督临死，把后事全委托给了马格禄，因此，提督死后，刘公岛和威海卫的陆海军全靠马格禄指挥。但是，阁下已经明示来者必须是中国人，丁提督的下面就是小官，所以我来了。”³可见，马格禄尚且不能，更无论其他洋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些洋员听程璧光回刘公岛后的叙述而转述的。而转述、传闻的东西，就存在着误听、误记的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性，我们也有必要予以注意。清军方面也有外国记者，比如，《香港孖刺新闻》（*Hongkong Daily Press*）的战地通讯员肯宁咸（*Afred Cunningham*）⁴。再如，路透社记者史蒂文·哈特（*Stephen Hart*），旅顺之战期间就出现在旅顺战场，且被日军所拘。威海卫事急，哈特又从烟台赶往威海卫。⁵但这些洋记者跟军中洋员一样，不可能出现在“松岛”舰现场，理由同上述。

既然，清军中的洋员、洋记者们可能有误，我们理所当然地想到日本方面。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参战有多达 66 家报社 114 名随军记者。这些记者分别跟随海、陆军行动，如，“千代田”舰有《国民新闻》记者独步国木田哲夫，“浪速”舰上则是《中央新闻》的水田荣雄⁶。而龟井兹明随日军第二军乘船前往旅顺，就“有记者七八人同乘”。在大同江口，龟井兹明与记者摄影留念，“偶遇参谋长陆军步兵大佐大寺安纯君也加入记者一行并站在中央。列于其左右的有：东京日日新闻记者甲秀辅氏、开花新闻记者小崎文治郎氏、中外商业新报记者永原铁三郎氏、中央新闻记者大冈力氏、新朝野新闻记者山口明氏、朝日新闻记者川上参次郎氏共 9 人”⁷除了为数众多的从军记者，我们还可以想到其它的一些战争参

¹ 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 月版，第 325~326 页。

² William Ferdinand Tyler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London. Constable & CO LTD. 1929. p80

³ 丛刊续编《中日战争》（8），中华书局，1994 年 7 月版，第 274 页。

⁴ 肯宁咸作 *The Chinese soldier and other Sketches*（《水路华军战阵誌》），其第三篇关于威海卫之战部分，由李鼎芳译为《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发表于 1935 年 5 月 3 日《史地月刊》，并被收入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 6 月版，第 318~324 页。

⁵ 丛刊续编《中日战争》（11），中华书局，1996 年 9 月版，第 503、651 页；又见，【日】大谷正：《近代日本的对外宣传》，见郭富纯主编：《永矢不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2 月版，第 161~164 页。

⁶ [日] 井上晴树著、朴龙根译：《旅顺大屠杀》，大连出版社，2001 年 1 月版，第 87、89~90 页。

⁷ 《龟井兹明从军日记》，见高永学、孙常信译：《血证——甲午战争亲历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与者的记录和纪事，包括军舰的乘组人员、外国随军记者、观战武官等¹。这些人，特别是日本的战地记者们，从前方发回了大量的报道、战报。这些报道、战报被辑录成《日清战争实记》50编，分订10册。我们看日本方面的报道又如何呢？

《日清战争实记》“提要”二十九《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全灭》

“二月十二日午前八时，敌舰镇北号举白旗而来，接近我旗舰松岛，致中国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归降书于伊东司令长官，由广丙的舰长程璧光为军使。……伊东中将因回答称：……（书信内容略）

同时，赠丁汝昌香槟酒、威士忌酒和葡萄酒各一打及广岛产的串柿，以示厚意。

十三日午前九点左右，程璧光携丁书至，伊东中将引见，璧光悄然地说，丁提督昨夜作此书付诸使者后，自己服药身死，定远舰长刘步蟾和刘公岛陆军指挥官张文宣亦相继自杀。丁书说：……（书信内容略）

是日午后五点半，刘公岛道台牛昶昞代表中国陆军和上述军使同来，伊东中将乃作降服规约十一条示之，牛允诺。”²

“提要”“系有选择地综合当时日本战地记者的报道而成”³。如果说“提要”还有可能存在一些模糊之处，我们再直接查看《日清战争实记》的正文的详细记录。据《日清战争实记》第二十编《威海卫海战续记》：

“十二日午前八时，一小炮舰前樯悬白旗，后樯悬黄龙旗，拖一只小舢板，自东口驶出。众皆曰：此乃敌军之降使。他们来到英、德军舰近旁抛锚以后，立即有九人改乘舢板。我一鱼雷艇来到舢板近旁，拖舢板向我旗舰驶去。舢板亦在前面树白旗，尾部树一黄地黑龙旗。舢板靠近旗舰以后，撤去白旗，摇橹靠上松岛舰，有一、二人悄然登上松岛舰左舷梯。舢板退至松岛舰舰首停留。……（不久，日舰发出）信号曰：‘敌军就刘公岛之炮台、武器、弹药和港内军舰全部移交日本军队事派降使至松岛舰，并请求救助人命；丁提督平安无事。’……

敌军的降使是广丙舰舰长（相当于我军少佐）程璧光，现在乘来的炮舰是镇

年2月版，第24、28页。

¹ 【日】大谷正：《近代日本的对外宣传》，见郭富纯主编：《永矢不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9页；【日】井上晴树著、朴龙根译：《旅顺大屠杀》，大连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90~93页。

² 丛刊《中日战争》（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72~274页。

³ 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229页。

北号。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据守蕞尔弹丸孤岛，奋勇作战十四日，现在穷途末路，终于打出了降旗。在我旗舰上，我军对敌军的上述请求进行了详细的审议，其中松岛舰舰长有栖川若宫殿下提了不少建议。经过反复研究之后，以伊东司令长官名义提交了复信。

十三日午前八时二十五分，敌舰镇中如约来到旗舰松岛近旁下锚，该舰悬白旗，而且国旗下半，表示哀悼。使节仍然是昨日之程璧光。呈丁汝昌复信。

程递交此信后曰：提督见伊东长官复信，深谢其厚意。提督说我们的愿望既被应允，别无他求。写完回信，从容就死，接着定远舰管带（舰长）刘步蟾和刘公岛炮台司令官张文宣也相继自杀。……程短时对话以后，于十时四十分归去。旗舰松岛发出“丁汝昌已死”的信号，除举行仪式外，禁止奏乐。

此日午后五时二十分，中国第三次使节乘炮舰镇边前来。乘该舰前来的是代表陆海军之刘公岛道台牛昶昞和广丙舰舰长程璧光。他们来旗舰松岛谈判，十一时归去。……由此可知关于清舰投降的谈判已经完成。”¹

又据《日清战争实记》第二十一编《北洋舰队降服始末》：

“明治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午前八时，一艘敌舰，樯头悬白旗，出威海卫东口，向锚泊于阴山口的松岛旗舰驶来。旗舰发出信号，命令敌舰在距离我舰八百米处抛锚。

现在开来的敌舰是北洋舰队的炮舰镇北号。乘舰前来的军使是广丙舰舰长程璧光。他乘舢板来到我旗舰上，递交一封丁汝昌致我军司令官的信。

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接到这封信以后，欲就此事与第二军司令部进行一次协商。遂命昨夜停留于旗舰上的村冈炮兵大尉抄写信的全文，回虎山征询军司令官的意见。……军司令官大山、参谋长井上、参谋副长伊地知在虎山草屋之一角审议北洋舰队请降处分案。军司令部综合了几条意见，并决定一概委托参谋副长伊地知去办，派他作为第二军司令部的代表去联合舰队旗舰。

……

伊地知中佐到达旗舰时，正如石井大尉所说，伊东司令长官已经接受了丁汝昌的请求，并命令军使返回了威海卫²。伊东司令长官给丁汝昌回了信。十三日

¹ 丛刊续编《中日战争》（8），中华书局，1994年7月版，第247~249页。

² 应为刘公岛。

午前九时三十分，军使如约来到我舰队锚泊海域，会见我舰队司令长官和第二军参谋副长伊地知，再次提交丁提督的信件。

程军使提交这封信以后，悄然曰：丁提督昨晚把这封信交给小官，并写完发给李鸿章的电报以后，立即自杀。接着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刘公岛陆军指挥官张文宣也自杀了。……

程璧光带来了丁汝昌的遗书，并讲述了丁的自杀。我军在旗舰上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认为程璧光不过是一军使，因而不能与之讨论详细的条件，而须与代替丁汝昌的中国陆海军代表军官进行直接谈判。于是我军交给军使下述信件，命令他们于午后六时再来。军使返回。时值午前十一时。

……

午后五时半，牛昶昞作为中国陆海军的代表，与军使程璧光一起来到我旗舰上。于是在旗舰的房间里开始谈判。……于午后十一时前后确定了降服规约。

……

开始，军使程璧光两次来到我联合舰队的旗舰上。但程璧光仅是一名使者，地位低下，所以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一次也没有与程会见，仅派参谋军官与之应付。十二日夜丁汝昌死去，为讨论降服细则，我军命令对方派出代替丁汝昌指挥中国陆海军的人物进一步协商。为此，我军命令对方派出代替丁汝昌的中国人到旗舰来。这就是牛昶昞到我旗舰的原由。”¹

上述三则材料，我们不难澄清第三个问题：程璧光第二次上船根本没有和日方订立什么“降约”。

对于第二个疑问，程璧光两次送降书，见到了伊东祐亨了吗？究竟“伊东一次也没有与程会见”，还是第二次见了面，并有了交谈？程璧光第二次上“松岛”舰“递交此信（‘丁汝昌信’）后曰”（或者“提交这封信以后，悄然曰”）²的这位对象（“东将”）是谁？我们不好把握。但至少有一点完全可以确定：程璧光第一次送降书，根本未能与伊东祐亨见面，更没有进行过对话³。日本史料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记述是一致的，这是一目了然的，毋庸赘述。

¹丛刊续编《中日战争》（8），中华书局，1994年7月版，第270~274页。

²日本文献关于这个部分的记载是一致的。但，此次“短时对话”的内容是关于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等自杀的。这与《中东战纪本末》中“西简”的叙述也是一致。

³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作为官方著作，对此事的记载也可佐证上述推断。见《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下卷）第十一章第二节《降服始末》，东京水交社，1905版，第205~244页。

至此，我们已经明确了答案。既然程璧光第一次送降书时根本未与伊东祐亨会面，也就根本不可能有“西筒”所谓程璧光、伊东祐亨的对话，更不可能有伊东祐亨所谓方伯谦“甚谙海战”之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些喜欢拿伊东祐亨的话来为方伯谦说事¹的人们，需要慎重了！

（作者，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员）

¹ 与此相类似的说法还有，《冤海述闻》谓：“是役（丰岛海战），倭人犹有济远能战之图，散卖市上，冀其国人复仇，且战时知所防备。”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86页。其实，果真有此事，方伯谦的同情者们完全可以把这份图纸资料给找出来示以众人。相信，以日本档案资料收集、管理水平之高，要完成此举必不难，其效果亦必大胜于口舌争辩、开研讨会、发文章、出集子等诸般动作。

中日大东沟海战“济远”舰战斗过程综述

张黎源

1894年9月24日，北洋海军“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以其在中日大东沟海战中“首先逃走，致使船伍牵乱”¹之罪在旅顺口被处斩，原本此系铁案一桩，早已盖棺论定，怎料想从冤海述闻客所撰《冤海述闻》始，却兴起了一股为方氏翻案的风潮。尤其是近年来，以方伯谦旁系后人为首，在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研究学界中，为方伯谦翻案之嘈杂声音竟不绝于耳。翻案者往往从一己之臆想出发，粉饰方伯谦在丰岛海战、大东沟海战中的怯懦行径，却又拿不出严谨的史料作为佐证，这不仅玷污了纯粹的学术精神，而且得出的荒唐结论也常常成为笑柄，滑天下之大稽。

方伯谦问题，归根到底是他在丰岛海战和大东沟海战中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问题，而又以大东沟海战中的行径为最劣。本文将结合中日双方及西方的各种史料记载，廓清“济远”舰在大东沟海战中所处的位置，借以审视方伯谦在该此战斗中指挥的优劣得失。

一、大东沟海战的爆发与“济远”舰所处的位置

1894年9月16日，北洋舰队护送轮船招商局的“新裕”、“图南”、“镇东”、“海定”，北洋海军运输舰“利运”，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号商船装载铭军4000人赴大东沟登陆²。当商船队进入大东沟口内卸载时，北洋主力舰队则停泊在距离大东沟口12海里处的位置上。³据丁汝昌说，舰队是停泊于“大鹿岛、大东沟居中处”，⁴由此判断，北洋舰队的主力停泊位置应当在大鹿岛的东南方，大东沟的西南方，大约位于东经124度，北纬39度40分的位置上。

北洋舰队的碇泊队形为双纵阵，⁵按照北洋海军事先拟定的五叠小队阵形，

¹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² 《甲午中日战争（上）——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第148—150页；《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997页。美国“哥伦比亚”号商船参与运兵的记录，见詹姆斯·阿伦《在龙旗下》，转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六），中华书局，1996年版。

³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⁴ “前敌紧要军情各电清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⁵ 《冤海述闻》附航迹图，手稿影印版。

“济远”舰应当与“广甲”舰编成一队，位于纵队的末尾倒数第2队。¹

9月17日上午约10点半钟，北洋舰队发现了由西南方向逼近的一支舰队，随即确认为日本联合舰队。²正午12时，北洋舰队吹响战斗号角，并立即起锚，向联合舰队迎去。³

由于北洋舰队的碇泊阵形是适合于舰队航行的小队纵队，而如果要转变成利于海战的小队横阵，则需要经历一个变阵的过程。变阵的基本方法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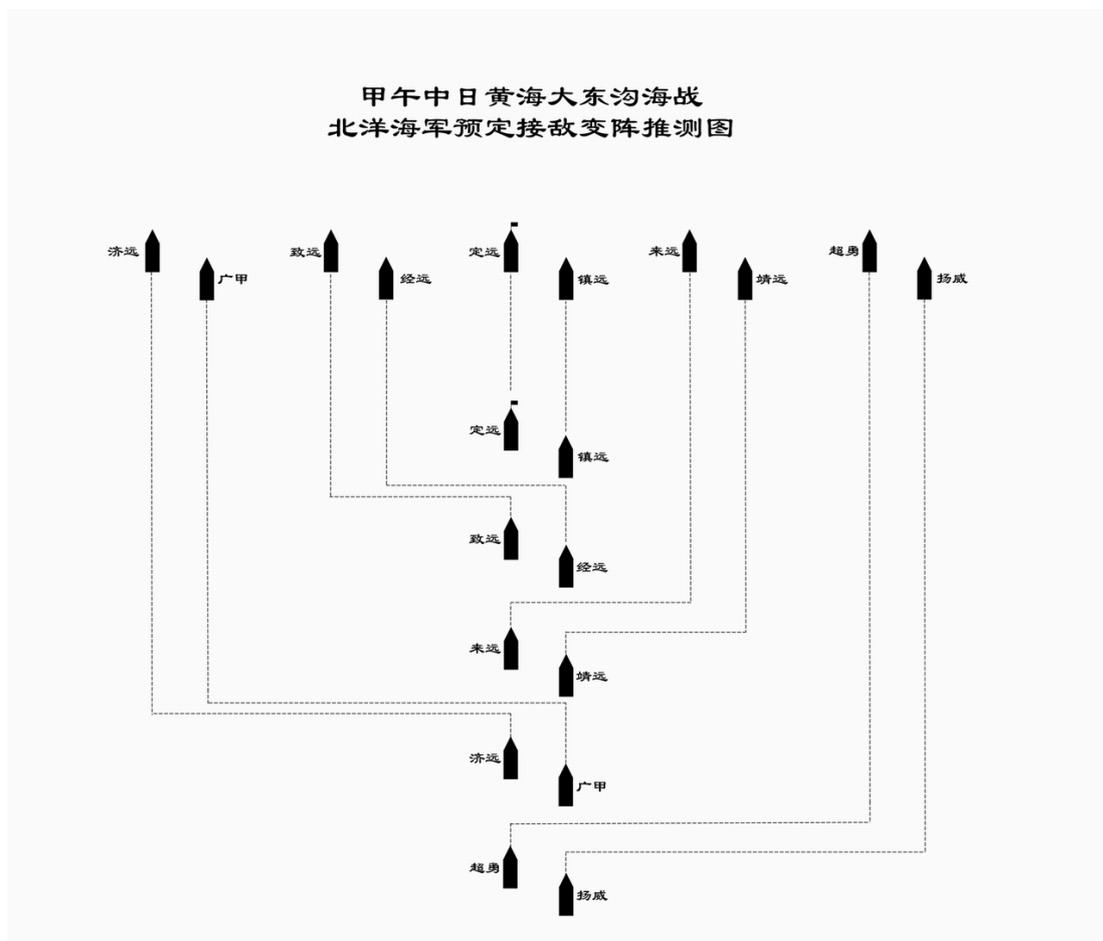


图 1⁴

可见，“济远”舰由于一开始在舰队的尾端，需要斜向进入阵位，因此航行距离比较长，加上作为基准舰的“定远”、“镇远”小队很早就开始以7——8节的战斗航速行驶，使得“济远”小队到12点50分开战时还未能能在左翼预定位置就位。⁵这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1、“济远”在甫一开战时日军主力就已经从其

¹ 《冤海述闻》附航迹图，手稿影印版。

² “李鸿章转呈汉纳根海战报告”，转见《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168页。

³ “李鸿章转呈汉纳根海战报告”，转见《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168页。又见马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张黎源译，北洋水师网站（<http://www.beiyang.org/wenku/mjf.htm>）

⁴ 陈悦：《黄海鏖兵》，现代舰船杂志2006年5B刊，总第264期，第46页。

⁵ 《冤海述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冤海述

右侧驶过，因而基本未能给日舰造成多少打击；2、由于日军与其相距过远，也鲜有炮弹是射向“济远”舰的。¹所以说，“济远”在开战之初是处于一个非常安全的地位上的。

但倘若细细分析我们也能发现，“济远”舰之所以未能在左翼就位恐怕还不仅仅是由于旗舰和阵位的因素。盖北洋舰队自 1210 左右起航²，到 1250 接仗，旗舰以 5——8 节的速度航行，大约能够航行 3.5 海里的距离，“济远”由于处于队尾，因此需要多航行大约 3600 米的距离；而“济远”的预定阵位距离旗舰“定远”左侧大约 2500 米，³由此可得“济远”理论上应航行的距离约为 10400 米（见图 2），折合平均航速至少应该达到 9.6 节。“济远”舰建成时的最大航速为 16.5 节，若非轮机严重老化，要达到 9.6 节的速度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而且根据后面的实际战斗情况来看，“济远”舰的航速也足能达到 12 节左右（详见第 3 节）。丁汝昌之所以一开始仅以低速航行，是为了照顾到锅炉近乎报废的“超勇”等舰，⁴而“济远”舰显然无此顾虑。所以说，“济远”舰在海战开始时未能进入阵位，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结为指挥人员的失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临阵退缩，畏敌不前的表现。

就有些翻案学者论及的“济远”之所以在开战之时地位比较安全，是由于“惧怕方伯谦指挥的济远，丰岛海战的阴影仍笼罩着伊东和联合舰队的心头”，所以“伊东只得被迫先打击北洋舰队的右翼，冒险率全队在北洋舰队阵列前作距离很长的横向运动，全队虽有被冲断的危险也在所不辞”。⁵这样的逻辑实在可笑，我们权且不考虑伊东祐亨对丰岛海战中狼奔豕突的“济远”哪来的畏惧之情，只说联合舰队攻击北洋右翼时的海战态势，该作者显然也只是在对史料未解读分明的情况下一厢情愿的猜测。要知道，在 12 点 18 分伊东祐亨发出“截击敌军右翼”前，⁶联合舰队的航向一直是指向北洋舰队中坚的铁甲舰的，⁷而北洋舰队的航向也显然是指向联合舰队的来袭方向，两支舰队就是在一条直线上对头行驶而已。

闻》附航迹图，手稿影印版。

¹ 黛治夫：《海军炮术史谈》，原书房，昭和 47 年，第 103 页。

² 陈悦：《黄海鏖兵》，现代舰船杂志 2006 年 4B 刊，总第 262 期，第 53 页。

³ 陈悦：《黄海鏖兵》，现代舰船杂志 2006 年 4B 刊，总第 262 期，第 53 页。

⁴ 《北洋海军舰船志》，现代舰船杂志社 2006 年版，第 54 页。另可见《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70 页，“超勇”因锅炉故障未能参加北洋海军的巡逻行动。

⁵ 王琰：“大东沟海战与方伯谦冤案”，《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 年版，第 90——91 页。

⁶ “坪井航三海战报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 年版，第 235 页。

⁷ “坪井航三海战报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 年版，第 235 页。

在这种情况下，伊东祐亨希望先击破北洋舰队的右翼显然只是因为右翼的“超勇”、“扬威”实力更为薄弱，而不需要考虑所谓的“冒险率全队在北洋舰队阵列前作距离很长的横向运动”。而之所以会出现后来联合舰队以右舷侧翼暴露在北洋舰队正前方的态势，完全是因为北洋舰队大约在 12 点 50 分左右全体右转了 4 个方位点所致。¹可以想象，如果联合舰队选择了先行攻击北洋舰队左翼，北洋舰队也会相应地左转 4 点，从而使联合舰队的左舷暴露于自己的炮口下。综上所述，翻案派仅仅着眼于一些未亲历过海战人员的转述分析，而未尝详考海战的真实形势，得出的观点自然是荒谬的，所引申出来的分析更是没有意义的。

大东沟海战的继续及“济远”舰战斗过程概要

大东沟海战甫一开始，北洋舰队便由于“定远”舰信号桅杆被毁，提督丁汝昌受伤而失去了统一指挥。²但是根据北洋舰队战前拟定的“乱战”战术思想，在第一阶段的战斗中，即使北洋舰队没有任何的旗令指挥，仅凭丁汝昌的战前训令和旗舰的行动指引，也能够保持舰队的基本队形齐整。³然而有些翻案派学者却抓住丁汝昌没有制定代理旗舰这一条，大肆攻击丁汝昌的无能和北洋舰队的战备之差，意欲为方伯谦开脱。⁴然而且不说北洋舰队中央指挥的失去与方伯谦后来的临阵逃脱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即使丁汝昌真的庸碌无能也不能衬托出方伯谦的英武伟大；而且正如前文所说，开战队形的不整很大程度上应该追问方伯谦管带的“济远”为何未能在左翼就位。海军实行“乱战”战术，需要做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保持队形的整齐，从而达成多点突破、将敌军阵列截成数段的效果，⁵而“济远”舰未能就位，则导致了舰队断其一翼，最终未能完全实现对日本舰队的分割预想。据《冤海述闻》记载，方伯谦在大东沟海战事后问刘步蟾：“军无令，队不整，是谁之过？”⁶（显然是意欲抨击刘步蟾未能代理实行提督之职，号令全军）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句话倒是该反问方伯谦更为恰当。

随着海战的继续，日本第一游击队已经横过北洋舰队右翼，并开始向北洋舰

¹ “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²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

³ 陈悦：《黄海鏖兵》，现代舰船杂志2006年5B刊，总第264期，第47页。

⁴ 王琰：“大东沟海战与方伯谦冤案”，《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⁵ 陈悦：《黄海鏖兵》，现代舰船杂志2006年5B刊，总第264期，第48页。

⁶ 《冤海述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队后方包抄，同时对北洋右翼的“超勇”、“扬威”施以猛烈的炮击。而这个时候，日本联合舰队的尾队已经被“定远”、“镇远”为首的北洋舰队切断，日军的“比睿”、“扶桑”、“赤城”等舰与北洋舰队展开了缠斗，其中“比睿”舰更是直接向北洋舰队阵列当中驶去。据“比睿”舰的战斗记录，当其冲入北洋舰队阵列时，“定远”、“镇远”，左翼的“经远”、“致远”，右翼的“来远”等舰都向其逼近，而当其逃过第一轮攻击后，“超勇”、“扬威”和“广甲”也都纷纷向其逼近。¹查此时唯独没有被日方资料着重记载的只有“靖远”舰和“济远”舰，而当“超勇”、“扬威”因遭受第一游击队的打击而退避后，“靖远”舰需要担负支起北洋右翼阵脚的重任，承受正经过其前方的本队的攻击，任务显然不会轻松。这样算下来，唯一“超然世外”的军舰就恐怕只有“济远”了。

此后，北洋舰队分成了2个战术分队，“来远”、“致远”、“广甲”参与了追击“比睿”、“赤城”的战斗²；“定远”、“镇远”等舰则继续随本队前进，尾随攻击之。³而“济远”舰却再次在日方的资料记载中“消失”。究其原因，与其说是战场能见度差或日方记载缺失，倒不如说是“济远”舰“满海跑”（北洋海军水手陈学海语⁴），一直远离于日军视线之外，令日军无从发现。

在这个时间段中，还发生了一件后来引起广泛争议的事件，即“济远”舰在混乱中撞上了“扬威”舰，导致业已发生火灾的“扬威”舰不得不驶向浅滩，搁浅自救。虽然这一事件的确凿性当已无疑，⁵但几乎所有的相关记载都未提及该事件发生的时间。笔者根据多种史料综合判断分析，认为这一冲撞时间最有可能发生在14点10分左右，即“扬威”舰向大鹿岛退走之前，理由如下：

1、该时间“济远”与“扬威”航线交叉的可能性最大。我们已知“济远”原先处于北洋左翼，而“扬威”处于右翼，二者相去甚远。而北洋舰队阵型混乱后，“济远”舰“满海跑”，极力躲避联合舰队的攻击，很有可能在“狼奔豕突”中撞上“扬威”。

2、该时间战场上能见度最差。在海战刚开始或“扬威”已经驶向大鹿岛边搁浅时，由于战场上并未密布硝烟，能见度是比较好的，因此“济远”几乎不

¹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179—180页。

² “‘赤城’战斗报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58页。

³ “坪井航三海战报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7页。

⁴ 威海莹：勿忘甲午丛书——《甲午战争在威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05页。

⁵ 关于“济远”撞上“扬威”一事的考证，详见孙建军：“‘济远’撞坏‘扬威’考证”。《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7年第2期，第21—26页。

可能因看不清前方的航路而与“扬威”相撞。

3、在该时间 2 舰相撞最符合事件的逻辑。“扬威”甫一被撞便因为进水而不得不向大鹿岛边抢滩，而“济远”舰也在不久后因惊惧羞惭而逃离战场，于情于理都是说得通的。

“扬威”舰此后冒险从本队前方驶过，向西北方向的大鹿岛驶去，¹并在大鹿岛边冲滩搁浅。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主战场距离大鹿岛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扬威”虽为“济远”冲撞，但最后仍能挣扎着开上浅滩，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次冲撞的后果可能未必十分严重。但是即便如此，“济远”也不能逃脱冲撞友舰、自摆乌龙的干系。

就某些翻案学者根据寥寥几份史料加以自己的臆想而得出的“扬威”被“济远”撞上一事为丁汝昌编造的结论，陈悦先生已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读后——论黄海大东沟海战方伯谦三项罪名均非捏造》²一文中深入辩驳，但笔者在此仍想不吝笔墨加以补充。

首先，有学者在撞击时间上质疑，认为“济远退出战场时，扬威不可能还在战场上，也就不存在济远碰坏扬威的事”，³这就不知道是什么逻辑了。“济远”退出战场在后，“扬威”退向大鹿岛在前，这与“济远”撞“扬威”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扬威”正是在被“济远”撞击后，才挣扎着向大鹿岛抢滩，而“济远”在之后不久也逃离了战场，时间的先后顺序并没有错，也就是说，该文作者所说的“济远退出战场时，扬威不可能还在战场上”的理由得不出“不存在济远碰坏扬威的事”的结论。事实上，这位先生的问题症结是搞错了“扬威”向大鹿岛的撤退时间，而武断地认为“扬威”甫一起火就向大鹿岛逃遁。就此问题，《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读后——论黄海大东沟海战方伯谦三项罪名均非捏造》一文中已经就“扬威”的撤退时间进行了深入研讨，笔者毋庸赘述，只是想奉劝这些学者，仅靠“如果”和“想象”来断定一件史实无论如何也不是严谨的治学方法。

¹ “伊东祐亨海战报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23页。大鹿岛在西北方向的记录，见“高千穗舰某尉官亲笔记述的黄海海战实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55页。

²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读后——论黄海大东沟海战方伯谦三项罪名均非捏造》，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7年第3期，第21—32页。

³ 刘志坚《清季一大冤案——方伯谦被杀真相》，《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其次，二舰的航路是否会交叉？翻案派以“扬威”在北洋右翼而“济远”在北洋左翼为由试图否认二者航路交会的可能性，但显然地，这种对海战模式的定式思维是漠视了大东沟海战瞬息万变的战况的。北洋舰队在实施第一阶段的冲击未果后，阵形便陷入混乱，除“定远”、“镇远”小队仍结队作战外，另外大部分舰艇都各自为战，并未保持原有的横队队形。所以这个时候来谈“左翼”或者“右翼”都已经毫无意义。陈悦先生在所著文中认为，“济远”等舰有可能是在向浅水区逃跑的过程中撞上“扬威”的，¹这固然是二者航路交叉的一种可能性，但正如笔者前文中所说，最大的可能仍应是“济远”在乱军之中与“扬威”航路交叉，进而相撞。

再次，有翻案学者认为“扬威”搁浅在浅水，“济远”吃水大于“扬威”，故不可能深入浅水撞击之。陈悦先生从航海基本常识的角度论证了这种情况仍有可能性，但陈先生也在文中特别指出，所有提及“济远”撞上“扬威”的一手史料都没有说“济远”是在“扬威”业已搁浅的情况下撞上她的（在浅水区相撞的描述实出自后人根据种种战报编撰的《中东战纪本末》）。丁汝昌的海战报告中更明确指出：“扬威舱内因被弹炸，又为济远当腰触裂，驶至浅水而沉。”²这说明“扬威”在被撞击后还航行了一段时间。根据笔者前面的推测，“扬威”也应该是在主战场上被“济远”撞上的。

综上所述，方伯谦管带的“济远”在大东沟海战的关键阶段非但没有积极投入战斗，反而自摆乌龙，撞坏己舰，对海战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此事件证据确凿，是无可翻案的。

三、“济远”舰临阵脱逃始末考证兼驳“西战场”说

“济远”舰在“致远”舰被击沉后，首先溃逃，当是不争的事实。至少有以下几份史料对此有着详细的描述：

丁汝昌海战报告：

“当酣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方伯谦首先逃回，各船

¹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读后——论黄海大东沟海战方伯谦三项罪名均非捏造》，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 2007 年第 3 期，第 21—32 页。

²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34 页。

观望星散。”¹

“济远先被敌船截在阵外，及见致远沉没，首先驶逃；广甲继退。”²

坪井航三海战报告：

“最后敌阵终于全面溃散，各自逃遁。其中有济远、广甲、来远、经远、靖远、广丙。济远则先于他舰逃跑，广甲、来远、经远、靖远继之，皆以大连湾为目标。”³

“高千穗”尉官海战记录：

“……敌终于不支，四分五裂，全面败退。济远、广甲首先向西南败走，五舰继续延陆岸而逃。”⁴

马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

“而“济远”由于其怯懦的方管带，在敌人开始炮击后不久就逃跑了。在 2:45 我们看见这艘船大约在我舰右舷后方 3 海里处，航向西南方向的旅顺口。我们的炮手们纷纷对此咒骂不休。”⁵

塔不留·雷阿德·库劳斯著《日清海战》：

“超勇奔往大鹿岛，准备把船开上浅滩。正在不断喷着火焰航行时，正遇见慌乱逃走的济远，结果被撞沉于浅海，船员抱住绳索等器械，后被鱼雷艇救助。

济远目睹兄弟舰艇危急，为何如此急于逃走而不予救助，其意是在难解。后来舰长终于以自己一命偿此过失。济远遭受日军的损害不大，仅仅由于舰尾炮的坐力，损坏了找准器，以及由于榴弹爆炸有数名士兵被炸死，其余部分丝毫未遭损坏。”⁶

其中丁汝昌报告和坪井航三的海战报告属于官方报告，是综合了海战中各种见闻而成的最能代表实际情况的报告，具有高于其他报告和记载的说服力。而反观翻案派抱住的《冤海述闻》和《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两份史料，均属于个人记录，其严谨性显然不能与官方报告相比。我们也不妨看看这两份资料中是如何记

¹ “寄译署”，《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页。

²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³ “坪井航三海战报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8页。

⁴ “高千穗舰某尉官亲笔记述的黄海海战实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55页。

⁵ 马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张黎源译，北洋水师网站（<http://www.beiyang.org/wenku/mjf.htm>）。

⁶ 塔不留·雷阿德·库劳斯：《日清海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60页。

述的：

《冤海述闻》：

“济远中炮弹数十处，后炮座因放炮不停，炮针及螺钉俱震动溃裂，致炮不能旋转。前大炮放至数十余出，炮盘熔化，钢饼、钢环坏不堪用，全船各处通语管亦被击坏，二副守备杨建洛、学生把总王宗墀阵亡，在船死者七人，伤者十余人，力大不支。

初，敌分四船截击经远、济远，迨经远沉，遂并力击济远。我军督船弃而不援，偕镇远而东。济远被倭四船截断在西，且船中炮械全坏，无可战，只得保船西驶。倭船鉴于牙山之役，恐我诱敌，不敢穷追，不然亦齑粉矣。

……

广甲自午开仗，约一点钟时，即离队……”¹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

“‘致远’既覆，‘超’、‘扬’既火，‘广甲’尤胆落，急返棹而逃。时‘来远’火甚，前舱尽焚，已延机舱及于将台之下，乃离队自救。适趋‘广甲’之侧，呼救不已。‘广甲’不顾，‘来远’怒击之，中其厕所。‘广甲’开足轮机而逃，故‘来远’再击之，已无及矣。‘济远’当敌之冲，迎击既久，炮多炸裂倾倒，无以应敌，于是亦逃。”²

综观这2份翻案派的“鼻祖”史料，都认为“广甲”逃脱在前，而“济远”是由于“炮械全坏”才不得不“保船西驶”的。近年来，有些学者更是借题发挥，想当然地为“济远”创造出了一个“西战场”来，试看下文：

“日方的这段记载还明确地说，经远是被高千穗和吉野追上来夹击打沉的，这与中方的一些记载相合，据记载，经远随致远冲击日舰，管带林永升脑裂阵亡，船行无主，被创亦甚，遂避往大鹿岛，途中被第一游击队追上击沉。那么第一游击队的浪速和秋津洲二舰这一期间在原战场与谁交战呢？如果依传统说法，致远早沉，济远、广甲已逃，该是四舰环攻经远，但这与日方记载不合，日方记载只有吉野、高千穗二舰与经远缠斗，这一记载是否可信呢？我认为非常可信，若是按中方传统说法第一游击队四舰自3时即环攻经远，经远早就沉没或被俘获了，无论如何坚持不了近两个小时，即使按实际经远坚持的时间56分钟，也不可能，

¹ 《冤海述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² 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手稿影印版。

双方实力相差太大了，且经远随致远冲阵已负重伤，又船行无主，不能作有力的反抗，而承受日舰夹击近一个小时，则较为可信，所以西战场必还有中国军舰与浪速和秋津洲苦斗，这是任何思维能力健全的人都能得出的推论。那么这艘中国军舰究竟是谁管驾下的战舰呢？回答只能是方伯谦管驾下的济远号。当时广甲早逃，致远沉没，经远避往大鹿岛方向，西战场只可能尚存济远一舰。会不会是靖远、来远二舰呢？不会，二舰此时正在大鹿岛修理、灭火和集合队伍，尚未回到战场，而定、镇二舰正在与第二次绕击它们的联合舰队本队苦苦相持，根本不曾与第一游击队交手，也无余力西顾。”¹

这位先生说了这么多，所凭的依据无非是《近世帝国海军史要》上的一段记述：

“（午后）三点五十二分，高千穗从三千三百码之距离猛击之（经远），吉野又以六英寸快炮从二千五百码之距离与高千穗夹击。至（午后）四点四十八分，经远左舷倾斜，火起，舰底现出水面，舵机失其用，……船身直立，轰然炸裂而沉。”²

《近世帝国海军史要》中的这段记载，只说到了“吉野”与“高千穗”参与了对“经远”的攻击，但没有说仅有这两艘军舰攻击“经远”。另有《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上说得非常清楚：

“同（四点）三十分增加航速为十四海里，同四十八分吉野在三千二百米至二千五百米的距离上开始试射，随后在一千八百米距离上加以痛击。不久经远左舷倾斜，黑烟从舰内喷出，航向摇摆不定，无法自如操舵。五时五分变换针路为东方，吉野欲追及之，于是变航速为十海里，向左变换航向十六点。恰好这个时候高千穗、秋津洲、浪速也来会合，于是一起对其猛烈打击……”³

可见，在追击“经远”的过程中，先是由航速较快的“吉野”一马当先，直至17点05分后，第一游击队的其他3舰才赶来会合，第一游击队4舰都参与了对“经远”的攻击。

另外，第一游击队司令长官坪井航三战后递交的航迹图上也明确画出，第一

¹ 王琰：“大东沟海战与方伯谦冤案”，《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² 浅野正恭，《近世海战史》“日清海战史”篇，转见《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875—876页。

³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217页。

游击队在攻击“经远”时仍是一个整体，只是在“吉野”与“高千穗”之间有比较大的间距。¹第一游击队的这种前后脱节并不妨碍其作为一个战斗集群的整体性。

那么，为什么第一游击队在追击的过程中会发生前后脱节的状况呢？笔者注意到，在大东沟海战前面的战斗中，这种状况也一度发生过。比如在14点20分左右，当第一游击队打算掉头援救“比睿”、“赤城”时，就由于“西京丸”突然闯入队列而导致“浪速”舰脱队，“我（坪井航三）虽费尽苦心，但直到激战末了才接近其（‘浪速’）附近。”²另外，在高速航行的过程中，第一游击队也出现了间距过大的问题，比如在14点54分，需要减速并整顿队列。³第一游击队虽然号称编队航速可以达到18节，但1884年和1885年下水的“浪速”和“高千穗”舰龄接近10年，早已不是什么新舰，也显然难以长时间保持16节以上的高航速行驶。因此当“吉野”凭着其全球第一的高速“飙车”时，第一游击队的后续军舰被拉下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仅凭《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上的这条记载，我们就已经能推翻所谓的“西战场必还有中国军舰与浪速和秋津洲苦斗”的推论了。于是再谈其他与“西战场”有关的话题就都已经毫无意义。但是笔者在这里还是想要正告提出如“西战场”说这样的“高见”的学者们：任何思维能力健全的人，都不应当仅凭只言片语加以自己的假想和臆测便想当然地下定结论，更遑论做历史研究这样需要严谨求实精神的学问！

“西战场”说不值一驳，让我们再来看《冤海述闻》和《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的记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两本陈年史籍的翻案水平倒是比后来学者的种种高谈更胜一筹，至少，二者所提到的“广甲”先于“济远”逃跑，以及“济远”“炮械全坏”的情况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济远”伤情究竟如何，笔者将在第4节中探讨，这里着重讨论“济远”与“广甲”逃跑孰先孰后的问题。

在笔者前面列举的史料中，至少丁汝昌、坪井航三等都明确指出，是“济远”先逃，“广甲”随之。坪井航三战后呈交的航迹图中也显示，北洋各舰撤逃的顺

¹ 第一游击队航迹图，其十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7页。

² “坪井航三海战报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8页。

³ “坪井航三海战报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8页。

序是“济远”为先，“广甲”次之，“经远”、“靖远”、“来远”等在后。¹在中日双方官方报告记载如此一致的情况下，《冤海述闻》与《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两份史料的记述就显得尤为突兀。

笔者注意到，“广甲”管轮卢毓英对“广甲”逃遁后的情况也有以下一段记载：

“方‘广甲’之逃也，有敌舰三艘尾其后，追之甚力，相离仅六、七千码。‘广甲’惧，急傍山边而逃。时‘经远’正傍山边而行，恐水浅船搁，急转开山边，适出‘广甲’之后，挡住敌船，竟为敌炮所中，卒然而沉。船桅皆没，犹见两股浓烟出自水面。哀哉！比及敌船越过‘经远’之前，而‘广甲’去已远矣！‘广甲’设无‘经远’，必然无幸，此中岂非数乎！”²

也就是说，卢毓英在文中也指认了“广甲”之后即为“经远”，这与坪井航三的记载是颇为相符的。而如果按《冤海述闻》所说的“广甲”之逃在前而“济远”之逃在后，那么“广甲”之后应出现的就应当是“济远”而非“经远”了，第一游击队也一定会先以最近的“济远”舰为目标进行打击，但这显然是与事实相违背的。

根据日方的记载，“广甲”在撤逃之前至少参加了对“赤城”舰的围攻，³《冤海述闻》中所谓“广甲自午开仗，约一点钟时，即离队”的说法纯属信口胡诌。这样看来，《冤海述闻》连“广甲”逃跑的具体时间都未查分明，就敢一口咬定是“广甲”逃跑在先，实在大有可疑。

而且从逻辑关系上来讲，《卢氏甲午前后杂记》其实并没有指明“广甲”与“济远”逃遁孰先孰后，它只是说“济远”“于是亦逃”，这个“亦”既可以理解为时间上的承接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仅仅表示“济远”与“广甲”一起逃遁的状态。倘若仅凭这四个字便论定“济远”后于“广甲”而逃，也似乎显得武断。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广甲”在“济远”之前逃遁一说漏洞百出，不足为信。北洋各舰撤逃的顺序当是“济远”在最前无疑。

另外，《冤海述闻》中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段“济远”舰在“经远”沉没后大战第一游击队的场面，实际上，海战的另一方当事人——第一游击队司令长

¹ 第一游击队航迹图，其十——其十五，“坪井航三海战报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4——247页。

² 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手稿影印版。

³ “‘赤城’战斗报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58页。

官坪并航三说地清楚：

“之后（‘经远’沉没后），立即驶向大孤山镇海面。在追击靖远和经远（应为‘来远’，笔者注）的途中，于五时四十五分由本队旗舰发出‘返回本队’的信号，于是掉转航向向旗舰靠拢。”¹

在击沉“经远”舰后，第一游击队根本没有向西顾及已经逃远的“济远”、“广甲”舰，而是转舵向位于大鹿岛边修理灭火的“来远”、“靖远”驶去。查“经远”沉没的时间为 17 点 29 分，第一游击队在 17 点 45 分就被本队召回，实际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向“靖远”和“来远”发起攻击。而所谓的“遂并力击济远”更是纯属无稽之谈。

笔者有意考证了一下“济远”舰逃奔回旅顺的平均航速。戚其章在《论方伯谦被杀是否冤案问题》中考证“济远”舰的逃离时间在 1540 左右，²尚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而“济远”抵达旅顺口的时间如马吉芬所记载为 9 月 18 日半夜 2 点多，³那么航行时间大约为 10 个多小时。而查大东沟战场与旅顺口最短航路（大东沟——小长山岛——三山岛——旅顺口）约为 127 海里，⁴这样算下来，“济远”舰逃奔时的平均航速约为 12 节，不仅大大超过北洋舰队的战斗航速，而且也超过了联合舰队本队的战斗航速。结合笔者在第 1 节中的分析，能够达到 12 节航速的“济远”为什么却迟迟未能在左翼就位实在应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倘若“济远”按某些学者的所谓“西战场”之说在战场上苦斗，并滞留到了海战的最后阶段，即 1730 左右，⁵那么“济远”舰的逃奔速度非达到 15 节以上不可（其新建成时的极限航速为 16.5 节），这样不可思议的航速恐怕也只有同样“不可思议”的管带方伯谦和众位翻案派学者们才能创造吧！

综上所述，“济远”管带方伯谦在“致远”沉没后，惊惶失措，率领己舰首先逃遁，致使其行动被“广甲”等舰仿效，实有牵乱队伍之责，罪无可逭。在此，笔者想要奉劝一些研究者，应当追问的是“广甲”舰吴敬荣为何在随“济远”退避后未遭严惩，而不是绞尽脑汁地为方伯谦怯阵逃跑的行为圆谎、开脱，其后果亦只能是越洗越黑而已。

¹ “坪井航三海战报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 年版，第 239 页。

² 戚其章：“论方伯谦被杀是否冤案问题”，《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1 月版，第 332—354 页。

³ 马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张黎源译，北洋水师网站（<http://www.beiyang.org/wenku/mjf.htm>）。

⁴ 辽宁省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05 年版。

⁵ 王琰：“大东沟海战与方伯谦案”，《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第 98 页。

四、“济远”舰炮术及损伤情况研究

“济远”舰的弹药消耗数字据《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记载，共消耗 210mm 主炮炮弹 53 发，150mm 尾炮炮弹 100 发，¹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查同样参加大东沟海战的“靖远”、“来远”等巡洋舰的弹药消耗数字分别为：“靖远”舰消耗 210mm 炮弹 103 发，150mm 炮弹 30 发；“来远”消耗 210mm 炮弹 30 发，150mm 炮弹 28 发。²其中仅有“靖远”舰的 210mm 火炮弹药消耗量大于“济远”舰的消耗数字，但“靖远”的 210 炮位不仅多于“济远”，且使用了比较原始的制退复进机器，能够获得这样的高射速还是有可能的³；但反观“济远”舰的 210mm 和 150mm 克虏伯炮，则是安装于最典型的克虏伯炮架上，采用架退方式达到制退——复进的目的，发射过程十分繁琐，而却要达到这样的弹药消耗量简直匪夷所思。我们不妨来算一笔帐：从大东沟海战爆发（12 点 50 分）到“济远”舰退出战斗（15 点 30 分），其中该舰至多经历了 2 个半小时的战斗。要在这 2 个半小时里消耗掉 53 发 210mm 炮弹和 100 发 150mm 炮弹，就需要达到 6 分钟一发和 1.5 分钟一发的射速，而查 150mm 火炮的理论射速也不过 1 分钟一发，而在大东沟海战中这样不断出现“中场休息”，⁴炮烟弥漫，还要承受敌弹、火灾干扰的战场上，要达到 1.5 分钟一发的射速是极其困难的；而如果考虑到“济远”舰的 150mm 尾炮在后期还被击坏，不能使用的情况，进行这般的高速射击就更属于天方夜谭。所以对于《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的这个统计数字，笔者只能作以下 3 点推测：1、“济远”舰的炮手发挥神勇，频频在超远距离上以极限射速向日舰炮击，有时候甚至在连目标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盲打”；2、资料统计错误；3、战后有人在弹药消耗的数字上做了手脚。

但是根据笔者所查到的另一份史料，却完全是另一个说法。哈富门，这位当时在“济远”舰上担任总管轮，亲身参与了大东沟海战的英国洋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谈到了“济远”舰的伤损和炮弹消耗情况，他说：

“共放十五生的美敦之炮三十五响，机器亦受损，不能运动；有廿一生的美

¹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

²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

³ 《北洋海军舰船志》，现代舰船杂志社 2006 年版，第 59 页。

⁴ “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50 页。

敦之炮一尊,机器亦已损坏,炮架不能运动,方统领见已如此,只得退回旅顺。”¹

显而易见,这里哈富门提到“济远”消耗 150mm 炮弹 35 发(折合平均射速约 4 分钟多 1 发),与《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上的 100 发记载向去甚远。孰是孰非,恐怕也无须笔者多说了。

这样看来,《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的“济远”弹药消耗记载是大有问题的,那这个弹药消耗数字的来源是哪里呢?是某人在战后谎报、乱报,或是日本统计资料时信息来源不准确?笔者暂时亦不敢擅加定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史料发掘和考证。

另外,《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上记载的“济远”舰中弹数目也有问题。严格地说,该资料对所有中国舰艇的中弹数目统计都存在问题。该资料在统计日方中弹数目时,由于日舰中弹数量普遍较少,而且战时舰上情况比较稳定,因此可以做出比较明细的中弹情况统计。这个统计数字基本上囊括了直接命中弹、跳弹、近失弹和空爆弹造成的弹片损伤等,每一次中弹列为一个条目。²而在对中方舰艇的中弹数目统计时,则无法做到如此明细的程度。根据笔者的推测,该记载中所谓的“中弹数目”很有可能应当是在战后对军舰上损伤部位的统计数字,即应当对应“损伤部位数目”,而一次中弹通常能够造成多处损伤。所以说,这个中弹数字是需要打很大的折扣的。比如“定远”、“镇远”所谓的中弹 159 发和 220 发都应当不到此数,同样,“济远”所谓的中弹 15 发当也要打一个折扣。³

即便我们抛开“济远”的真实中弹数目,仅仅看《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中的记载也能显而易见地发现,“济远”舰是北洋舰队幸存各舰中中弹数目最少的军舰之一。只有中途加入战斗的“广丙”舰中弹少于“济远”舰;而连同样是半道杀出的“平远”舰的中弹数目都比“济远”来得多。⁴中弹寥寥几处,便称“伤处甚多”⁵而遁回旅顺,敢问方伯谦能否对得起船倾弹绝而怒撞“吉野”的“致远”舰?能否对得起管带阵亡仍力战船沉的“经远”舰?能否对得起遭遇 5 舰围攻却死战不退的“定远”和“镇远”?又能否对得起船面被烧光,但依旧坚持到战斗结束的“来远”舰?翻案者在替你们的或伯公或同乡翻案时,可曾想到

¹ “纪济远兵船两次开仗情形”,《中倭战守始末记》(卷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印行,第45页。

²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日清战役海军卫生史第四编》,影印件。

³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280页。

⁴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280页。

⁵ “军情要电清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他老人家若面对死去的千百海军同僚时，一定也会愧杀！

那么，一贯作为翻案派为“济远”逃奔开脱原因的“炮均不能放”¹是否属实呢？考察“济远”舰装备资料，共有 210mm 克虏伯 1880 式火炮 2 门，150mm 克虏伯 1880 式火炮 1 门，47mm 哈起开斯炮 2 门，37mm 哈起开斯炮 9 门，大小火炮总共 14 门。²而如果按《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上的记载中弹 15 发，几乎要做到一发炮弹消灭一门火炮，敢问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退一步说，“济远”会不会是 210mm 主炮和 150mm 尾炮都损坏了呢？哈富门的访谈上说“济远”舰的 150mm 炮“机器受损，不能运动”，而 210mm 炮 1 门“机器亦已损坏”，并且“炮架不能运动”³；也就是说，150mm 炮无法使用，210mm 炮由于炮盘损坏，无法旋转，导致了“济远”3 门大口径炮全部无法使用。

《冤海述闻》则说：

“济远中弹数十处，后炮座因放炮不停，炮针及螺钉俱震动溃裂，致炮不能旋转。前大炮放至数十余出，炮盘熔化，钢饼、钢环坏不堪用……”

这里涉及到近代克虏伯火炮的几个专业名词，需要搞明白其具体含义才能进一步加以分析。“济远”舰前 210 炮的所谓炮盘指的是将火炮下炮架固定在一个类似磨盘的旋转机构上，以实现炮台的整体旋转；钢饼和钢环属于火炮的闭气部件，钢环装置在药室尾部，而钢饼则装置在横楔式炮闩上。在火炮发射时，药室中的爆炸燃气推动钢环向后移动，与钢饼共同密闭炮膛与炮闩间的缝隙。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前 210 炮开炮，火炮连续发射时产生的热量尚不足以熔化炮管、炮闩，又怎么可能会熔化掉下炮架以下的炮盘呢？“济远”后炮所谓的“炮针”和“螺钉”查《克虏伯炮图说》上均无此概念，可能是在北洋海军官兵中流传使用的非正规的称谓，但“济远”舰后主炮旋转机构非常简单，即是由一名炮手摇动炮架尾部的摇柄，驱动炮轮使得炮架整体在一个圆形导轨上实现回转，简单的构造使得这套系统操作便捷，使用可靠。实在难以想象所谓的“炮针”和“螺钉”与这套旋转机构有何联系。由此可见，《冤海述闻》的这段描写貌似细致详尽，实则存在相当大的疑点。

其他的海战记述也有写到“济远”火炮受伤情况，如戴乐尔的回忆录：

¹ “军情要电清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28 页。

² 《北洋海军舰船志》，现代舰船杂志社 2006 年版，第 33—34 页。

³ “纪济远兵船两次开仗情形”，《中倭战守始末记》（卷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年印行，第 45 页。

“济远各炮为巨锤（sledge-hammer）击坏，以作临阵先逃之借口。”¹

马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

“……但是经过军官与工程师们对军舰上炮塔的仔细检查，发现一切运行良好，除了6英寸的尾炮——一发击中其军舰的炮弹在炮耳下方穿过，将这门炮掀离了其炮座。但这发炮弹是从船尾打来的，显然是在逃跑开始以后受到的攻击——而且应该是敌人对这艘军舰的轻蔑‘送行’吧。”²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

“济远开战之后匆匆转遁，受伤特别少，小銃火药库内小火灾。另外，据说舰内重炮全部无法使用，是否是战斗造成十分可疑。”³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转述丁汝昌及龚照琦寄盛宣怀书：

“（经修理后）靖远和济远的大炮尾闩、炮套破损，但不妨碍射击。”⁴

分析以上资料，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济远”的大炮是否遭到了人为破坏？有学者以“济远”舰上不可能备有“巨锤”为由否定戴乐尔报告的真实性，但在日军俘获“济远”舰后列出的物资清单上，赫然写有“锤子”的名目。当时的军舰上，为方便军舰日常修理，备有一些工具并非奇怪之事，“济远”是否就是用这些工具自行毁坏炮械，造成无法战斗的假象，虽有戴乐尔的证实和《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上的质疑，但事关重大，还不能轻易下结论。但如果该情况属实，则方伯谦之罪行的性质将更为恶劣。

即便我们再退一步，即“济远”前后主炮均不能使用的情况属实，那么“济远”是否就有先行离开队列，独自返回旅顺的权力呢？我们注意到，在大东沟海战中，丧失战斗力或基本丧失战斗力，但仍坚持战斗不退的军舰不在少数。“致远”伤重倾斜，本来已经不堪战斗，却仍拼死冲撞日舰；“来远”火灾将军舰后部全部吞噬，两门边炮均不能使用，舰上官兵仍以主炮御敌⁵；就连“定远”、“镇远”最后也已经用完了炮弹，将最后的炮弹推入膛，等待最终时刻的来临。⁶日本方面，“松岛”被“镇远”命中后，发生大火，却一面灭火，一面以乐童补

¹ “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² 马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张黎源译，北洋水师网站（<http://www.beiyang.org/wenku/mjf.htm>）。

³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264页。

⁴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264页。

⁵ 马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张黎源译，北洋水师网站（<http://www.beiyang.org/wenku/mjf.htm>）。

⁶ 马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张黎源译，北洋水师网站（<http://www.beiyang.org/wenku/mjf.htm>）。

充炮手，操纵剩余的几门速射炮，坚持到战斗结束¹；“比睿”一度燃起大火，一半人员投入到灭火战斗中，但火灾一扑灭便又回头寻找大队。²以上种种事迹，不一而足，却为什么仅有方伯谦、“济远”舰敢于以“炮均不能放”为理由一路逃奔回基地呢！倘若“济远”也能像“靖远”、“来远”等舰一样暂时退至安全地带修理船械，以图再战，那后世留给方伯谦的，也许就绝不是“临阵逃脱、贪生怕死”这样的评价了。历史是一面镜子，方伯谦既然敢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有如此的作为，就当敢于承担如此的骂名。方伯谦之罪，咎由自取而已；后人的翻案，亦不过是徒劳罢了。

（作者，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员）

¹ “松岛的战斗报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8页。

² “比睿船员的战斗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8页。

追查方伯谦的血衣

孙建军

一、方伯谦的血衣很重要，有继续追寻的必要性

关于方伯谦血衣的重要性，拙作《将方伯谦的血衣呈上公堂》一文中曾有论举：

方俪祥女士的伯婆、方伯谦的“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控诉”；

还是这位伯婆对侄孙女方俪祥女士说：“那是你伯公的军衣，他是被刘步蟾害死的，你们要牢牢记着”。

方俪祥女士的父亲、方伯谦的侄子方莹将军对女儿说：“这是你伯公的军衣，被刘步蟾杀害时穿的，血滴军衣，挂在这里作纪念。”

当时“海军海军联欢社管理员”黄道源、办事员杨树滋对郑练简等毕业生们说：“‘这套血军衣是济远方管带在指挥台指挥督战中被站立在他身旁的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沾的’。这件血衣的陈列足可证明当时方伯谦管带并没有临阵畏缩，是英勇善战的”。

“民国老海军界人士”郑练简先生说：“历史昭昭，当年在民国，方伯谦是以英勇善战被冤杀来陈列展览他的沾血军衣的，这都可证实当时方伯谦管带是善战到底的，而不是‘逃军’。清廷判定方伯谦‘逃军’，那是无稽之谈。”

当今史学界也有人说：“方伯谦一案已过去近百年了，但是从方伯谦被杀时起，对方伯谦该不该杀，对方伯谦其人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海军界反映尤其强烈，他们一直认为方伯谦是被冤杀的。民国期间，海军界同仁，悬挂方伯谦的血衣于上海海军联欢社以示其冤。群情之激烈，于兹可见。”

上列是《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一书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笔者曾为此感叹：“这么多人，从方家后裔，到海军界的同仁，再到今天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都认为这件物证重要。对这样一件非同小可的物证，我们能不重视么？能不搞清楚么？”¹

新近出版的一本关于方氏家族事迹的普及性读本《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以下简称“海军世家”），即与本人颇有同感。该书中计有26处（页），提到了方伯谦的血衣，并指出了方伯谦血衣的价值和重

¹ 孙建军：《丁汝昌研究探微》，华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44页。

大意义：

“这样一件血衣的实物，证实了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是英勇奋战的，也解释了当时方伯谦在望台上指挥作战与沈寿昌并立，沈脑浆鲜血沾其衣是事实。”¹

“这件溅血征衣无声地证明了济远舰官兵是在方伯谦的坚定指挥下与强敌进行殊死作战的。……卑鄙的流言毕竟改变不了血写的事实。”²

可见，如此重要的一件物证，是万万轻忽不得的！对于方伯谦的血衣，我们不仅有必要继续追查下去，而且大有必要。

二、方俪祥女士的伯婆、方伯谦的葛夫人告诉她：福州方伯谦故居里，有一件方伯谦的溅血军衣

早在《日本研究》1988年第二期上，方俪祥女士发表的题为《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一文讲到，她的伯婆、方伯谦的葛夫人告诉她：福州有一件方伯谦的溅血军衣。按照方俪祥女士《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一文的指引：

“我幼年时，我的伯婆（大祖母）自旅顺归来，她是一家之主，全家上下对她都尊敬非常。凡方家子弟，自幼长辈都要我们谨记着，伯公方伯谦任济远兵船管带，甲午海战中英勇作战，以一敌三，挂白旗诈降，炮伤日舰，朝廷曾下旨嘉奖，但后来给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陷害，他们‘公报私仇，杀人灭口’，冤杀我伯公。我大伯父到旅顺运棺回籍，并迎我伯婆回福州养老，我家二进堂上放有‘诰封盒’，内有伯公的遗物。”

“我依稀记得，每年端午节前，伯婆、伯母、叔母和母亲围坐在二进厅堂前阶的八仙桌边做香包，伯婆特意为我姊妹俩做一对同样的香包，挂在我们衣襟上，又左手牵姊姊，右手挽我，去河边看划龙船。还有一次，端午节后六月曝晒冬衣时，伯婆指着一件有血污的衣服，告诉我们说，那是你伯公的军衣，他是被刘步蟾害死的，你们要牢牢记着”。

“我们家有一本《孽海冤魂》，便是伯公同侪为他申冤写的，还有衣物，但我们缺少官方文件。”³

这件血衣，方俪祥女士只说是方伯谦的“有血污的衣服”、“伯公的军衣”，

¹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28页。

²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383页。

³ 方俪祥：《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95~397页。

没有指明这件“军衣”的来历。但这没有关系，随即就有人帮忙，告诉我们这件衣服的具体来历。这位助人者，是福建省文史馆员、文博副研究员王铁藩先生。王铁藩先生在《方伯谦故居记》一文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目睹耳闻：

“我于 1958 年来访方熹藩老先生时，（在方故居前厅）见到的 4 幅山水画……廊柱上侧挂楠木雕联一对……横梁上挂有诰封盒一只。朱漆，两旁护有龙凤雕刻，贴金，内所请诰封，是伯谦父亲或伯谦夫人？因没有人拆开过，不能断定。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所毁；当时他们还从阁楼上搜出方伯谦的沾血军服和马刀（指挥刀）。据说，伯谦蒙冤后，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控诉，被人劝阻没有成行。这件沾满血迹的军服，是伯谦英勇作战的证据，可是被人抄去后，至今下落不明。”

“妾陈淑清（系方伯谦）在外地所纳，继室葛夫人在上海完婚，后居刘公岛。此两人，至伯谦蒙冤遭难后，始由其二叔仲恒，嗣男熹藩接归福州居住。”“方熹藩（1876—1965）序名声炳。光绪间邑痒生，负笈春申（上海）学习建筑工程，曾任福建省建设厅技正主任等职……1958 年笔者在福州市文化局任文物管理工作。忽得来函，约移交孔子庙由他保管的一些文物和档案……方老先生当时已有 80 高龄，谈锋还很健……上列有一部分情况是我当时目见，一部分在谈话中得到启发，一部分是熹藩嗣子方镛告诉我的。”¹

1991 年 9 月 13~14 日在福州召开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上，王铁藩先生又对上述问题继续进行了说明：

“据了解，方妻每年夏天都将方的血衣拿出来晒霉。我曾问知道此事的一位女士这是内衣还是战衣。如果是内衣，则是杀头时脱落下的；而她回答是战衣，说明方当时血染征衣，并非怕死逃跑之人。方妻也曾想据此上京鸣冤。这件血衣文革间被红卫兵抄走，下落不明。昨天据老先生说，他们还见过这件血衣，确是战衣。但我还没落实清楚”²

这样，方俪祥女士提出，王铁藩先生亲见、亲闻、亲自调查，证实方伯谦福州故居里这件家人所藏的“沾满血迹的军服”，是“战衣”。这件“血衣”，显然也没有被转移到别处，一直保存在福州到二十世纪 60 年代“被红卫兵抄走”始“下落不明”。

¹ 王铁藩：《方伯谦故居记》，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 年 7 月版，第 523~526 页。

² 《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 年 7 月版，第 615 页。

需要说明的是，最近又有一位帮闲站出来了，新出版的《海军世家》一书，试图推翻王铁藩先生的调查结论，提出了新说：

“文博研究员王铁藩先生在方伯谦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可以证实当年被刑现场方伯谦穿的是黑色军装。”¹

此言，既无调查，又无论证，王铁藩先生明明推断是“战衣”，而他却一口咬定是“被刑现场的黑色军装”。相信，方俪祥女士对这个鲁莽的结论，只会是苦笑不得、大摇其头的了！（方俪祥女士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解，下文将给大家揭示方俪祥女士心中的血衣）

三、郑练简先生说：上世纪 30 年代，上海卢家湾吕班路海军联欢社有件方伯谦的溅血军衣。方俪祥女士对此表示同意

这件衣服，“民国海军总监郑滋樾中将长子”郑练简先生年轻时见过，他的“全班同学”都见过，他的马尾海校的校友也见过，而且很具体地指明了这是丰岛海战时方伯谦穿过的沾血军衣。郑练简先生在 1991 年的一篇文章《方伯谦血衣亲见记》里，详细记述了自己亲见方伯谦沾血军衣的经过，并提供了一大批的证人：

“民国间，海军界陈列方管带血衣，说他英勇善战，为他平冤昭雪。”“我们老海军到过上海的人，多见陈列在联欢社的方管带血衣”。

“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被倭寇炮弹击中船上炮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裂而亡。方管带与沈并肩而立，脑浆鲜血沾方衣上，方伯谦仍屹立望台指挥，连发 40 余炮击中日舰‘浪速’号。由方伯谦被沈的脑血所沾的军衣，可证明方伯谦当时未离望台。再由《黄钟瑛传》的记载看，说他‘临阵畏缩’，躲入装甲最厚处能成立吗？当时不是方伯谦在督战还有谁在督战指挥发炮 40 余发呢？”

“本人在 1936 年秋间，带领本班全体同学，由马尾海军学校去南京海军部报到²，途经上海，在上海海军联欢社（当时在卢家湾吕班路）休息两天去南京。

¹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 年 4 月版，第 109、229 页。

² 《马尾海军学校轮机班历届毕业生表》：“第四届计三名（民国二十五年冬毕业）：夏新、吴宝铿、云惟贤。”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年 5 月版，第 454 页。

又，民国海军部编《海军大事记》：1931 年 12 月，“福州海军学校改称海军学校。”1936 年 11 月，“海军学校第四届轮机班学生郑练简……等三十名，于本年六月间，违反学规照章开革。是月三日，呈报军事委员会备案。”12 月，“海军学校轮机生夏新、吴宝铿、云惟贤三名校课修业完毕，派赴江南造船所学习厂课。”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 年 5 月版，第 1095、1122 页。

“1936 年 6 月，马尾海军学校第四期轮机班学生的 30 名学生，因违犯校规被陈绍宽下令开除。欧阳格将其中非闽籍的 12 名学生全数收容，作为电雷学校第一届轮机班。”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北

休息期间，当时海军海军联欢社管理员黄道源、办事员杨树滋带我们全班同学去参观该社的甲午、甲申两战役的历史陈列室。

在甲午中日海战的陈列室中，陈列有一套方伯谦当时指挥作战中血溅的军衣。他们介绍说：‘这套血军衣是济远方管带在指挥台指挥督战中被站立在他身旁的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沾的’。这件血衣的陈列足可证明当时方伯谦管带并没有临阵畏缩，是英勇善战的。”

介绍者还详述了方伯谦管带在黄海海战中同样英勇善战，当被日本第一游击队划出阵外后，一直与强敌四舰缠斗至战斗结束。炮毁人亡船裂，无法归队，为保船、保人直航旅顺港。后因丁汝昌为推卸败责，诬陷方管带，捏造先逃、乱阵、撞扬威等罪名，竟被清廷以‘逃军’罪名正法。1937年，轮机五班同学陈允权（福建省福马海军联谊会副会长）也在校课毕业后，由福州马尾海校赴南京报到时，路过上海吕班路海军联欢社。休息时也在陈列室看到方管带当时在济远舰作战时留下的血军衣。今年年届87的江家驹（马尾区政协常委、离休海军起义人员）学长也曾亲见此血衣，亲闻解说词。海军界均如池仲佑所编，严复写弁言的《海军大事记》所说，方管带确系‘被谗以逃军，军前正法，军中冤之’。

1991年9月在福州举行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上，郑、陈又遇见马尾海校第一届航海班老学长江家驹同学，又谈论及血衣事，他也证实上海吕班路海军联欢社甲午中日海战陈列室中看到‘方伯谦当时指挥作战所穿的血沾军衣一套’。”¹

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而是整班的同学目睹，当不会有错。这样，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上海吕班路海军联欢社”的陈列室里有一件方伯谦的军衣，而且是丰岛海战时方伯谦的被“沈（寿昌）的脑血所沾的军衣”。

对于这件血衣的来历，我们可以从《冤海述闻》里寻找线索：

“忽日（《中日战争》本作“倭”）炮中‘济远’望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裂而亡，方管带与并肩立，脑血尚沾衣也。又一炮伤前炮台，二副守备柯建章中炮洞胸，学生守备黄承勋中炮断臂，六品军功王锡山、管旗头目刘鷗均中炮，同时

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928页。

“上海沦陷时，郑滋樾的长子郑练简正离开福州海军学校转往建设厅工作。”“郑练简抗战初期进入公路系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福建省交通厅公路局总工程师。”《追忆“国军”海军中将郑滋樾--饿死不当日伪汉奸》，http://bbs.tiexue.net/post_1847288_1.html 2007年9月25日访问。

¹ 郑练简：《方伯谦血衣亲见记》，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16~518页。

阵亡。望台并炮台各处弃兵阵亡者十三人，伤者四十余人。”¹

根据《冤海述闻》的说法，方伯谦确实应该有一件被“沈（寿昌）的脑血所沾的军衣”。

新出版的《海军世家》一书，还说明了这件血衣的下落

“大陆解放后，联欢社原址开辟别用，编者曾询问知情者张序三将军，张说：‘大陆解放后，联欢社增加展出内容，作为华东军区新建海军学习、参观的基地，事后展品全部装箱，估计现在还存在某座军用仓库中。’²

对于这一件血衣，方俪祥女士是认可郑练简等人说法的。2002年10月3日，在上海重庆南路182号“瑞金医院”门诊部，即“上海海军联欢社旧址”，方俪祥女士70年后旧地重游。

“方女士说：有一个房间，曾挂有她伯公方伯谦的血衣，老海军人员都参观过，那是甲午海战的见证。有位郑练简先生，他是民国海军总监郑滋樨中将的长子，现为福马海军联谊会顾问、民革海军支部主委，他曾在1936年秋间，带领马尾海校学员去南京海军部报到，途经上海，参观海军联欢社。在甲午海战陈列室中，看到方伯谦那件在“济远”舰指挥台上被其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沾的征衣。1937年，轮机五班同学陈允权（现担任（福马海军联谊会副会长）和江家骅（学长，马尾区政协常委、离休海军起义人员），均见过这件溅血征衣，足以证实方伯谦是英勇奋战的。据说解放后这些展品均被装箱北运，从此这个联欢社也被改为他用了。”

“方俪祥女士记忆忧新地追述：她在八岁时，方莹将军把家眷从福州迁来上海，居住在离此公园不远处的“玉井里”弄堂，与三位也在海军工作的伯伯住在一起，共有五六位堂兄弟姐妹，常常结伴到海军联欢社里的大花园游玩。（海军军官还表演了‘方管带打日本兵’）”

“（方莹）带她去海军联欢社，走上二楼的一个房间，玻璃柜里挂有一件带血迹的黑衣，父亲告诉她这是伯公指挥海战时的血衣，让她和弟弟看个清楚，并有四五个人陪着观看讲解……从此以后再未到海军联欢社，屈指一算70年了。”

“她似乎感慨万分，心情颇为惆怅，原海军联欢社的展品已不复存在，可能

¹ 《冤海述闻》，方氏故居藏本影印件，第4页；又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84页。

²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28页。

沉睡在北京某个仓库里，或者已经失毁了。”¹

显然，三十年代上海卢家湾吕班路海军联欢社的这件方伯谦的丰岛海战时被“沈（寿昌）的脑血所沾的军衣”，就是方俪祥女士心目中的“血衣”。（这个时间里，方俪祥女士似乎忽略了福州故居里的那件溅血军衣的存在了，似乎完全忘记了儿时福州故居里伯婆告诉她的故事了）

四、方俪祥女士的父亲方莹将军告诉她：上海海军联欢社的方伯谦血衣，不是战衣，而是杀头衣

对于郑练简等人的说法，方俪祥女士虽然在2002年10月表态支持，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不仅方俪祥女士不同意，方俪祥女士的父亲方莹将军也不同意。方莹将军认为，上海海军联欢社上个世纪30年代展出的方伯谦血衣，并非方伯谦丰岛海战的战衣，而是方伯谦黄海海战后被杀头时穿的“黑色军衣”。这还是方俪祥女士发表在《日本研究》1988年第二期的题为《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的文章里告诉我们的：

“我八岁时，父母迁居上海，父亲方莹，字琇若，调任海军任职。我11岁时姊姊因病去世。初中时，有一次父亲任职的兵舰停泊在上海港多日，他带我到上海海军联欢社（社址在前吕班路一带）去玩，社内的一房间挂件黑色军衣，父亲说，这是你伯公的军衣，被刘步蟾杀害时穿的，血滴军衣，挂在这里作纪念。父亲对我说过，家人都在南方，只伯婆一人随伯公在旅顺。以后伯婆回家，她说伯公二十三日去海军公所，一夜未归，二十四日差人打听，未得要领，二十五日天未明已被杀害，据说有旨，但未见审判。伯母认定是刘步蟾害的，你大伯父到旅顺扶棺回籍时说，是割喉身亡。伯公是朝廷命官，刘步蟾一人难以下手，这事就牵涉到了汝昌和李鸿章了。综合各方面消息，可以断定伯公是被冤杀，含恨而死的。”

“关于这件军衣，旧海军人员很多人都见过，我方家子弟也多人目睹过。”²

方俪祥女士的父亲方莹将军是怀着深深的家恨，把这件“黑色军衣”作为家史教育的教材，来教育自己的下一代的。据方伯谦的嗣孙、方俪祥女士的堂弟方镛先生说：

¹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99～301页。

² 方俪祥：《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日本研究》1988年第2期；又见，《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95～397页。

方俪祥女士为方伯谦辩冤，“她是继承她父亲方莹将军的遗志。幼年时，她父亲就带她去瞻仰伯公的血衣，她回国后又有人告诉她方莹将军退休后就声言要为方伯谦申冤，那是六十年代初，正值《甲午风云》热播时机，被曾以鼎等海军研究会的委员们劝阻。”¹

父亲方莹将军这般的嘱托，方俪祥女士当会铭刻在心、永志不忘吧？！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方莹将军的人品，更不敢怀疑方莹将军会说谎，尤其是当着年幼的女儿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时。但方俪祥女士言之凿凿，且“旧海军人员很多人都见过，我方家子弟也多人目睹过”，不由我们不相信。

但不幸的是，方俪祥女士和方莹将军的上述说法得不到史料的支持。

来远舰水手陈学海说：“黄（方）船主穿一身睡衣，听说是刚从被窝里拖出来的。行刑的人叫杨发，是丁统领的护兵”³

护军炮目李金声说：“方大头临阵脱逃，在旅顺被龚道台梟首示众，弟兄们都说他死有余辜”；

旅顺道台衙门侍童李振鹭说：“那天一大早，在衙门里听说斩方伯谦，我就跑去看。方伯谦穿着茄青纺绸小褂拉上了刑场。围者看的当兵的很多，都说该杀”。

4

《海军世家》一书认为上述史料很不可靠：“（戚其章）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两个证人，指证方伯谦临刑时的服饰，‘水手陈学海说……黄（方）船主穿一身睡衣’；‘侍童李振鹭说……方伯谦穿着茄青纺绸小褂’。一文两证，互相矛盾，只能证明此两人当时都不在现场。”⁵

我们允许任何人对史料提出质疑（谅笔者眼拙，尚看不出“一身睡衣”和“茄青纺绸小褂”有何矛盾）。拙文《将方伯谦的血衣呈上公堂》已经提到，要确认方伯谦有否一件杀头衣存在，还得求助于“广甲”舰管轮卢毓英，因为卢毓英是方伯谦的铁杆同情者。卢毓英在回忆中说：

“八月念五早五点钟，忽闻炮声，余自梦中惊醒，人报总兵衔副将方伯谦正

¹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452页。

² 在另一个场合，方俪祥女士又铿锵有力地强调了家教难忘：“我，方俪祥，美籍华人，是清末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侄孙女，今年87岁。自幼，长辈们指着二进大厅的主横梁上的‘诰封盒’要我们晚辈谨记着伯公方伯谦是被冤杀的。”（见《海军世家》第411页）可见，方俪祥女士对儿时的细节应是“记忆犹新”的。

³ 戚其章：《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15页。

⁴ 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49页

⁵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08~109页。

法军前。余急问之曰：广甲管带如何矣？彼曰：未之闻也。余不禁骇然，曰：何同罪而异罚也？乃急起往统领处觅其幕宾曾叙吾询之，方悉其由，归与同乡诸君述之，不禁为之叹惋不置。”

“丁乃遣人往宋祝三宫保处，假刽子手两名，宋询为谁人？曰：方也。宋口然谓来人曰：尔且归，余当亲带刽子手即至。人回述宋宫保言，丁知宋素爱方，乃急遣亲兵将方衣服剥净，自出倭刀将方梟于山麓。后宋至，方头已落。宋大哭而归营。方既伏法，济远士卒均奔麓伏尸而哭，号啕跌躄声闻数里，见者无不泪下。”¹

卢毓英的所谓“剥净”，不会是剥成光光肉儿，而是剥除掉外套。显而易见，卢毓英是同情方伯谦的，也是支持陈学海、李振鹭关于方伯谦临刑时衣着的描述的。有这么多“伏尸而哭”、“号啕跌躄声闻数里”的“济远士卒”在场，方伯谦的同情者们是没有理由怀疑卢毓英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方伯谦杀头时穿的是一件内衣，而绝对不会是外套。也就是说，即使有一件杀头血衣存在，绝对不会是一件“黑色军衣”。据前引材料看，方俪祥女士也不再坚持所谓父亲方莹告诉她的“杀头衣”说法，而改口说父亲方莹“告诉她这是伯公指挥海战时的血衣”。至于改口的理由为何，方俪祥女士未说过，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五，《卢湾区志》告诉我们：上个世纪 30 年代，上海卢家湾吕班路上没有海军联欢社

尽管郑练简和他的同学、校友们都宣称，上个时间 30 年代参观了上海卢家湾吕班路的海军联欢社：

尽管方俪祥女士宣称，她少年时（按照方俪祥女士提供的相关资料，她应该是约 8~12 岁，即约 1928~1932 年在上海生活）和她的“五六位堂兄弟姐妹，常常结伴到海军联欢社里的大花园游玩”，还有海军水兵在那里给他们表演过“方管带打鬼子”的游戏。

尽管方俪祥女士晚年又“如愿以偿”地“旧地重游”了海军联欢社的旧址，且“感慨万千”、“心情颇为惆怅”。

但，令我们不安的是，在《卢湾区志》“大事记”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

¹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稿本影印件）。

话：

民国3年（1914年）“4月8日，沪海道尹兼特派交涉员杨晟与法驻沪总领事甘世东，签订《上海法租界推广条约》。区境徐家汇路以北、打铁浜以南、吕班路、白尔部路（今重庆中路）以西，全部划入。9月14日双方勘界。是为法租界第三次扩张。”¹

原来，这条吕班路（重庆南路）在法租界内；而《上海租界志》又告诉我们：法租界是1943年7月由汪伪政权收回的²。也就是说，当年方莹等呼啦啦一大帮子民国海军官兵是在法租界内“联欢”！

更为不幸的是，上海《卢湾区志》第二十四编“军事”第一章“武装”第二节“军事机构”，却告诉我们一个严肃的事实：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卢家湾吕班路上根本不会有一家海军联欢社。

“海军联欢社 重庆南路182号，民国34年8月设”。³

这是怎么一会事！众目睽睽之下的上海卢家湾吕班路（今重庆南路）30年代诺大的一个海军联欢社一下子成了“子虚乌有”？海军联欢社是1945年8月才设立的，而方俪祥女士、郑练简先生等竟然30年代就可以在这里玩耍、参观？

是郑练简先生对事件记忆（是另外一个人的血衣？）发生了错误吗？显然不是。因为，不仅郑练简先生一人去过、见过，还有他的全班同学和他的马尾海校的校友都曾在这里“亲闻解说词”：“1991年9月在福州举行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上，郑（练简）、陈（允权）又遇见马尾海校第一届航海班老学长江家驹同学，又谈论及血衣事，他也证实在上海吕班路海军联欢社甲午中日海战陈列室中看到‘方伯谦当时指挥作战所穿的血沾军衣一套’。”

是郑练简先生在时间的记忆上发生了错误吗？抑或印刷上的错误吗？显然不是。因为，郑练简先生这样说：“本人在1936年秋间，带领本班全体同学，由马尾海军学校去南京海军部报到，途经上海，在上海海军联欢社（当时在卢家湾吕班路）休息两天去南京。……1937年，轮机五班同学陈允权（福建省福马海军联谊会副会长）也在校课毕业后，由福州马尾海校赴南京报到时，路过上海吕

¹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49/luwan/node36267/index.html> 2007年7月16日访问。

²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3852/node63857/node63871/node64463/userobject1ai57958.html> 2007年7月16日访问。

³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49/luwan/node37073/node37075/node62718/userobject1ai22092.html> 2007年7月16日访问。

班路海军联欢社。”¹两拨人，两个时间，显而易见，既不会是记忆的错误，也不会是刊误。

是方俪祥女士的记忆发生了错误吗？显然不是。因为，2002年10月3日，方俪祥女士“来到重庆南路182号门前停下，她指着铁门说：这就是原上海海军联欢社旧址”。²方女士70年后旧地重游，触景生情，“记忆忧新地追述”了童年时的很多故事（前已引述，不再一一）。³“在夕阳余晖下，方俪祥女士离开了原海军联欢社旧址，她似乎感慨万分，心情颇为惆怅，……但今日她毕竟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原海军联欢社旧址。”⁴

据说，方俪祥女士2002年10月3日重访故地时，曾表示无比遗憾：“她认为她一生的遗憾是没有在她父亲晚年再见一面，如果在50年代初她也在上海居住，方莹将军一定会带她到海军联欢社旧地重游”⁵。我们不知道，方俪祥女士又会“听”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据说，方俪祥女士“在夕阳余晖下”告别这个所谓的海军联欢社旧址时，“似乎感慨万分，心情颇为惆怅”。我们真的猜不透，方俪祥女士感慨的是什么？惆怅的又是什么？

六、“血衣”的故事，还在继续演义着

按道理，方伯谦衣服上的血，是沈寿昌的，不是方伯谦的，即使把这件血衣挂在某个地方展示，只证明了沈寿昌作战英勇；沈寿堃的血，并不能说明方伯谦在丰岛海战沈寿昌死后的战场表现⁶，更不能用来证实方伯谦大东沟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但方氏后裔及方伯谦的同情者们不作此想，还要死死纠缠着这件血衣不放手。就在我们看到，不论是方伯谦的“战衣”，还是方伯谦的“杀头衣”，都充斥着一派的荒诞不经的时候，有关方伯谦“血衣”的故事，还在继续演绎着，而且愈演愈具有舞台效果。

方俪祥女士童年时，她的伯婆、方伯谦的葛夫人没有告诉她这样一个故事；

¹ 郑练简：《方伯谦血衣亲见记》，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16~518页。

²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99页。

³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99~300页。

⁴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301页。

⁵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301页。

⁶ 沈寿昌牺牲后，“在零距离体验了死亡的巨大恐怖后，方伯谦的意志开始动摇。”“在“广乙”舰冲乱第一游击队阵形，吸引住日本舰队火力时，方伯谦非但没有考虑驶近配合“广乙”作战，反而利用这一机会，趁着战场上弥漫的硝烟，急速驶离战场，完全忘记了作为编队长官的责任，甚至已经忘记了作为一名军人的天职。”陈悦：《喋血丰岛》（下），《现代舰船》，2006年1B。

这个故事，是文博副研究员王铁藩先生听来的，他说：

“我于 1958 年来访方熹藩老先生时，（在方故居前厅）横梁上挂有诰封盒一只。……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所毁；当时他们还从阁楼上搜出方伯谦的沾血军服和马刀（指挥刀）。据说，伯谦蒙冤后，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控诉，被人劝阻没有成行。这件沾满血迹的军服，是伯谦英勇作战的证据，可是被人抄去后，至今下落不明。”¹

在 1991 年 9 月 13—14 日福州召开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上，王铁藩先生再次作了说明：“方妻也曾想据此上京鸣冤。这件血衣文革间被红卫兵抄走，下落不明。昨天据老先生说，他们还见过这件血衣，确是战衣。但我还没落实清楚”²

我们这里不厌其烦地重复引用王铁藩先生的调查，是要大家注意到，按照王铁藩先生的说法，有三个问题是明确的：一，这个故事是“据说”，消息源不明；二，葛夫人没有进过京喊冤，只是“欲”、“曾想”而已；三，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的此一件衣服，是一件“血衣”，“这件血衣”是葛夫人收藏在福州方伯谦故居的“沾满血迹的军服”。

王铁藩先生是诚实的，话也说得很小，很明白。他特别声明自己“还没落实清楚”。

但是，王铁藩先生没有想清楚的事情，有人想清楚了，陈贞寿先生想清楚了，季平子先生也想清楚了。

在会后编辑的《方伯谦问题研讨集》里，收录了一篇敬木的《是冤杀，还是罪有应得——“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综述》的文章。在敬木的笔下，葛夫人不仅是“欲”或“曾想”了，而是直接去了北京城一趟：“方氏被杀不久，方妻即以被冤杀为由，上北京告御状”。³

在陈贞寿于 1992 年 4 月 12 日为该书出版所作的“序”里，也变成了：“方伯谦被害后，其夫人即进京告御状”。⁴

季平子于 1992 年 4 月 3 日为该书作的“叙”里，比陈贞寿迈进一步，更为细节化：（方伯谦被杀后）“不久方妻上北京告御状，想要清政府为方平反，未能

¹ 王铁藩：《方伯谦故居记》，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 年 7 月版，第 524 页。

² 《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版 第 615 页。

³ 《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 年 7 月版，第 625 页。

⁴ 陈贞寿：《方伯谦问题研讨集·序》，知识出版社，1993 年 7 月版，第 1 页。

达到目的”。¹

敬木何许人也且不论，陈贞寿、季平子两位先生可是被翻案者们视为“旗手”式的人物。该二位教授的话，言简意赅，干脆利落，有一锤定音之效。笔头果敢地一摇，“据说”转眼间变成了事实。

退一步讲话，即如上述诸人的思路演绎出来的故事，无论其真假，有一点是明确的，葛夫人“欲持”或“持”的，肯定是福州方伯谦故居葛夫人收藏的那件方伯谦“沾满血迹的军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方伯谦血衣的故事还在延伸。

这个故事到了《甲午海将方伯谦》一书（与《海军世家》为同一作者，海潮出版社1997年8月版）里，就变了模样：

“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罹难后，他的继室葛氏夫人，受到威海刘公岛北洋水师闽籍官兵及眷属们的关怀与协助，穿了一件绣有一百个‘冤字’的长袍，千里迢迢赴京告御状，后来清廷宫中用羊毫沾金粉写了长联‘诰封’赐予葛夫人。不久，葛夫人满怀悲痛、失望的心情，将方伯谦灵柩运回原籍安葬，返回故里福州朱紫坊48号，闭门念佛，直至亡故。”²

这显然是一个不被认为是故事的故事，其“开创性”极为明显。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发展成“穿了一件绣有一百个‘冤字’的长袍，千里迢迢赴京”；想法发展为行动；“血衣”演变为“百冤衣”；并非如季平子所谓“未能达到目的”，而是效果显著，喊冤喊出了一个“诰封”。故事情节说得是极为动人的。

谎言重复多了，可能最先相信的是当事人自己。方俪祥女士儿时未听过、老年时未讲过也未必相信的故事，方伯谦的嗣孙、方俪祥的堂弟方镛却相信了。方镛对《甲午海将方伯谦》的说法心领神会，声称：

“方伯谦的妻子葛超文，在方死后曾穿百冤衣上京告御状，既是皇帝下旨处决的，却能上京告御状，还能安然返回。”³

一个谎言出笼，造谎者们就会制造更多的谎言来圆谎。在“水煮”历史、“戏说”历史触目皆是，文学家气死史学家的今天⁴，要编造这样的一个故事，是一

¹ 季平子：《方伯谦问题研讨集·叙》，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页。

² 《甲午海将方伯谦》，海潮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80页。

³ 方镛：《方伯谦传》，《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419页。

⁴ 这个故事就曾被2000年11月19日《福州晚报》一篇题为《拭去岁月尘封再识方伯谦》的文章所使用。见《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35页。

点也不会有困难的。

但是，《海军世家》的作者可以轻松地说：“就权当编个‘故事吧’，信不信自有论断。”¹治史者却不相信故事。敏锐发现、揭穿“当时北洋陆海军将领的战事报告中充满了隐瞒、捏造、歪曲事实的内容”²的季平子先生，就告诉过我们：“一切假话都不能使人永远相信。造假话它总归有漏洞。有一位历史学家讲过：晋朝时造的假话，经历了 1000 多年，我现在仍能将它考证出来。捏造的证明总会看得出来。”³

按照目前的势头，关于方伯谦血衣的这个故事尚“未完待续”，我们期待着这个故事继续“创造”下去，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打假老英雄”季平子先生在，任何的假话、谎言都是可以拆穿的！

（作者：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员）

¹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 年 4 月版，第 165、176 页。

² 季平子：《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序》。

³ 《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 年 7 月版，第 591 页。在季平子《论陷害方伯谦的三项罪名全都出于捏造》一文中，这位“历史学家”的话是：“晋朝人做假，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还能把它揭发出来，可见做假要不被揭露，是绝对不可能的。”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读后 ——论黄海大东沟海战方伯谦三项罪名均非捏造

陈悦

上世纪90年代后，围绕甲午战争中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问题，以方伯谦的部分旁系后代及某些社会人士和学者为主，发起了所谓的鸣冤翻案活动，旨在证明方伯谦在甲午战争中所犯罪行均不成立。在预设了结论以后，翻案者们主要针对清政府追究方伯谦罪责的罪名进行质疑，认为“首先逃走”、“致船伍牵乱”¹等定罪事实均不成立，同时认为并非定罪事实的“济远”撞击“扬威”事件也属于子虚乌有，由此称“陷害方伯谦的三项罪名全都出于捏造。”²

翻案者的上述推论，通过非学术的方式，传播极广，然而并未能获得学术界的认可。2007年4月，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由王琰策划，王宜林（王彦）编著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一书，使得方伯谦案翻案活动再掀波澜。

然而综观翻案者用以否定黄海海战方伯谦罪定罪事实的理由均颇为勉强，本文将对这些翻案者广泛使用的理由、观点逐一辨析，以廓清历史事实。

一、“济远”撞击“扬威”事件

1894年9月17日，中日两国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外海面发生激战，北洋海军的“济远”号巡洋舰在“致远”舰不幸战沉后，首先逃离战场，途中又撞击了正在与火灾搏斗的“扬威”舰，酿成悲剧。此一史事的史料依据、辨析，在孙建军先生的“‘济远’撞坏‘扬威’考证”³一文中论说颇详，本文不再述及。

对证明撞击事件存在的史料，翻案者无法予以正面否认，于是改由其他枝节方面进行质疑，以此来否定某些原始史料的价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孙克复先生所提出的观点，认为该事件在相撞地点、撞伤何处等方面存在矛盾。

除孙克复外，林濂藩等也都对“济远”撞“扬威”一事的真实性表现出怀疑、

¹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² 季平子：“论陷害方伯谦的三项罪名全都出于捏造”。登载于《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³ 孙建军：“‘济远’撞坏‘扬威’考证”。《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7年第2期，第21—26页。

否定的态度，其观点则与孙克复略同。以下，笔者将针对翻案者否认“济远”撞击“扬威”的各点理由，予以一一分析。

（一）撞击事件在时间上是否存在矛盾？

这一问题的代表观点由孙克复先生提出：“……《二十七八年海战史》还明确记载，扬威起火后，为扑灭火灾，离开阵列，于一时二三十分左右，向大鹿岛方向撤离。而济远却是在3时30分致远沉没后退离战场的，距扬威离开战场时间已达两小时之久，两舰又何能在战场深水处相撞？”¹

认为“扬威”舰在1894年9月17日下午“一时二三十分左右”已经开始撤离战场，而“济远”是在15:30以后才逃离战场。二者前后相距将近2个小时，怎么能够相遇？

这一观点中尤以“扬威”于“一时二三十分左右”以后就离开战场的结论最为关键，为翻案者所广泛采纳使用，根据孙克复文中的注释，认定“扬威”于13:30退出战场的依据是甲午战后日本官方编订的重要军史《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相关内容来自该书的第234页²。然而在《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的第234页中，我们得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信息。

该页的内容属于明治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报告的一部分，涉及“扬威”的文字仅有一段：

“此間揚威ノ火焰ヲ揚ケテ我前面ヲ過キ。大鹿島方向ニ逃走スルヲ見……時ニ午後二時半過ナリ。”³粗译为，“此时看见着火的‘扬威’从我们前方经过，向大鹿岛方向逃走……时间为下午2点半过后”。

《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第234页上的文字并不多，整页上没有只字片语提到“一时二三十分左右”。“一时二三十分左右”8个字实际来自于《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的第233页，其内容为“……左方ニ大圈ヲ畫シツ、十六點方向ヲ變換シ。本隊ヲ敵ト自己トノ間ニ見テ反對ノ方向ニ通過セントス。時ニ午後一時二三十分ノ頃ナリキ”，说的是日本第一游击队向左侧进行16点转向的时间是“一时二三十分”，与“扬威”撤离战场之事毫无任何关系。

为什么孙克复先生竟然嫁接史料，把史料上记载的在“下午2点半过后”看

¹ 《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² 《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注12。

³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234页。

到“扬威”撤离战场的时间删除，套用日本第一游击队第一次转向的时间“一时二三十分钟左右”呢？“下午2点半过后”就这样被孙克复先生改成了“一时二三十分钟左右”，莫非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任意改动史料吗？

除上述外，日方乃至中国史料中还有大量可以证明“一时二三十分钟左右”以后“扬威”还在战场上的记载：

1、“西京丸ハ二時十五分比叡、赤城危険ノ信號ヲ掲ケタル後。敵艦定遠、鎮遠其他二隻ノ爲ニ追躡セラレ。三十拇半ノ巨彈四個、二十一拇彈一個、十五拇彈二個、十二拇彈四個前後シテ二百米突内外ノ近距離ヨリ跳飛シ來リ。”¹

粗译为：“下午2时15分‘西京丸’挂出‘比睿’、‘赤城’危险的信号旗后，敌舰‘定远’、‘镇远’及另外2艘逼近。4颗305毫米炮弹、1颗210毫米炮弹、2颗150毫米炮弹、4颗120毫米炮弹落在距离‘西京丸’200米左右的距离内。”

鉴于当时首轮参战的北洋海军10艘军舰中，仅有“超勇”、“扬威”装备有120毫米口径的火炮²，而“超勇”已经在13:30分左右沉没³，14:15以后攻击“西京丸”的120毫米口径炮弹，只能由一艘军舰射出，那就是正在起火燃烧的“扬威”舰。作为黄海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参战舰只中舰龄老、舰况差的“扬威”舰，在全舰火灾已经1个多小时的情况下竟然还在与强敌作战，而且根据《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的记载，射出的4颗120毫米炮弹中有2颗击穿了“西京丸”的右舷，可见舰上官兵作战的顽强程度。百年后，孙克复先生等竟将“扬威”舰的这幕壮举完全忽略，其用意若何令人费解。

2、“……橋立ハ二時十五分。扶桑ハ同三十一分共ニ炮撃ヲ開始セシカ……本隊ハ第一游撃隊ト相應ツテ。右六隻。左ニ四隻ノ敵艦ヲ夾撃。猛烈ナル炮火ヲ集注ツタルヲ以テ。敵遂ニ支フルコト能ハスツテ潰亂ツ。平遠、來遠、揚威ハ火災ヲ起ツ。廣丙ハ陸地ノ方向ニ逃走。揚威ハ大孤山沖ヲ望ミ全速力ヲ逃レツ口。”⁴

粗译为：“‘桥立’于下午2时15分、‘扶桑’于下午2时31分也加入炮击……（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相互配合，以右侧6艘（指本队）、左侧4艘（指

¹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191页。

² “超勇”、“扬威”的武器装备见：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现代舰船杂志社，2006年版，第47—50页。

³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188页。

⁴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199—200页。

第一游击队)的态势包围夹击北洋舰队。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敌舰渐渐不能支持,开始溃乱。‘平远’、‘来远’、‘扬威’燃起大火。‘广丙’向近岸方向逃走,‘扬威’朝向大孤山方向全速逃走。”

日方的这段记述说的是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日本第一游击队、本队腹背夹击北洋舰队时的状况,这一时段发生在14时30分以后,也即说明,直到此时“扬威”尚在战场上。

3. 其他还有:“二时二十三分钟扬威不断起火。”¹“二时三十三分,敌扬威舰起火。”²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海战报告所附的“本队戰鬥航迹圖”中的“第五圖”,即表现联合舰队腹背夹攻北洋海军时的态势图中,可以看到“扬威”还在海战场上。³日本常备舰队司令官、黄海大东沟海战时指挥第一游击队的坪井航三,在其海战报告附图“第一游擊隊航迹圖”的“其八”图,也即夹击北洋海军时段的图上也可以看见标有“扬威”。甚至在为方翻案者视如至宝的《冤海述闻》中,其表现北洋海军遭到日本联合舰队夹击的“第七图”上,“扬威”也赫然在列。⁴

至此可见,质疑“济远”撞击“扬威”真实性的“时间矛盾”问题中一个重要前提,即“扬威”离开战场的时间出现了严重错误。“扬威”开始从海战场离开的时间最早也应该在下午2时30分以后,而且从海战场开始离开并不能等同于已经离开。“扬威”舰因为舰龄老迈,航速本就迟缓,又遭到了炮击和火灾的双重摧残,机动力有限,加之她的阵位在北洋海军阵形的右翼,即远离浅水的方向,其于下午2时30分以后退出战场时,正是北洋舰队被日本联合舰队合围时,此时从战场驶往近海、浅水,断然是无法选择一条笔直的航路的,“扬威”舰还需要绕过日本舰队的包围圈,规避敌方的炮火攻击,脱离后才能往战场远端航行。如此一段艰难的历程,以一个多小时时间来完成并不为过,所谓的“时间矛盾”根本是子虚乌有的臆测。

(二)“济远”、“扬威”二舰航路是否会交叉

¹ “松岛的战斗报告”,川崎三郎:《日清战史》。译本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7),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8页。

² “松岛舰之勇战”,《日清战争实记》。译本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8),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6页。

³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六章黄海战纪附图。

⁴ 佚名:《冤海述闻》。方伯谦故居藏本,附图第八。

孙克复为代表的一些翻案者，对于“济远”撞击“扬威”事件的第二点质疑是2舰的航路。孙克复先生认为2舰航路不可能交叉：“……但据《二十七八年海战史》记载，扬威搁浅地点为东经120度40分9秒、北纬39度39分处。此位置在战场西北的大鹿岛附近。济远的逃避方向则是战场西南的旅顺口。济远逃避时根本没有必要先驶向战场西北之大鹿岛附近，再折向西南。两舰方向相反，距离遥远，安能相撞？”¹

此处翻案者是一派想当然的口气，然而实际情况是，黄海大东沟海战中，由于日方对大东沟一线海域水文情况不了解²，不敢贸然进入浅水，因而近岸的浅水区便成为了中国军舰天然的“避风港”。海战中，包括“靖远”、“来远”、“经远”、“平远”、“广丙”等在内的多艘中国军舰，在遭遇不利形势时，都曾一度试图退入浅水区暂避。在此情况下，方伯谦指挥“济远”舰想要安全逃往旅顺，首要便是摆脱日本军舰的追击，进入浅水区则是其不二选择。试想，如果“济远”舰堂而皇之在日本军舰纵横往来的深水区域按照直线开航旅顺，将会遭遇怎样的后果。

关于“济远”舰究竟是从深水直接开航旅顺，还是由浅水绕道而行，实际毋庸今人多加议论，黄海大东沟海战时的日本军舰早已有过目击证据。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有这样一段关于“济远”逃跑情形的记载：“是ヨリ先キ第一游撃隊ハ水ノ浅深ニ注意シテ速力ヲ増減シ。大連灣ノ方へ逸駛セル敵艦數隻ヲ追撃セシ。當時濟遠、廣丙ハ遠ク西北西ニ逃レ。”³

粗译为：“此前，第一游击队下达注意水深，随时调整航速的命令，追击向大连湾方向逃跑的几艘敌舰。当时，“济远”、“广丙”在远处向西北西方向逃跑。”

这段史料中真实体现了日本舰队对于大东沟一带近海水文不明的情况，继而说“济远”舰首先是在朝西北西方向逃。西北西即近岸的浅水区，也就是“扬威”在驶入的海域，“济远”既然也是朝向这个海域航行的，2舰的航路又怎么不会有相遇的可能呢？

方伯谦没有荒唐到指挥着军舰直接从深水区走直线逃亡旅顺，足见他的海军基本技术知识还是具备的。“济远脱离战场驶向旅顺时其航行应系西南转西”

¹ 《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4页。

² 日本军舰“赤城”大东沟海战所用海图，摄影件。

³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216页。

¹这样的话是稍有近代海军史常识的人都无法说出的，可某些号称为海军权威的人士却能随意发出这样的言论。

（三）“济远”真的进不去“扬威”搁浅的海域吗？

孙克复先生的第三点质疑更具有技术含量，称 2 舰吨位轻重不一，“济远”不可能驶入“扬威”搁浅的区域，“济远的排水量几乎是扬威的一倍，吃水也较扬威深得多，不待撞及扬威，本身就已搁浅。焉有吨位小，吃水浅的船搁浅，而吨位大，吃水深船，不仅没有搁浅，反而在撞坏吨位小的船之后，捩舵离浅飞驶之理！”²

依据还是想当然的推论，“济远的排水量几乎是扬威的一倍，吃水也较扬威深得多，不待撞及扬威，本身就已搁浅。焉有吨位小，吃水浅的船搁浅，而吨位大，吃水深船，不仅没有搁浅，反而在撞坏吨位小的船之后，捩舵离浅飞驶之理！”

与此观点相同的还有郑天杰、赵梅卿“……比‘扬威’约大一倍的‘济远’，又如何能于‘扬威’搁浅而不能动之处撞及之，其后又能不搁浅而飞遁？显与事实不符。”³

根据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战后的报告，“扬威”舰是先遭到了撞击，而后才驶往浅水区搁浅，“扬威舱内亦被弹炸，又为济远当腰触裂，驶至浅水而沉。”⁴如此则“扬威”沉没处的水深深浅、“济远”能否驶入，实际并不能作为质疑“济远”撞击“扬威”的证据。但为了分析孙克复先生的判断，本处权且以撞击事件就发生在“扬威”沉没处来分析。

首先在舰船常识上便存在认识误区，英国阿姆斯特朗米切尔船厂建造的撞击巡洋舰“扬威”，吃水 4.57 米，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建造的穹甲巡洋舰“济远”吃水 5.18 米，相差仅半米余，何来的“吃水也较扬威深得多”之说？另外所谓排水量大的船，吃水就一定会大于排水量小的船也是想当然的说法，同为德国伏尔铿船厂的产物，“经远”舰正常排水量 2900 吨，大于正常排水量 2300 吨的“济

¹ 林瀚藩：“论方伯谦被杀冤案问题——甲午海战系列之一”，载于《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48—349 页。

² 《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4 页。

³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90 页。

⁴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 134 页。

远”，但是“经远”的吃水是 5.11 米，不及“济远”之数。¹

其次对于搁浅一词的理解也存在误区。搁浅是指船舶触到水底，而尚未被完全淹没的情况。举例而言，一艘总高 20 米、吃水 5 米的船在 10 米深的海域遇难，舰体大部分还露出在水面外，呈现出搁浅的情况。那难道这片 10 米深的水域，吃水超过 5 米的船只就都无法航行了？

再次是对海域的指认存在严重问题。孙克复先生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中指出，“‘扬威’搁浅地点为东经 120 度 40 分 9 秒、北纬 39 度 39 分处。”²依据此一经纬度，在地图上加以查对，相应的位置居然是秦皇岛以外的辽东湾海域³，正在黄海大东沟海域鏖战的“扬威”舰如何从黄海瞬间越过辽东半岛进入了辽东湾搁浅？

出于慎重起见，在又查阅了孙克复先生早年编写的《甲午中日海战史》后，发现书中有另外一则经纬度记载，即东经 123 度 40 分 9 秒、北纬 39 度 39 分 3 秒⁴，与地图对照，恰好在大鹿岛外的近海，由此可以大胆推测，上一组经纬度数据可能是笔误所致，一字之差，相差两个海域。

按照这一组经纬度在海图上查找，很快便能发现“扬威”搁浅海域的水深，现代军用海图上，东经 123 度 40 分 9 秒、北纬 39 度 39 分 3 秒位置的水深约为 9.2 米⁵，考虑到现代海图上所测的是低潮时的水深，加之该位置并非处于航道，百年来泥沙淤积，1894 年的水深肯定不会小于此数。根据“扬威”舰历史图纸进行测算，该舰由舰底到桅杆的高度达 29 米，到烟囱的高度超过 18 米⁶，“扬威”舰在此海域即使完全沉底，海水也无法将船体淹没，因而就会出现搁浅的现象。

“扬威”搁浅在水深 9.2 米的海域，吃水 5.18 米的“济远”能不能驶入水深 9.2 米的水域？答案已经明了。而且此答案还是建立在“扬威”就沉没在相撞点的假设上的，如果按照丁汝昌提督的“驶至浅水而沉”的报告，撞击发生地点应该在东经 123 度 40 分 9 秒、北纬 39 度 39 分 3 秒以南，水深大于 9.2 米的海域，那样就更不存在什么“济远”无法驶入的问题了。

¹ 各舰的技术数据见：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现代舰船杂志社，2006 年版，第 155 页。另见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 CONWAY MARITIME PRESS 1979,p396-397.

² 《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3 页。

³ 《中国地图册》，地图出版社，1966 年版。

⁴ 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 130 页。

⁵ “鸭绿江口至海洋岛”海图，中国人民解放军航海保证部，2001 年版。

⁶ 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现代舰船杂志社，2006 年版，第 145 页。

（四）“扬威”的伤情是否存在疑点

质疑“济远”撞击“扬威”的最后一个理由，是认为“扬威”的伤情存在疑点。根据孙克复先生论证，认为关于“扬威”受伤情况的两种记载，均存在问题，是否如此呢？

第一点质疑是针对丁汝昌报告等史料所称的“当腰触裂”，孙克复先生认为“如果扬威在战场深水处被‘拦腰碰坏’或‘裂一大穴’，受伤如此严重之弱舰，必然立即下沉，如何能驶至与战场有相当距离之大鹿岛附近浅滩？”¹

此一条是翻案者极喜运用的证据，漏洞也非常明显。丁汝昌等人的报告中，通篇没有关于“扬威”是在战场上被撞坏的记载。在上面的分析中也可以看见，直到“扬威”与 14:30 分从战场驶离，并未发生什么碰撞事件。因而撞击时间只可能发生在“扬威”、“济远”均在往浅水区航行的时段。

从“扬威”沉没点的水深看，完全称不上“浅滩”，因为大火退出战场前往浅水区躲避的“扬威”，在 9.2 米的水深区域就不幸沉没，不正传达着某种半道失事的信息。

从伤情来看，即使“扬威”的舰体被触裂开口，只要舰内还有足够浮力，完全可以继续航行一段时间。同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致远”舰舷侧中弹进水，舰体严重倾斜，也并没有阻碍其冲击“吉野”的脚步。同样，“济远”舰船头裂漏水的伤情，也没有影响其逃回旅顺的步伐。

另一点是针对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撞扬威舵叶”伤情的质疑。丁汝昌的公文报告与姚锡光的私家撰述，何者属于一手史料，何者的史料价值最强，已毋庸赘言。尽管姚锡光的撰述并不是指认“济远”撞击“扬威”事件的原始材料，其关于“扬威”受伤部位的描述也与丁汝昌报告有所出入，但至少说明“济远”曾经撞击“扬威”这个主干情节当时已为时人所了解。

即使是这样一份并非一手证据的“撞扬威舵叶”说，孙克复对其的质疑也存在问题。孙克复认为“如果是撞伤舵叶，船就失去方向，无法前进，也不可能由战场驶至大鹿岛附近。而且从舰船构造看，船舵位于船体尾部下面，如果不把船体尾部撞毁，不可能撞坏舵叶”²。

不过孙克复不了解的是，舰船被撞坏了舵叶，并不能影响其动力系统，何来

¹ 《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4 页。

² 《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4 页。

的“无法前进”？另外即使舵叶被撞坏，军舰上也可以采用安装临时构件充当应急舵的方法来恢复航行。¹

所谓“船舵位于船体尾部下面，如果不把船体尾部撞毁，不可能撞坏舵叶”更属外行言论。舰船的舵叶诚然位于水下，但“济远”舰首最前段的撞角也是突出在舰体之外位于水下，两件水下物发生碰撞，并不一定会撞坏舰尾。而且，“扬威”舰尾没有撞坏只是孙克复的自我设想，在没有证据说明“扬威”的舰尾被撞坏与否的情况下，就大谈“如果不把船体尾部撞毁，不可能撞坏舵叶”，并不是严谨的治学方法。

由上可以看到，对丁汝昌报告、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扬威”伤情的质疑，大都是外行言论，无法自圆其说。

（五）所谓“哈富门回忆”的可靠性

在上述的4点质疑外，孙克富还另有一件借以否认“济远”撞“扬威”事件的史料，即“济远”舰管轮洋员哈富门的回忆。

其文来自苏小东、于世敬翻译的约翰·罗林森著《中国发展海军的奋斗 1839—1895》一书，内容为“……我们（指‘济远’舰）在舰队残余各舰到达前5或6个小时回到旅顺港，他们是在大约8点钟驶进旅顺港的。在进港的途中，我们与另一艘船相撞，结果那艘船沉了。”²书中的引注显示，这段话的出处是“井上寿吉（翻译错误，应为井上十吉）：前引书（《日华战争》上海，无出版日期），第一部分，第16页”。

对如此一段已经汉译的外文资料，孙克复先生发现了“旅顺口乃是军港，商船、渔船不大可能在午夜行驶于港口附近。如认为被撞沉的是北洋舰队的其他，史料上又未见此项记载”这一重要疑点，但却不去查对这份资料的原文，反而大胆猜测，甚至出现了“‘济远’的确在进港时撞沉另一艘不知名船只，丁汝昌望空捕影，有意说成是‘扬威’，以加重‘济远’先逃之罪。”的轻率推论！此种做法已然背离了历史研究者所应具备的基本学术准则。

这则让孙克复先生产生大胆推论的哈富门回忆，究竟是怎么回事？实际当看

¹ 应急舵的外形及安装方法见：森恒英：《军舰杂记帐》，田宫株式会社。

² 苏小东、于世敬译，约翰·罗林森著：《中国发展海军的奋斗 1839—1895》，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93年版，第198页。

到其原文时，便会真相大白。

“... We arrived in Port Arthur five or six hours before the remainder of the fleet, which another vessel, which sank.”¹

粗译为：“……我们比舰队早了 5、6 个小时到达亚瑟港（旅顺）。有一艘船沉了。”从英文原文中根本看不到什么在入港时撞船的细节，如此，孙克复所作的“丁汝昌望空捕影”推论已被釜底抽薪，没有任何意义。

孙克复先生上述的几点质疑，被方伯谦翻案者奉为圭臬，在季平子撰的定论文章“论陷害方伯谦的三项罪名全都出于捏造”中，大言不惭，认定“‘济远’撞坏‘扬威’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其根据便是孙克复的几点质疑。然而由上述分析能够发现，孙克复及为方伯谦鸣冤的论者，在“济远”撞击“扬威”事件上所做的质疑其实都是无法成立的。

二、“济远”舰首先逃走问题

翻案者认为“捏造”来“陷害”方伯谦的另外两则罪名就是“首先逃走”，与“致将船伍牵乱”。

“首先逃走”是清政府治方伯谦罪的定罪事实之一，也是各类翻案者最想予以推翻的内容，以下对翻案者的主要质疑观点按条进行辨析。

（一）“广甲”是否先逃

认为“广甲”先逃的代表性观点，见程伟国“百年冤案今评说——方伯谦被杀之我见”，其主要使用了两则史料来证明“广甲”舰在“济远”之前就逃离了战场。《中东战纪本末》中的“‘广甲’因先逃之故，驶近大连湾浅滩，遂致自行毁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致远’既覆，超、扬既火，‘广甲’尤胆落，急返棹而逃……‘济远’当敌之冲，迎击既久，炮多炸裂倾倒，于是亦逃”。

这两则史料真的能够说明“广甲”先逃吗？

首先看《中东战纪本末》的记载。单独从“‘广甲’因先逃之故，驶近大连

¹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John L. Rawlin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7,p194.

湾浅滩，遂致自行毁失。”一段，恍若真能得出“广甲”先逃的结论。但是鲜为人注意的是，论者选取的上述内容，实际是对《中东战纪本末》中该段落进行了肢解取舍，因为在此后还有一段针对该内容的注释。称此段“斐军门指‘广甲’而不及‘济远’，知方伯谦之罪尚可从末减也，乃诛方而‘广甲’管带竟而漏网，岂以客舰而宽之耶。”¹

联系上下文就能发现，斐军门（英国“中国舰队”司令斐理曼特尔）之所以在上文中只说“广甲”，只是因为其认为“广甲”管带吴敬荣没有获罪，故特意说之耳。由此根本无法说明“广甲”先于“济远”逃跑。

且根据1904年出版的斐理曼特尔回忆录自述，其当时只是在远东观战，并没有到黄海大东沟海战场现场观战²，一个根本未参加海战的当事人，其所作的言论只能作为二手甚至三手证据看待。翻案者不仅忽视了斐理曼特尔语录后的注解，而且也忽略了《中东战纪本末》中，一名亲身参与了海战的西方人所作的史料价值要比斐理曼特尔语录高得多的回忆。

其关于“济远”、“广甲”的部分称：“西友之与海战者，自旅顺口贻书云……致、经两船，与日船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茫茫如丧家之犬……（撞击‘扬威’后）方伯谦更惊骇欲绝，如飞遁入旅顺口。其管机西人等岸后，自言不幸而遇方伯谦，两次逃避，从此永不愿与之为伍……同时效仿方伯谦者，厥有‘广甲’一舰。”³

《中东战纪本末》证明“广甲”先逃了吗？

再看《卢氏甲午前后杂记》。其中有关“济远”的伤情记载，不属本文的讨论范围，将另文专门论及。就所谓“广甲”在“济远”之前逃离的记载，戚其章先生曾直接表示了怀疑，季平子则以戚其章先生漏看了《卢氏甲午前后杂记》“……‘致远’既覆，超、扬既火，‘广甲’尤胆落，急返棹而逃……‘济远’当敌之冲，迎击既久，炮多炸裂倾倒，于是亦逃”段落后的52个字为由，予以反驳。

实际真正漏看了字的是季平子先生等，在他们所指的52个字之后，还有161

¹林乐知译、蔡尔康纂：《中东战纪本末》，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一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805页。

²见：SIR E.R.FREMANTLE: THE NAVY AS I HAVE KNOWN IT 1849-1899, CASSELL AND COMPANY,LIMITED 1904.

³林乐知译、蔡尔康纂：《中东战纪本末》，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一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301页。

个字（word 计数，含标点符号）被他们无视。内容为：“方‘广甲’之逃也，有敌舰三艘尾其后，追之甚力，相离仅六、七千码。‘广甲’惧，急傍山边而逃。时‘经远’正傍山边而行，恐水浅船搁，急转开山边，适出‘广甲’之后，挡住敌船，竟为敌炮所中，卒然而沉。船桅皆没，犹见两股浓烟出自水面。哀哉！比及敌船越过‘经远’之前，而‘广甲’去已远矣！‘广甲’设无‘经远’，必然不幸，此中岂非数乎！”¹

这段出自“广甲”舰次补管轮卢毓英的回忆，虽没有直接说明“济远”、“广甲”逃跑的次序，然而却可以根据此段叙述，对应定位到黄海海战的具体战斗时段。

卢毓英的回忆是“广甲”逃跑时，“经远”也在往浅水区航行，因为躲避浅水，刚好到了“广甲”之后的位置，结果遭到敌舰攻击，“广甲”则借此逃过一劫。这段战事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中刚好能够找到对应记载。

“當時濟遠、廣丙ハ遠ク西北西ニ逃レ。靖遠、經遠之ニ次キ。來遠ハ後部ノ火勢熾ニシテ艦體右方ニ傾斜セリ。又平遠廣甲ハ四時十六分水雷艇ト共ニ北方ニ走ルノ際。偶靖遠ノ檣上一信號ヲ掲クルヤ。來遠ハ小鹿島ノ方ニ針路ヲ轉シ。靖遠モ亦同方向ヲ取レリ。是ニ於テ第一游擊隊ハ未タ損傷セサルノ觀アル經遠ヲ追ヒ。同三十分速力ヲ十四海里ニ増加ス。同四十八分吉野ハ三千三百乃至二千五百米突ノ距離ニ于テ炮擊ヲ試ミ。更ニ千八百米突ニ薄リテ痛擊ヲ加ヘシニ。幾モナク經遠ハ左舷傾斜シ。”²

粗译：“当时‘济远’、‘广丙’在远处向西北西方向逃跑，‘靖远’、‘经远’在他们后面，‘来远’这时后部火势炽烈、舰体向右侧倾斜。此外，‘平远’、‘广甲’于4时16分与水雷艇一起向北方撤退。‘靖远’的桅杆上挂出一个旗号后，‘来远’调整航向向小鹿岛，‘靖远’也向同方向运动。于是第一游击队追击‘经远’舰，在4时30分增加航速到14节，4时48分‘吉野’在3300直至2500米距离上接连炮击试射，最后在2800米左右距离进行痛击。未久，‘经远’舰向右侧倾斜。”

显而易见，这份材料中所述的于“广甲”次补管轮卢毓英回忆的事实相符，都是描述各舰逃离，“经远”落单被日舰围击的情况。但是日方史料的记述更为

¹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影印本。

²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216—217页。

具体，透露了多个重要信息：1、“济远”、“广丙”最早向西北西方向逃跑，不仅在“广甲”之前，甚至在“靖远”、“经远”之前。2、“广甲”退离战场的时间是下午4时16分。3、日方于4时30—4时48分对“经远”的炮击、直至击沉，为“广甲”舰所目击。

由此从日方资料可以清楚了解到，“济远”的逃跑要早于“广甲”。根据日方下午5时29分击沉“经远”的记载来看，直到此时“广甲”所处的位置还应能远远看到“经远”被击沉的情况，已经足够能说明其离开的时间晚于“济远”了。

按照翻案者公认的计算，“济远”退离战场的时间是1894年9月17日下午的3时36分，那么3时36分逃离战场的“济远”，与4时16分逃离战场的“广甲”之间，谁为先逃？是个略有数学知识的孩童都能回答的问题。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难道又证明了“广甲”先逃吗？

（二）“扬威”是否先逃

仿佛是自售矛盾，翻案者在费力证明“广甲”比“济远”先逃时，又自称“广甲”与“济远”均非先逃，将先逃者锁定为北洋海军的“扬威”舰。其代表者为季平子：“‘首先’逃跑者是谁？‘济远’和‘广甲’，不论谁先逃跑，都不是‘首先’逃跑者……战斗从日本游击队驶至我右翼队攻击‘扬威’开始。‘扬威’中弹起火，逃而搁浅……”。¹

这一说法可谓荒谬已极，不用计算“扬威”驶避浅水区的行为和方伯谦“济远”直逃旅顺的行为何为先逃，也不用计算“扬威”、“超勇”何者先试图往战场外驶避。只要仔细看看清政府治方伯谦罪的谕旨，就真相大白。

“奉旨：李鸿章电奏查明海军接仗详细情形，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沉没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²

“济远”难道不是在“致远”沉没后首先逃跑吗？“扬威”退离战场的时间难道在“致远”沉没之后吗？如此，翻案者声称的“扬威”下午1时30分逃离战场之论又该如何来自圆其说？

为方伯谦鸣冤、翻案者大都存在这样的作风。即选择性失明、失忆。对他们可以利用的史料，不管全文文意如何，肢解引用，望文生义；对他们不利的史料，

¹ 季平子：“论方伯谦被杀问题——答戚其章同志”，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转引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²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则视而不见，甚至不惜篡改史料原文。这是何样的研究作风？

（三）“济远”是否根本没有逃跑

在以“扬威”先逃取代“广甲”先逃后，翻案者仍不满意，又抛出了所谓“济远”根本没有逃跑的观点。称“……‘济远’舰在黄海海战中被日第一游击队挖出圈外，独立作战，舰伤炮毁，伤亡严重，一直坚持至日本本队停止战斗召回先锋队的午后5时止，并未‘先逃’。”并称“其比主力舰队早近4小时抵达旅顺完全是航向、航程、航速差异造成的，并非先逃‘4小时’所致……”。¹

而根据日方史料记载，9月17日下午4时以后、5时30分之前，与日本第一游击队“独立作战，舰伤炮毁，伤亡严重”，最终不幸战沉的是北洋海军的装甲巡洋舰“经远”。

然而就在这种异想天开，编造的“西战场”说基础上，论者还在进一步自圆其说，盘算如何来解释“济远”舰为何首先回到旅顺，以说圆谎言。这又是何样的“研究”？

三、“济远”舰牵乱队伍问题

翻案者企图推翻的方伯谦罪名中，最后一项是“牵乱队伍”。对于此项罪名，各类翻案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即认为在方伯谦“济远”逃离战场前，北洋海军的阵形已经混乱，所以谈不上再次牵乱队伍。并举出了如《近世帝国海军史要》、《日清海战史》之类的日方史料，用其中描绘北洋海军阵形混乱的文字以作证据。

（一）北洋海军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的阵形

要考证“济远”舰有没有牵乱队伍，或者是考证北洋海军的阵形是否最初就陷入混乱，首要的前提便是讨论北洋海军采用的是何种阵形战术。

对此，在本人所作《黄海鏖兵——甲午战争中的大东沟海战》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说，考虑篇幅，在此仅扼要说明。²

首先，北洋海军的接仗阵形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横队，也并不是以整体的横队为单位作战，实际北洋海军是以多个2舰分队作为作战的基本单位。同时参加海战的日本联合舰队，同样也并不是整体的2个纵队，本队的6艘军舰实际是分为2个3舰战术分队。

¹ 《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² 该文分为8篇，在《现代舰船》杂志2006年B刊连载。有关分队、乱战的详细说明参见杂志内容。

其次，北洋海军计划采取的战术实际就是自利萨海战奥地利海军采用奏效的乱战战术，即“数群攻敌，或一群分应，求乱敌阵”。¹其大致作战样式是，将多个战术分队编列为横队，同时冲向敌方纵队，多点突破，造成混战近战局面，从而发挥鱼雷、撞角等近战武器的作用，以赢得战斗。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战前下达的3条指令，恰好符合了乱战战术的要点：1、In action,sister ships,or sub-divisions of pairs of ships,shall as far as possible remain together,and support one another in attack and defence.²（姊妹舰或者统一小队的2艘军舰要共同行动，作战或防守时要互相配合）此条内容再次重申2舰战术分队的规则，要求分队的2艘军舰间必须保持结伴作战，以免孤军对敌。特别需要注意，这条指令并没有要求全舰队必须始终保持横队接敌队形，言下之意这场海战北洋舰队并没有考虑使用整体的队形，而是由各个2舰战术单位进行作战，但一直以来的研究者都忽视了这一点，而一味地把北洋舰队作为一个僵硬的整体横阵来看待。

2、A ruling principle should be to keep bows on to the enemy.（舰首必须始终朝向敌舰作战）根据北洋海军军舰舰首方向炮火比较猛烈的特点，采用这样的战术有利于发挥己方的优势，同时在海战炮术射击弹道比较平直的19世纪后期，通常认为舰首对敌被弹面积小，中弹几率小，如果侧面大面积暴露对敌，中弹概率就会倍增。近年有研究者抛开时代局限不管，用现代的火炮弹道曲射技术理论，评述19世纪的海战，认为当时舰首对敌中弹概率最大，则属于先设定北洋海军百无一用，而后牵强附会求证的议论。

3、All ships must,as a general rule,follow the motions of the Admiral.（所有舰必须遵循旗舰进行运动）此条是关于战场指挥的命令，要求各战术分队必须尽可能地跟随旗舰运动方向行动，共同进退，以保证己方战斗动作统一。由这里可以看到，旗舰本身的行动就是一种指挥，只要旗舰还能自由运动，就不能视为失去指挥能力。这点与日本联合舰队制定的后续舰紧随队长舰动作运动的命令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防战时旗语信号失灵的一种预先备案。

依据乱战战术，当日本联合舰队横越北洋海军阵前时，便出现了北洋海军各舰前冲，意图冲乱日军阵形的战场情况。日本军舰借助航速快、机动力高的优势

¹ 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光绪十二年柏林使署石印版。

² 丁汝昌的三条训令最初由德籍洋员汉纳根透露，本处的文字出自当时德国海军情报局的公报。引自：W.Laird-Clowes THE NAVAL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载于 THOMAS ALLNUTT BRASSEY: THE NAVAL ANNUAL 1895, P110.

加以规避，只有本队末尾的老舰“比睿”、“扶桑”，以及在外侧航行的通报舰“赤城”落伍，遭到北洋海军多个分队的追击。

此时的战场阵形，的确为“乱”，但是可以看到北洋海军各舰均在战场上作战。因为北洋海军采取的便是乱战战术，整体的横队只是其作战的起始队形。非常可惜的是，这种战术未能完全发挥，即未能“开队分击”，乱得不够也。返观意大利萨海战的战局，奥地利海军的阵形可谓完全混乱，但那却是其战术方法。

翻案者试图以此之乱，来混同于“济远”逃跑后之乱，显然是偷换概念。

（二）“济远”舰牵乱队伍的具体表现

要证明“济远”舰逃跑造成的乱有多么严重，实际重温一下上段引用过的史料即可。

“當時濟遠、廣丙ハ遠ク西北西ニ逃レ。靖遠、經遠之ニ次キ。來遠ハ後部ノ火勢熾ニシテ艦體右方ニ傾斜セリ。又平遠廣甲ハ四時十六分水雷艇ト共ニ北方ニ走ルノ際。”¹

可以看到，“济远”逃跑后，“广丙”、“靖远”、“经远”、“来远”、“平远”、“广甲”全都离开战场。与北洋海军采用乱战战术作战时的“乱”相比，何时的阵形更乱？

最先逃离战场的“济远”，无论是在榜样作用，还是打击北洋海军士气方面，都足够称之为表率。

这样的事实，难道是捏造的吗？

（三）翻案者引用来证明北洋海军阵形混乱的史料

为了证明北洋海军的阵形一开始就已经混乱，翻案者还举出了两则日本史料，可是这两则日本史料又是被选择性失明的翻案者肢解了的。

其一：《近世帝国海军史要》：“十二时五十分，后续舰……或奋战‘扬威’号和‘超勇’号……大约三十分钟后，‘超勇’号沉没……我主队各舰沉着应战，猛击敌舰。这时，敌两翼数舰激[机]动无章，队形乱而不齐……”。²

此段史料引自《清末海军史料》第 859 页，其中用了大量的省略号，这些被省略去的话语恰恰极为关键。以“我主队各舰沉着应战，猛击敌舰”之前被省去的 43 字为例，其内容为“主队则取略同于第一游击队的航向，逐渐接近敌舰

¹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 216—217 页。

²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87 页。

队。敌中坚各舰转移目标，攻击我主队，并企图冲撞我舰。”¹

全文填补上便是：“主队则取略同于第一游击队的航向，逐渐接近敌舰队。敌中坚各舰转移目标，攻击我主队，并企图冲撞我舰。我主队各舰沉着应战，猛击敌舰。这时，敌两翼数舰激[机]动无章，队形乱而不齐……”，意思截然不同，本意原是说北洋海军阵形中央的战舰在努力攻击日方本队，只有阵形两翼的数舰机动无章，造成队形杂乱不齐的观感。那么造成队形杂乱不齐的军舰是哪些呢？答案实际在翻案者引用来证明北洋海军阵形一开始就混乱的第二份日方史料里。

其二：《日清海战史》：“……当是时，坪井少将命游击队速进，迫支那舰队之右翼。支那舰队本无次序，至此更全无纪律，各舰皆如鸟之陷簇，情状可怜，而其散漫无纪，又可叹也。”²

可叹的是，翻案者又将此段之后的41个字略去不计，这41个字恰恰对上段的内容有重要补充。“方事之殷也，中央及右翼之六舰当激战之焦点，左翼未与战，渐露却退之色，‘济远’及‘广甲’实为其先驱者。”³《近世帝国史要》里机动无章的军舰，《日清海战史》里散漫无纪的先驱是谁，已经大白天下。

作为进一步说明，《日清海战史》紧接的段落中介绍了包括“定远”、“镇远”、“致远”、“经远”、“靖远”、“来远”、“平远”、“广丙”甚至“扬威”的奋战情况，对于“济远”则是称其与“广甲”“急于逃逸，致有冲突‘扬威’之事。”⁴此外，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的记载中，追击日本军舰“赤城”的队伍里“广甲”竟然在列⁵，而同小队的“济远”不知去向，这些内容，显然是翻案者不敢面对的。

由此，翻案者用来证明北洋海军阵形造就混乱的材料，实际却成了“济远”为阵形混乱先驱的证据。

除此之外，翻案者尚引用了《卢氏甲午前后杂记》、《冤海述闻》中的记述，证明早在“定远”前桅折断后，北洋海军就失去指挥，陷入混乱。此样的说法正确否，只要看看丁汝昌训令的第三条即可，All ships must, as a general rule, follow the motions of the Admiral。“定远”不沉，尚能机动，北洋海军如何失去进退指

¹ 《近世帝国海军史要》，转见《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859页。

²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³ 《日清海战史》，转见《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874页。

⁴ 《日清海战史》，转见《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874—875页。

⁵ 《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第183页。

挥？

七、结论

综上所述，为方伯谦翻案者对“首先逃走”、“牵乱队伍”、“撞击‘扬威’”的质疑，均无法成立。方伯谦罪无从设法。

以史学的方法，要想推翻一件历史定论，没有2件以上的有力证据是无法被认可的。然而自从清政府官方的定罪后，现代一些抱有特殊目的的翻案者，为翻案而翻案，在并没有任何可靠史料作为依据的情况下，无病呻吟、东拼西凑，任意肢解、曲解乃至伪造史料，罗织所谓的证据来鸣冤，认为方伯谦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捏造”的。甚至为了证明方伯谦“冤”，而不惜故意贬低、丑化其他的历史人物。其论调虽然可能通过特殊手段可以一时蒙蔽视听，但终禁不起时间检验，必会露出其真实面目。

翻案者曾无限感慨，“……至今，清廷的正法谕旨仍在发挥作用，凡有不同意见者，有不少人（大小学术权威者）就出师征伐，就要斥之为邪说！真不知道天公何时能还人家公道？”¹他们不懂得的是，学术不能掺杂私情，反击翻案者决不是出于对某些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成见，历史学以证据发言，只要没有可靠的证据，他们的翻案行为就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清廷的判决对于方伯谦即是公正。历史不容任人涂抹，史学不是私家光耀门楣的工具，不能被私人情感左右，惟历史是历史，相信每一个有学术良心和历史责任心、社会责任心的人，都无从支持翻案者想牟取的“公道”。

（作者：北洋水师网站站长，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研究员）

¹ 1998年杨志本书信，载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由王琰策划，王宜林（王彦）编著的该书，将众多翻案者的翻案意见按门别类进行整理，并公布了大量涉及翻案的私信，为更好地了解方伯谦翻案活动，分类检索各类论调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就这点而言，王琰、王宜林二位先生所作的该书可谓有价值也。

史
料

益堂年谱

(方伯谦故居藏本)

方伯谦

咸丰三年 (1853)，癸丑，十二月十六日吉时生，时家住闽县太平街。

咸丰四年 (1854)，甲寅，二岁。

咸丰五年 (1855)，乙卯，三岁。

咸丰六年 (1856)，丙辰，四岁。十月十六日上运。

咸丰七年 (1857)，丁巳，五岁。

咸丰八年 (1858)，戊午，六岁。上学，廷训。是年迁居闽县官巷。

咸丰九年 (1859)，己未，七岁。

咸丰十年 (1860)，庚申，八岁。随父在水部琉球馆读书。

咸丰十一年 (1861)，辛酉，九岁。在水部琉球馆读书，廷训。

(原件有咸丰二字，系笔误删去) 同治元年 (1862)，壬戌，十岁。在福履营薛家读书，廷训。是年十月，祖于岩公故。

同治二年 (1863)，癸亥，十一岁。在南台下杭街怀章行后读书，廷训。

同治三年 (1864)，甲子，十二岁。在南台下杭街读书，廷训。

同治四年（1865），乙丑，十三岁。在南台靛（原件由“邓”字删改为靛）街徐振辉家读书，廷训。

同治五年（1866），丙寅，十四岁。在南台徐家读书，廷训，小试。是年五月，定亲许氏。

同治六年（1867），丁卯，十五岁。五月，蒙沈文肃公在正谊书院考取入船政。十月，入白塔寺船政英文学堂，习英国文字。十一月，学堂移中岐，名曰后学堂。年终假回家省亲。

同治七年（1868），戊辰，十六岁。正月，赴中岐船政后学堂，习英文字、算法。

同治八年（1869），己巳，十七岁。在船政后学堂学英文、算法、枪炮操法。

同治九年（1870），庚午，十八岁。在船政后学堂习英文、驾驶、算法。

同治十年（1871），辛未，十九岁。在船政后学堂习英文、驾驶、测算。五月大考，派入“建威”练船，习驾驶操演枪炮。前赴北洋牛庄、天津、大连湾、烟台、威海等处。

同治十一年（1872），壬申，二十岁。在“建威”练船，赴香港、新架坡、槟榔等处，北洋各口。

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二十一岁。在“建威”船，赴香港、新架坡、槟榔各口。

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二十二岁。四月，蒙沈文肃公给予五品军牌，汇案咨部派充“伏波”船正教习，随节赴台，改派教练行营精兵。六月，改调“长

胜”轮船大副。

光绪元年（1875），乙亥，二十三岁。三月，调入“扬武”练船。五月，船工告成案内，蒙沈大臣保以千总留闽尽先补用。六月十三日，奉旨准以尽先千总留闽补用。九月，台湾剿抚番社案内，蒙沈大臣保守备留闽浙尽先补用。十月十六日，奉旨准。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完娶。是年秋，移船赴日本各口：长崎、神户、横滨。

光绪二年（1876），丙子，二十四岁。在“扬武”船。正月，在上海修船回闽，夏赴香港、新架坡、槟榔屿、马拉甲、小吕宋等处，冬回闽。

光绪三年（1877），丁丑，二十五岁。二月，赴英国。九月，入格林回次书院。是年十月，长女仙琪生。

光绪四年（1878），戊寅，二十六岁。在英国格林回次书院。五月，学习期满考给有文凭。六月，赴法国游历。七月，上英国“犹太拉”兵船（HMS Euryalus），赴印度洋。

光绪五年（1879），己卯，二十七岁。七月，调入“士班登”兵船（HMS Spartan），前“建威”、“扬武”总教习德勒塞为该船管带，驻南印度。

光绪六年（1880），庚辰，二十八岁。二月，出洋学习限满回华。四月，抵闽。六月，充管轮学堂正教习。十一月，调后学堂老班练船教习。十二月，蒙船政黎大臣出洋限满学成回华案内保都司，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加参将衔。七年正月初八日，奉旨著照请。

光绪七年（1881），辛巳，二十九岁。二月，奉调来天津。三月初八日，蒙北洋大臣李委带“镇西”炮船。五月，移家眷来大沽住。六月，船巡烟台。闰七月初七日，父见背，回家。十一月，来沽。

光绪八年（1882），壬午，三十岁。二月十一日，调管“镇北”炮船。五月，船巡驻旅顺、威海、烟台、登州。是年，船在旅顺过冻。十二月二十日，奉札调管“威远”练船。是年，日本乱高丽。

光绪九年（1883），癸未，三十一岁。正月初一日，接管“威远”练船。四月，移家眷住烟台。船常往高丽马山浦。是年十一月，煮儿生。

光绪十年（1884），甲申，三十二岁。四月，法国失和。六月，船在旅顺，建威远炮台而守之。七月，法船战马江。十月，船赴高丽，驻守马山浦，防日本。九月底，家眷回闽。

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三十三岁。正月底，船赴大沽。二月半，入坞修改作学生练船。四月，学生三十名上船，船赴北洋各口操练。是年二月，法和议成。七月，煮儿不禄。九月十九日，调管“济远”快船。九月，历年派往朝鲜防护定乱出力人员择尤酌保案内，蒙北洋大臣保游击，仍留福建补用并戴花翎。十月初一日，奉旨著照所请奖励。十二月初二日，船抵妈祖澳，回家。继祖母童太夫人十一月二十日故。是年，买朱紫坊屋。

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三十四岁。是年春，新设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庆郡王、李中堂会办，曾袭侯、善将军帮办。四月，醇亲王、善将军、李中堂阅海军各船，并旅顺、大连湾、威海、烟台、大沽各海口。六月，定、镇、济、威远、扬、超六船同赴朝鲜巨文岛、釜山、元山、摩釜崴、海参崴各口巡洋。超、扬留摩釜崴，定、镇、济、威远赴日本巡洋。七月十六日，长崎日本巡捕与各船水手闹事。是日下午，同蓝季北登岸赴子香请酒福屋。晚八点，同马玉斋、解研珊、严耕云、张[林]少谷、蓝季北回船，适遇日捕赶打水手，不分皂白，因避入闽人店中楼上，坐至十点钟，回到理事府，十一点，同季北回船。八月，船赴仁川，防朝鲜乱。九月，回威海，即赴长崎。十一月半，船抵上海。十二月初八日，移寓朱紫坊。十二月初七日，假回家。十五日，父枢进葬。廿八日，假满回船。是年十二月十三日，纳妾李氏，时年十九岁。

光绪十三年（1887），丁亥，三十五岁。二月，船回威海。四月，移眷住烟台。船赴仁川等处巡洋。五月，回威海。五月，盖威海屋。八月廿六日，许夫人病血崩，请中外医治，至次年三月愈。十一月，船驻厦门，致、靖、经、来四快船回华抵厦。

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三十六岁。二月，船回威海，赴大沽。三月，李中堂出阅四快船并旅顺、威海炮台。四月，出洋接带四快船回华出力人员案内，蒙北洋大臣李保，免补游击，以参将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四月三十日奉朱批著照所请奖励。四月，同林凯仕赴天津会周玉山、罗稷臣，议拟设海军各船员缺。八月，同超、扬巡北洋各口。四月，威海盖福州式屋。八月，盖烟台住屋。十一月，烟台屋落成，春搬入住。是年，船在威过冻。

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三十七岁。正月十六日，同超、扬赴上海进坞。正月廿四日，奉旨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快船，盖各船改作实缺。二月廿一日，船在上海老船坞前系浮鼓，为公和船所碰（怡和公司之船），经怡和公司认陪[赔]修。三月初十日，修竣。十二日，回威海。正月十九日，次女仙瑛生，妾李氏所出。三月二十日，纳妾陈氏，时年十六岁。五月底，船往巡北洋各口，至六月廿七日，回威海。六月十二日，三女仙璋生，许夫人所出。六月廿九日，假回烟台，时许夫人产后病重。七月初六日，元配许夫人故，继长侄熿官为嗣，开吊。九月十一日，许夫人柩回籍，长女仙琪、妾李氏送回。遵例入城治丧。十一月初二日，葬许夫人柩于侯官县之黄山浦里。十一月初，船赴上海进坞。十二月廿七日，到妈祖澳，假回家省亲。

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三十八岁。正月初七日，船同超、扬赴香港。二月，船同致、经、来巡海南各口。二月底，回香港。闰二月初一日，船同定、镇、致、经、来赴西贡、新架坡、小吕宋各口。三月十二日，回香港。十八日开，廿日抵闽，六船均进马江泊。廿一日，回家。廿八日，开船赴上海，四月初一到。四月十二日，船回威海。四月半，搬妾李氏及长女仙琪来烟台住。六月，船赴大连湾打靶。六月廿三日，抵烟台。廿九日，回威海。七月廿日，船同“定远”、

“开济”、“寰泰”、“超勇”、“扬威”巡朝鲜仁川、天冠山、釜山。八月廿八日，复到仁川。九月初一日，回威。病脚症，医愈。眷移住威。九月十六日，同经、来二船奉调赴津，载续、崇二星使赴高丽。九月二十日，由津开仁川，廿二日到。廿五日，经、来到仁川。（原件上删去：“候燕甫星使坐”六字）十月初三日，同经、来载续、崇星使回津，初五日到。十月初八日，同经、来由津开烟，初九日到，初十日回威海。十月廿八日，由威海开上海，十一月初一日到，初二进坞，初六出坞。十一月初六日，租老闸钱江里四楼四底房作公馆。十三日，纳采。十一月十四日，续娶葛夫人于上海钱江里公馆。十二月初九日，船开出三义河口泊。初十开行，十一晚抵妈祖，十二日入口，泊海关前，十八日开出，香港廿日到。

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朔日，船泊九龙。早晨在“定远”船团拜。正月十七日，定、镇、济、经、来、靖启行，晚泊九龙口外。正月十八早开，夜雾。十九日，早雾。下午三点，雾开，进厦门港内泊。正月廿一日开，用新颁海军中军左营副将关防。正月廿三日，由厦门开行。廿五晚，抵吴淞口外泊。廿六早，泊张家滨。廿六下午，回申寓。（原件删除：“二月初六日送葛夫人动身来威海，亲送到船。初七日，船由张家滨”一段）二月初九日，船由吴淞开回威海，十二日到。三月十二日，葛夫人到刘公岛寓中。三月廿七日，同全军船开大连湾。四月初四日，全军船只到旅顺。四月十一日，济、康、平开烟台，接张朗三抚军，并装足煤炭。四月十六日，张抚军坐“康济”，其营务处坐“济远”，晚九点开旅。四月十七日下午六点半，李中堂坐“海晏”进澳。四月廿七日，全军到威海，李中堂阅操后，开胶州，济、超、扬威留威不往。五月初九日，病风寒，服药三日愈。五月廿一日起，内子病，似子癩。六月初十日，内子小产，后病愈。七月十三日，船到旅顺进坞。七月廿日，船回威。十月，妾李氏小产。十一月初，内子有喜。十二月初，船出巡洋直东一带，十七日回威。

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朔，船在威，团拜。正月廿四日，实授海军中军左营副将。二月，内子病，数日愈。四月初八日，船赴旅顺修理火药舱，五月廿一进坞，六月初出坞。五月廿五日，妾陈氏小产。六月初五起，内子病，似子癩。六月三十日，船回威。七月廿一日亥时，纯儿生，内子葛夫人所出。八月十八日，

船出巡洋直东洋面，并赴大连湾打靶。廿日，内子病，请筱园医至九月初四日。九月廿三日，船回威，请笄六诊内子病。十月初，内子病愈。十月廿六日，船同“镇远”、“威远”开来上海。十一月十三日，开福州。十一月廿九，到澎湖。十二月初五日，到香港。十二月廿二日，到厦门过年。

十九年（1893），正月初六日，开到福州。十二开上海，十五到。廿九开回威海，初二日到。三月廿八日，开仁川。四月十六日，开回威海，十七日到。五月十二日，开旅顺。廿一日进坞，廿九日出坞。

文中红色内容为整理者所注

整理、录入：吉辰（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员）

“广乙”兵轮战事

中国“广乙”水雷快艇鏖战沉没，屡纪报章。船主林君国祥及其管驾驶机器头目某君暨水手十二名，于日前蒙英国兵轮由牙山载回中国。方其抵仁川时，访事西友曾往晤林君国祥与其驾驶机器头目握手长谈，极相款洽。盖林君熟谙英国语言文字，头目亦略通西语，如俗所称洋泾话也。

据云，“广乙”快船、“济远”钢皮轮、“威远”木质轮共三舰，于六月下旬奉丁军门谕委，[护]装军火、粮米往牙山。林君即请于丁军门：若遇倭船首先开炮，我等当如何应敌？军门曰：两国既未言明开战，岂有冒昧从事之理；若果倭船首先开炮，尔等亦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林君既得令，即会同“济远”、“威远”鼓轮东行，迳抵牙山口岸，实名白石浦。遂将所运军火粮米一应卸发上岸。有高民助我华兵搬运，尽往牙山大营。计牙山大营距“济远”等船所泊之地，足六十里之遥。

次日，即六月二十二日，忽见一倭铁甲船，在白石浦口外游弋。既而，“济远”管带方伯谦即扯号旗，令我等速起火开船回华，半途遇见“高升”、“飞鲸”等载兵商轮，可令其速回威海卫或天津，以避倭锋，云云。但是时，“广乙”所带小火轮已进白石浦江，拖运高船入内，未能即时开船。延至二十三日四点钟，天微明时，方得起碇，与“济远”同时出口西回。其“威远”兵轮因货早已卸尽，已于是日二点钟乘夜驶回矣。“广乙”、“济远”二舰甫出白石浦口，突有倭大铁甲船三艘由仁川埠来，见其一艘高扯提督旗号，大约名“松岛”舰，即倭提督伊藤[东]之坐船也。初见时，林君意倭船必欲请战，不料倭船又转轮而东，林君又疑其不欲战。是时，“广乙”因汽炉之水尚未足，故船每点钟只行十一英里而已。迨近日船约有七里之遥，又见倭船返轮，如欲拦阻“济远”、“广乙”去路。林君知其来意不善，遂严阵以待。其时，“济远”在前，竟过倭船之侧，倭船并未扯旗请战，及“广乙”行至日船对面，该船忽开一炮，以击“广乙”。“济远”在前，见之并不回轮助战，即加煤烧足汽炉，逃遁回华。嘻，是将以“广乙”船输日也。试思“广乙”一小铁皮船，仅能载一千零三十吨重，力战敌人铁甲船三艘，每艘能载重三千六百吨至四千一百五十吨，其能侥幸胜乎！然林君犹率其部下一百十余人，鏖战二点半钟之久。始欲将“广乙”驶近倭船，以便使用水雷炮，适有敌

炮击毁水雷炮洞，水雷卒未触炸。至此，“广乙”船上死者甚少。敌船则屡中我广乙开花弹，死者甚重，三舰俱有重伤。既而，有一大开花炮炸于“广乙”舱面，以致死伤二十人。林君在船头督率燃放大炮，忽有被开花炮击毁木质大料飞来，将站在林君旁边之挂得买司击毙。挂得买司者，即华言舵工也。相持久之，“广乙”全船将沉。敌船见之，即弃“广乙”，而展轮他往，盖欲追袭“济远”也。敌船既远，林君检点“广乙”，船舵均已毁坏，不堪行驶，勉强行近一海岛搁浅，又检点所有未毁之大小炮数[导]，自行击毁，然后纵火以焚其船，而免输敌之患。事毕，林君遂带伤残士卒七十名登岸，来叩叶军门大营，以图后举。及至牙山，则华营已空，闻叶军门已于二日前带领所部由忠清道往平壤也。又因牙山朝鲜知府系日军说新派，专与华军为难，故高民不敢供给，以致林君等几乎绝粮。今得英轮载回，亦可谓不幸中之大幸矣。又闻中西人士公论此事，谓日本“吉野”舰，倭音即尤希奴，“松岛”舰，倭音即麦祖希嫣，“浪速”舰，倭音那尼坏，此三铁甲船何等坚固，以“广乙”当之，其糜烂也宜矣。然“广乙”犹能战二点半钟时，又能轰死敌兵数百人，并轰毙敌提督伊藤，则“广乙”之功大矣。泰西闻林君及其部兵之智勇忠烈，皆不胜企慕之意，欲一会为荣，但不解中国何以至今不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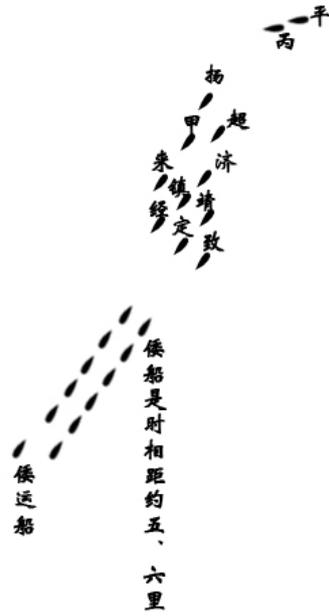
该文原载于《中倭战守始末》

文中红色内容为整理者所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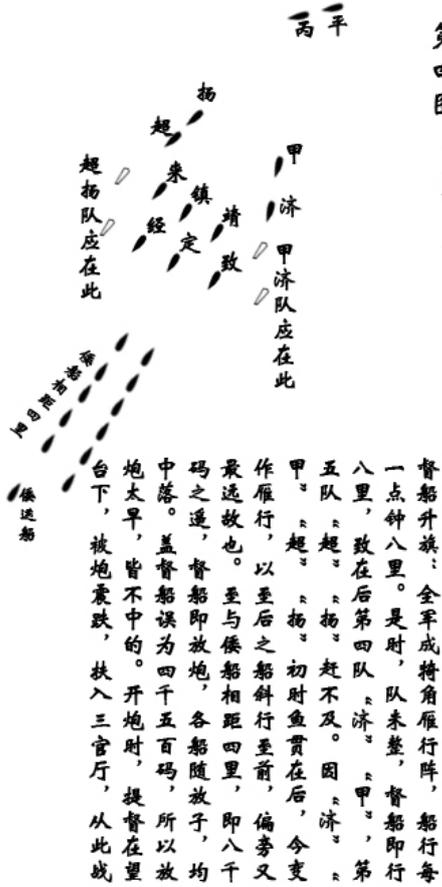
整理、录入：钟琳（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员）

第三图

督船升旗：一队作斜角雁行阵，即二小队在督船斜后护之，三小队在督船斜前护之。到此，倭船已占上风矣。盖是日南风，我船何不先南行？以至被先向东驶，复回东北，置我下风也。



第四图 此时始开战



督船升旗：全军成斜角雁行阵，船行每一点钟八里。是时，队未整，督船即行八里，致在后第四队。济、甲、第五队超、超、超、超不及。因、济、甲、超、超、超、超初时鱼贯在后，今支作雁行，以至后之船斜行至前，偏旁又最远故也。至与倭船相距四里，即八千码之遥，督船即放炮，各船随放子，均中落。盖督船误为四千五百码，所以放炮太早，皆不中的。开炮时，提督在望台下，被炮震跌，扶入三官厅，从此战



第六图

侯船到此炮弹如雨，我船最吃亏。时也，因督船不支阵，所以被困。缘我船在两旁者方能迎击，在中者为己旁船所蔽，炮无从放也。至此，各船自行左右转，令船首向敌，不至大伤，弱船如超、扬，则皆火不支。



第五图

自开炮后，督船并无升一旗号令，且提督旗第三炮即被击落，便不再升。船自忽左忽右，亦无旗令，全军队不整自此。按万国公法例，临阵时团旗、督旗钉桅上，使不动摇，若督旗动则全军溃散，故此旗关系甚重也。
 我军此时阵势颇好，虽不中敌，亦少受伤。乃侯船转到平身，我阵尚不支，故受伤最甚。侯船见我死阵不化，随便放炮均被中，于是三统我船。超、扬、被焚，经、朱、亦火。

第八图



至此，首先倭船并逆船因伤遁去，我各船亦重伤。
 惜军无号令，阵不化，且大战铁甲自顾避敌，不援救各船，此广甲所以躲入阵中，乘势而遁也。

第七图



至此，「经」「来」被「吉野」倭船在后击，火尤炽，船尾火焰腾起。「致远」中炮，船小侧，因一倭船伤停轮，故冲入敌队击之，为敌鱼雷所中，即转入队，约五分钟沉。此「平」「丙」二船遁来，「左一」雷艇始到。



第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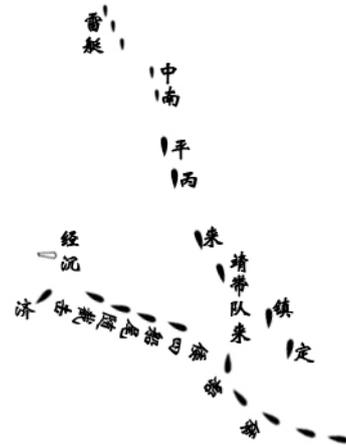
至此，倭见「济远」炮已坏，不能放，用四船截击。「经」、「来」火焚，「靖远」炮亦坏，俱暂停轮修理。时阵势弥漫，督船尚不升旗整队，「靖远」因打手号告各船：「我船须驶近督船。」「来远」随之。「经远」、「济远」已被倭船截断，不得冲过。「平」、「丙」傍山西行，亦招呼之「来」，旋又升旗收队，「丙」船始随之。「中」、「南」并鱼雷艇亦前进。按督提在军，别船不得换升旗号，「靖远」见势急，不得不从权，此电中堂时故有「靖」、「来」如未归队，「靖」、「来」不列，何也？然随折开保



第九图

此时，「济远」炮机坏，左右炮亦坏，轮机伤，船不能行快，敌炮弹如雨，无以还之，因暂向西南行，以便修炮修机。「经」、「来」火焰尤烈；「广甲」已离队；「靖远」前后炮火发，各炮膛亦漏火。

第十一图



至此，倭四船击「济远」。「济远」遂并「靖远」。「靖远」者，以牙山之战，伤其「吉野」，歼其提督，勇弁，故此著力合击也。「济远」此时船上炮机俱坏，无所御敌，倭之四船截击甚急，既不得冲过，合于各船，而督船复不来援，不得不保船西行。「靖远」升旗带队，向督船来，倭船即转舵南驶。

第十二图



至此，倭船旋东去，我亦东驶，远望倭船动静。「左一」雷艇往救「扬威」时，士炮船往救「超勇」将士。及天昏黑始转西行，而倭船犹在该处招呼截击「济远」之四船，打灯号，放火箭，犹可见。我率过大东沟口外，遥见「超勇」回旅顺。「济远」夜四点半钟到，各船六点亦到，抛锚后定远督船始升旗督旗。

图文整理：张黎源（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员）

编 后

方伯谦问题，原本只是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次要课题，但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方伯谦的某些旁系后裔为代表，利用非学术的手段，掀起了一股为方伯谦“平反”的活动。有感于方伯谦翻案活动对历史研究和普及造成的混乱，以及恶劣影响，2007 年 8 月 30 日—9 月 17 日，海军史研究会与“北洋水师”网站发起了“甲午战争中方伯谦问题”专题讨论活动。会后陆续收集了一批相关论文和史料，现汇纂制作，以电子书形式向外界集中发表。

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与“北洋水师”网站，以民间力量，致力于海军史、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和普及，本书是海军史研究丛刊的第一辑，也是海军史研究会会员的第一份集体工作成果。